

危機，文革之不可避免，所有在廬山會議中支持、效忠毛澤東的高級幹部(包括劉少奇、陶鑄在內)都無一倖免，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再一次出現一邊倒向毛澤東、擁護將劉少奇開除出黨的局面，這一切都源於廬山會議開始的「以臣事君，從一而終」傳統。

從另一個角度看，恐怕這正是毛澤東的目的所在。其實，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打天下，坐天下」的皇帝，都會面臨如何將昔日「戰友」轉換為「臣民」的難題。毛澤東要建立他的「大一統」天下，遲早要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前面已經說到，毛澤東為了實現「大一統」，有幾個步驟：通過1957年反右運動，控制知識分子及其政治代表各民主黨派；通過1957年後「單位所有制」的確立與強化，實現對城市居民(幹部、工人、市民)的全面控制；1958年通過人民公社，實現對地方和農村社會基層的全面、絕對控制；現在，他正要通過反彭德懷、張聞天「右傾機會主義」，來實現對黨(特別是黨的高層)和軍隊的全面、絕對控制。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者所說，「從1949年開始，中國共產黨就擔負著一個巨大的任務：像從前歷屆政權一樣，它的政權的合法性將取決於它對整個中國的良好控制」。¹⁵¹因此，毛澤東有步驟地不斷加強對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社會(城市與農村)、黨和軍隊的全面、絕對控制，並且自認為代表黨的利益、以至國家與人民的利益。就像我們說過的那樣，他自命為「天降大任」的豪傑與聖賢，在他看來，這樣的全面、絕對控制是實現國家統一，增強內聚力所絕對必須的，而「統一」與「內聚力」，又是中國這樣一個落後大國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以及趕上西方國家的優勢所在。按照毛澤東的邏輯，為了實現這樣的「大任」，採取暴力手段，導致慘烈犧牲，都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毛澤東的決斷與冷酷，就是建立在這樣的信念與邏輯基礎上。

不管怎樣，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最後大獲全勝。他躊躇滿志地說：「一有意志，萬事皆成」，「我們戰勝地球，建立強國，一定要如此，一定要如此」，「目的一定可以達到！」¹⁵²在主觀意志論的支配下，毛澤東已經不想

151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24。

152 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提綱〉(1959年9月1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頁523、524。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篇講話裡，毛澤東還說了這樣的一番話：「我也是一個甚為不足的人。很有些時候，我自己不歡喜我自己。馬克思主義各部門

煞車，他還要繼續進攻，要讓大躍進、人民公社這輛已經瘋狂的列車開足馬力，一路衝向前去。這樣，毛澤東(以及他控制下中國的黨和國家)就被他自己和歷史鑄造成一個「瘋狂的進攻武器」。原本1959年尚是災荒的初期，還有緩和、以至制止的可能，現在不但不糾正左的錯誤，相反還要進一步反右傾機會主義，把左的錯誤堅持、發展到極致，結果經濟繼續大滑坡，造成空前的大饑荒、大災難，直到1961年跌到谷底。

應該說，毛澤東也曾試圖對這輛「瘋狂的進攻武器」有所控制。1960年夏天，廬山會議之後的「反右傾」，再度颳起剝奪農民的「共產風」，導致農業大幅度減產。¹⁵³毛澤東除了代表黨中央發布指示，要求徹底糾正「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名利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¹⁵⁴之外，還將問題歸之於吃了對情況「不甚了了」的虧，並承認自己有「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於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於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於走馬觀花的調查」的「毛病」，表示要「堅決改正」，¹⁵⁵並表示「為補過起見，現在我來提倡一下」調查研究。¹⁵⁶到1961年，毛澤東又提出要「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¹⁵⁷毛澤東同時警告說：不要採取「官僚主義的老爺式的使人厭惡得透頂的那種調查法」，「死官僚不聽話的，黨委有權把他們轟走」¹⁵⁸——毛澤東對「死官僚」始終有近乎本能的反感，後來的

學問，沒有學好。外國文，沒有學通。經濟工作，剛剛開始學。但我決心學，不死不休。對於這些，我也要改，要進取。那時，見馬克思的時候，我的心情就會舒暢一些了」(見同出處，頁523)。應該說，毛澤東此時的自傲、自信與自省，都是真實的。

153 據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下)提供的材料，1959年糧產僅為3,400億斤，比1958年的實際產量4,000億斤減少600億斤；1960年糧食產量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1年的2,874億斤還低(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下)，頁873)，比1957年減少26%以上(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下)，頁884)。

154 毛澤東：〈中央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1960年11月1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352。

155 毛澤東：〈關於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主義問題的一封信〉(1961年3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440-441。

156 毛澤東：〈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3月15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頁262。

157 毛澤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頁237。

158 毛澤東：〈對《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一文的批語和修改〉(1961年5月28日、30日)，

調查，也確實揭發出「公社各級的民主制度不健全；黨委包辦各級行政事務的現象相當嚴重」這類更為實質性的問題¹⁵⁹——但這卻是毛澤東不準備觸動的，他僅將問題歸結為幹部的工作作風，依然堅持高度集權的體制。這樣，瘋狂的機器就只能按照它自己的專政邏輯繼續前行，毛澤東試圖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來剎車，自然是剎不住的。

講完這段歷史，我想對收入《課用選文》中毛澤東的〈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底下簡稱為〈筆記〉）做一點解釋、提示。¹⁶⁰這是在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所寫的一部著作。他召集了一批「秀才」¹⁶¹讀蘇聯共產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邊讀一邊發表議論，再由這些「秀才」匯整；這篇文章，是他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經驗的總結，並提出一些未來中國社會發展設想的理論性著作。毛澤東在1949年以後，比較有理論色彩的三部著作：〈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問題〉、〈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我們都有討論。這裡先大致提一下，希望同學們回去好好地讀一讀。

這部著作大概有三個方面的意義和內容。首先是總結大躍進的經驗，這在今天還是有啟發意義，比如上次講課提到，關於大中小結合、土洋結合、中央與地方結合的建設路線。我覺得尤其重要的是，毛澤東明確提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人民必須有權利管理上層建築。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這是有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的，在文革中，就成為很多造反派所追求的目標，是文革民間者提出的「人民民主權利」的核心要求，我自己也一直深受毛澤東這一思想的影響。另外，他強調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只講個人消費，不講社會消費」，「社會主義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505。

159 轉引自薄一波：〈回憶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倡導的調查研究新風〉，《緬懷毛澤東》（下），頁9。

160 收入《課用選文》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民間流傳的自印本：《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第三版）的筆記》。下文論述中提及的毛澤東的有關觀點，都錄自這一自印本，不再一一註明。

161 所謂「秀才」是指黨內的大知識分子，毛澤東的讀書小組裡，就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人。

如果不搞社會集體事業，還成什麼社會主義？」如果對照近年大陸發生的將公共福利事業(教育、醫療衛生)市場化及其帶來的嚴重後果，就不能不承認毛澤東的某些遠見。

〈筆記〉有一些內容則有較複雜的意義：若從當時的角度看可能有很大的問題，但如果從更長的歷史時間來看，又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他認為不能過分強調個人利益，特別是不能過分強調物質利益。這樣的命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主要是要號召大家為富國強兵的現代化路線作犧牲，為大躍進、人民公社作犧牲，其作用是消極的；但若從長遠來看，特別是當今天中國面臨過度物質化、過度個人化與極端利己主義充斥的時候，再看這個命題，可能還會有一定的意義。短期的效果和長距離的考察，會產生出不同的意義，這是我們在閱讀與討論的時候要注意的。

〈筆記〉裡有相當一部分是將大躍進、人民公社一些「左」的東西進一步理論化。裡面的核心有二，首先是提倡「窮社會主義」。毛澤東提出這樣一些命題：「人越窮越要革命」、「農民說以窮為榮，以富為恥是有道理的」、「經濟越落後，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越容易」。這樣，就陷入一個邏輯的怪圈：中國窮，所以要革命，那麼革命的目的，是要讓中國富起來；但人一旦富起來，就會失去革命性，哪一天中國富起來了，可能會有問題。這個邏輯放在實踐上，就會出現劫富濟窮，視富裕農民為革命對象，提倡「以窮為榮，以富為恥」，並在實際上忽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讓人民富裕起來，以至在治國路線上片面強調「富國強兵」，而不再提「富民」要求等一系列問題。這樣的「窮社會主義」，正是毛澤東空想社會主義的重要方面。

其次是提倡「窮過渡」。毛澤東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核心觀念，就是先改革生產關係，再發展生產力。這個觀點和劉少奇先發展生產力，再來改變生產關係的觀念基本上是對立的，這是他們之間分歧的一個基本點。今天來看，劉少奇的觀點不是沒有問題，其最大盲點就是容易導致「唯生產力論」、「經濟決定論」，當年毛澤東猛批「唯生產力論」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儘管他的目的是為自己的路線辯護)。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以至今天的中國，就存在這樣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毛澤東的觀念也存在盲點，以至危險：在生產力很低的水平上，提倡生產關係的不斷革命，就會造成「窮過渡」。比如毛澤東在〈筆記〉裡用很大篇幅討論、提倡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

過渡」。這樣的精神向全黨傳達以後，就立刻掀起了人民公社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高潮。特別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之後，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上下無不聞風而動，而且越左越好。於是，就產生完全不顧客觀條件、一味提高公有成分的現象，這就必然導致對農民的新的剝奪，剛剛冷卻下來的「共產風」、「大辦(大辦工廠，交通等公社企業)風」，又重新在華夏大地掀起。這是1960至1961年大饑荒繼續蔓延的直接原因之一。

毛澤東的〈筆記〉是一個很複雜的文本，它的複雜性在毛澤東的著作裡很有代表性。同學們在研讀時，既要注意它的理論表述，又要結合它的實踐作用；既要放在歷史的時空下，作具體的考察與分析，又要有一個長時段的歷史眼光，這都是研讀毛澤東著作的難點，也是它最吸引我們的地方。

編註

- i 脫產：指脫離生產線、脫離工作崗位。
- ii 廬山會議：1959年7月2日-8月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第八次會議，又稱八屆八中全會。會中批判彭德懷為反黨集團。
- iii 盲流：「盲目流動」的簡稱，指未經許可離開鄉土、流入城市的農民，是中國城鄉二元體制下的特殊現象。1959年中共中央曾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制止農民外逃，要求各省、市將流入城市、工業礦區的農民進行強制收容、遣返，「盲流」的稱呼始於1950年代，亦使用於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
- iv 「朱可夫罷官事件」：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在蘇德戰爭期間曾任僅次於斯大林的最高副統帥，在戰後曾任駐德蘇軍總司令、德國蘇軍占領地最高行政長官，斯大林去世後，朱可夫擔任國防部副部長，並於1955年出任國防部部長，其軍權曾於1957年為赫魯曉夫贏得黨內鬥爭，但也因此引起赫魯曉夫與黨內高層的猜忌。1957年10月27日蘇聯解除其國防部長的職務，是為朱可夫罷官事件。毛澤東曾引此事件影射彭德懷的罷官。

第七講

大饑荒年代(下)

1959-1961

| 2009年10月27日、11月3日講 |

一、大躍進、大饑荒時期的民間觀察與思考

如果說〈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筆記〉是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理論總結，那麼，同一時期的民間社會，也提出不同於毛澤東的理論總結。這裡我想著重介紹二位民間思想者和一個民間群體的思考。

(一)顧準：「社會主義的史前期」批判

第一位是我們已多次提到的顧準。顧準當時已經被完全逐出體制，並在河南信陽地區的農村，親自經歷了大饑荒：這是對於大饑荒的零距離觀察、體驗與思考，儘管這些思考分散在他這一時期的日記裡，並未形成完整的理論論述，但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啟發性。

他在日記中詳盡記錄了他所目睹的大饑荒慘像：

八組黃渤家中，老婆、父親、哥哥、二個小孩，在一個半月內相繼死亡。這個家庭也特別大，未死人前連黃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個，則死亡比例也不小了。¹

現在問題已不在死不死人，而在死些什麼人。黃渤說，父親死了，死了沒啥。孩子，死了也沒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誠哉斯言。農村中死掉一些孩子與老人，達到了Malthusianism〔錢註：馬爾薩斯主義〕的目的。若死強勞動力過多，則是大大的紕漏了。²

1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17日），《顧準日記》，頁177。

2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17日），《顧準日記》，頁179。

除民間大批腫一死而外，商城發生人相食的事二起，[……]，一是丈夫殺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³

可以想見，這一件件就發生在他身邊的血淋淋事實對顧準的衝擊。但他作為經濟學家，不能停留在事實的記錄，而要進行理論的思考與體制的追問。

首先，他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史前期」的概念。⁴在毛澤東的〈筆記〉裡，將之稱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今天則稱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些其實是同一個概念。但顧準強調「史前期」，顯然是為了突出它的野蠻性，有點類似於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也就是說，他實際上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概念。

顧準認為「史前期的社會主義」有四個特點，這也就是他對當時中國社會主義體制，所提出的四個判斷、四個分析。

第一，史前期發展的是「糊口經濟」，⁵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學概念，這一概念揭示了「社會主義史前期」的歷史任務，就是要解決中國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其中心就是建立糊口經濟——毛澤東「吃飯不要錢」的社會主義理想，其實就是以此為目標，只是表達方式更有誘惑力。

第二，如何實現糊口經濟的目標？顧準認為，中國史前期社會主義推行的是一條「集中國力」的「戰時經濟」發展路線，⁶這其實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富國強兵」的路線。

顧準又對「戰時經濟」作了以下具體分析：

第一，實行「政治掛帥」，即「離開經濟手段，而用政治手段來實現經濟目的」。這實際上就是要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用行政命令的政治手段，最大限度地把農民組織在人民公社裡，全面控制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與日常生活，並統一支配和調動生產資料、消費資料與勞動力，以集中力量，按照黨的意志和國家計劃發展經濟。顧準強調：這樣的「政治掛帥」其「全部適用的範圍僅限於農村，城市不僅不能實行，相反，還要維持一個比較過過去的貨

3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2日)，《顧準日記》，頁183。

4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6日)，《顧準日記》，頁164。

5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2日)，《顧準日記》，頁187；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1日)，《顧準日記》，頁231。

6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6日)，《顧準日記》，頁163。

幣經濟的外觀」，⁷也就是說，還得保留商品經濟和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這樣，顧準就揭示了中國史前期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二元性，即「命令經濟」與「貨幣經濟」的混合，前者主要在農村實行，後者主要在城市實行，但又相互滲透。

第二，「用說謊、專制、嚴刑峻法、無限制的鬥爭、黑暗的辦法來完成歷史的使命」，⁸也就是用階級鬥爭和專政、準專政的方法完成糊口經濟的任務，用「解決一部分人〔錢註：的吃飯問題〕，摧毀另一部分人〔錢註：的生命〕」的「階級鬥爭來解決饑餓問題」。⁹

第三，推行「城市中心主義」的建設路線，「拼命地刮削農村來進行建設，而建設本身便是建設的目的」，這是一條以犧牲農民為代價的發展路線；顧準說，這是典型的「苛政猛於虎」，「對農民真是天大的災難」。¹⁰他由此談到了中國農民的「厄運」：「他們從糊口經濟的立場出發，在土地革命的旗幟下做出了重大貢獻，結果是他們的救命恩人回過頭來」，剝奪他們、「驅饑餓的億萬農民從事於過度的勞動」，以達到「高產，高商品率的農業與消滅過剩人口」¹¹——我們前面討論過的「高徵購」，其實就是用強迫手段來提高農業的商品率，以供應城市、發展城市工業。這裡談到中國農民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顯示出土地革命時期農民的「救命恩人」，在執政後卻要致農民於死地；這樣觸目驚心的轉變，真是歷史的悲劇。

在顧準看來，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實驗，以及他所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實質上是「國家與農民的衝突」，¹²用犧牲農民的辦法來達到國家的目的；因此，他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史前期」的「圈地」和「羊吃人」運動，¹³就像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圈地運動一樣，不僅事實上造成了幾千萬農民的非正常死亡，而這樣的死亡本身就是目的：

7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15日），《顧準日記》，頁170。

8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2日），《顧準日記》，頁186。

9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日），《顧準日記》，頁214。

10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7日），《顧準日記》，頁251。

11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1日），《顧準日記》，頁231-232。

12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9日），《顧準日記》，頁227。

13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1日），《顧準日記》，頁232。

要藉此「消滅過剩人口」、提高農業商品率，也就是說，要以消滅農村過剩人口的方式，來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顧準說，這是「用活人的生命消耗來對地球宣戰」，以獲取農業的高產；¹⁴這確實是「最堂皇〔錢註：打著『超英趕美』的民族主義旗幟與『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理想主義旗幟〕、又是最殘酷〔錢註：以犧牲3,000萬農民為代價〕、最迅速、最能見效的辦法」。¹⁵顧準說，「人民公社已經建立」、「全部體制已經完成，下馬是萬萬不能的」，只能「咬緊牙關，死一億人也不要緊，幹上去，這是1959年8月英明偉大的毛主席所下的雷霆萬鈞的決心。從外面來，從上而來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歪風，不過刺激他下了這個決心的接觸媒而已，事情是被決定於『內因』的」¹⁶——這確實是一個深刻的觀察：毛澤東堅信，他所完成的是歷史賦予給他的使命，為此，他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將之完成，包括犧牲人的生命。

第三，顧準又指出，這樣的「史前期的社會主義」是以「保證少數人有正常與富裕生活條件」為前提的。¹⁷也就是說，在史前期社會主義時期裡，是要求絕大多數人為「實現國家目標」（國家獨立、統一、解決吃飯問題）而作出犧牲（毛澤東在〈筆記〉裡一再講「國家利益」，要求「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就是為此）。因此，絕大多數人，尤其是農民，是不可能享有「正常富裕的生活」，他們換得的是大量的非正常的饑餓與死亡，而享有「正常與富裕生活」的只是少數人——這就是我們一再討論的社會主義特權階層。也就是說，特權階層的形成、兩極分化的形成（既是特權與底層人民的分化，同時也是城鄉的分化），正是中國史前期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是其體制的必然產物。

認識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現在總有人想要打造「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平等時代」的神話和假象，但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的確，毛澤東強調平等，甚至走到了絕對平均主義的極端，而毛澤東時代的特權階層，與今天中國社會的特權階層，在質和量上都是不能相比的。但是，毛澤東時代已經形成的特權階層與兩極分化，卻是不可否認的客觀存在。在毛澤東時代，民間

14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2日），《顧準日記》，頁184。

15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1日），《顧準日記》，頁232。

16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日），《顧準日記》，頁216。

17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6日），《顧準日記》，頁163。

連續不斷的「反特權」鬥爭，絕不是無的放矢。

第四，顧準強調，在這樣的史前期社會主義裡，「道德敗壞不能不成為普遍現象」。¹⁸正是階級鬥爭和饑餓，使中國人「人相食，賣屍，說謊，拍馬，害人自肥」。¹⁹毛澤東時代不斷設置對立面、製造階級鬥爭，將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矛盾高度政治化，造成了人與人關係的高度緊張與惡性化，其結果就是將人內在的嗜殺性誘發出來，在「不斷革命」的口號下，製造了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無止境的相互殘殺，即「人相食」，並累及無辜。在政治高壓與誘惑之下，也必然出現「說謊，拍馬，害人肥己」的現象，強迫父子之間、師生之間等劃清界線，強制、鼓勵相互檢舉、告密，更是逼迫人們越過道德底線，真正的道德危機於是形成。這當然不是個人的道德品質問題，而是體制性的道德問題，也就是說，這樣的道德危機，就是中國史前期社會主義的本質性特徵——確認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今天同樣有人要打造「毛澤東時代是一個道德高尚的純潔時代」的神話與假象。

當顧準說這些話，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為裡面包含著他的自我反省。他在日記裡反覆提到一個問題：「我是否變得卑鄙了？」²⁰他所面臨的，也是一個由饑餓而引發的道德危機。

顧準在農村中不僅看見周圍農民的饑餓、死亡與人相食的現象，他自己也面臨著饑餓和死亡的威脅。他在日記裡寫道：「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楊、張、謝三人²¹中的好對象得以早上喝一次米湯，想如何『搞』點紅薯與胡夢卜吃。想回家時如何盡情大吃一個時期。烤白薯北京很難買到，窩窩頭是美味。實在買不到啥吃時，打算到東安市場、阜外大街作巡遊，有啥吃啥。再不然，到專備外賓吃的西餐館去吃它幾次」²²——人整個腦子想的就是吃，是因為饑餓到了極點。所有的人，包括顧準這樣的思想家，求生都成了基本問題，甚至是唯一的問題，其他所有思想、理論問題都不能顧及了，只想著如何求生。顧準先是偷糧食；但作為一

18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5日），《顧準日記》，頁240。

19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5日），《顧準日記》，頁241。

20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4日），《顧準日記》，頁236。

21 此三人均為顧準所在的生產隊的領導，他們是掌握了包括顧準在內的所有人的命運的。

22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15日），《顧準日記》，頁168-169。

個知識分子，他卻一邊偷、一邊自我譴責：「我怎麼會淪落到去偷東西呢？」後來偷也不行了，唯有擠進生產隊的統治階層才能有東西吃，因為他們掌握了吃的權力。而擠進去的唯一方法，就是諂媚。顧準最恨那個生產隊長，因為他是專制體制最忠實的奴才，但顧準現在卻得千方百計地奉承他，不想理他也得要硬著頭皮對他微笑。在日記裡，顧準又陷入了深深的懺悔：我怎麼能這樣「卑躬屈節」？²³我太可惡了！怎麼能這樣笑臉迎人？我只是「苟全性命而已」啊！²⁴我有「二副面孔」，²⁵我「精神分裂」了²⁶——這樣的懺悔，是具有震撼力的，因為它揭示了一個體制性的問題：這個體制是如何「逼良為娼」，逼迫民族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人格分裂。

這就是顧準所總結的「中國社會主義史前期」的四大特徵。在我看來，這四大特徵，在今天也依然保持了鮮活的批判力。

因此，我想從顧準的批判出發，引申討論一些重大的問題。

首先，顧準所說的中國史前期的社會主義，是一直延續到毛澤東之後的。這就是說，我們應該把共和國60年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思考與討論。在我看來，後30年的改革開放，不僅是由毛澤東奠定其基礎（這是我們以後要討論的），而且它並沒有從根本上走出毛澤東時代；因此，將其稱為「後毛澤東時代」更為貼切，更能揭示歷史的真實。也可以說，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1942-），這四代領導人所要完成的，就是史前期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這是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其基本特徵，用顧準的話來說，就是「以野蠻的方法」來建立「糊口經濟」，以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擴大一點，還要解決中國的獨立、統一問題。所謂「野蠻的方法」，毛澤東時代是以政治的手段不斷發動階級鬥爭、大躍進，來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後毛澤東時代，則是以經濟的手段，利用權貴資本主義的市場方式來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這樣一種原始積累和高速發展，如前所分析，都以資源大破壞，和對底層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大剝奪為代價；經濟高速發展、特權問題嚴重、社會不平等、道德底線被突破、思想控制嚴密、文化屢遭破壞，則是其

23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1月23日），《顧準日記》，頁152。

24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8日），《顧準日記》，頁166。

25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1月27日），《顧準日記》，頁155。

26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9日），《顧準日記》，頁227。

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特徵，所仰仗的都是權力高度集中的一黨專政下的「低人權優勢」。這就是毛澤東時代「政治強大」與後毛澤東時代「經濟強大」的祕密所在。

問題是，如何評價這樣的歷史過程、如何評價領導此歷史過程的歷史人物毛澤東？或許，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暴露和顯示了顧準(可能還包括我自己)的內在矛盾。

在顧準看來，這是一個歷史必然的選擇。他一再說：「歷史決定這個時代不能不是 Stalinism [錢註：斯大林主義]的」，²⁷「推動歷史前進的，本來是惡而不是善，毛澤東時代又何能免此？」²⁸所以他十分痛苦，一再表示：「我不忍參加這個剿滅人口的向地球宣戰的戰役，然而中國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可走」。²⁹他經常談到所謂「躍進的願望與人道主義」的矛盾。³⁰這就是說，為了完成糊口經濟的任務，解決中國人口的吃飯，國家的獨立與統一這三大問題，為了實現「改變落後面貌」的民族欲望，必須採取野蠻的方式，但這同時又會帶來人道主義的危機。顧準，也包括我在內的這一代知識分子，比較受黑格爾、馬克思的絕對主義影響，所以他認為這是歷史的必然性。因此，他講的「躍進的願望和人道主義的矛盾」，其實就是「歷史必然性和人道主義的矛盾」。面對這樣的矛盾，顧準的應對方式，是拒絕參與這段「羊吃人」的歷史，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歷史的觀察家」，並「記錄歷史，使這個時期的真相能為後世所知」。³¹這樣的選擇，又給顧準帶來新的痛苦：因為這一代知識分子，特別是進步的左翼知識分子，總是將參與歷史運動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顧準在一篇日記裡，曾萬分感慨地談到高爾基(Maksim Gorky, 1868-1936, 俄國)當年所說的「海燕」與「家雀」，從顧準到我們這一代，都志在作迎著時代暴風雨飛翔的「海燕」；但顧準和「顧準們」卻要面對這樣的現實：這個時代「要求的是馴順的家雀」，但顧準仍然要發問：「如今的海燕又豈能對大批餓死

27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9日)，《顧準日記》，頁227。

28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2日)，《顧準日記》，頁187。

29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2日)，《顧準日記》，頁186。

30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1月27日)，《顧準日記》，頁154。

31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2日)，《顧準日記》，頁186-187。

的人充耳不聞？海燕又怎能是馴服的工具？」³²

我們今天可能會對顧準的歷史決定論與本質主義的歷史觀持有異議，但他的分析，卻能夠提供我們一個思路，去認識、評價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我以為，可以總結為兩句話。

第一，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處於西方世界包圍下的東方大國，要維護國家統一和獨立，解決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特殊重要性、而又空前艱巨的歷史任務和歷史使命。幾代中國的志士仁人為之奮鬥了一個世紀。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又歷史地將毛澤東和他的後繼者推上了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並賦予其帶領中國人民實現這三大國家目標的歷史使命。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必須承認，毛澤東與他的後繼者，正是應此歷史使命而產生的歷史人物，應該說，他們完成了這個歷史使命。今天，中國已經是一個獨立、統一，基本上解決了十幾億人口吃飯問題，經濟高速發展的東方大國，這是一個不可否認、不可抹殺的歷史成就與貢獻。

第二，但他們又是以極其野蠻，可以說是超乎人們想像、極其殘酷的專制手段，來完成這樣的歷史使命的。為解決這三大國家問題，中國付出了太大的代價，導致幾千萬人生命的毀滅，而且導致自然資源大破壞、社會不平等、精神頹敗三大問題，更形成生態、社會和精神三大危機，同時又遺留下一個極其嚴密、精緻而又危機重重的一黨專政體制，這種種都顯示了顧準所說的「用野蠻辦法在一個野蠻國家裡實現文明」的殘酷性。³³

我們可以不承認這是「歷史必然性」，我們也可以設想，是否可以採取更加文明的方式來實現這三大目標，或者有別的領導人、別的機遇採取代價不致如此慘重的方式。事實上，包括顧準與1957年校園民主運動參加者在內的民間思想者，他們所提出的正是另一種可能性。但是必須承認，這些善良的設想，這些或許更有合理性的願望，都只是未實現的歷史可能性，而歷史卻是不能假設的，我們必須正視的，是已經實現的歷史的現實形態——當然，正視不等於認同，我們依然可以堅持自己對歷史結果的批判立場，但我們又必

32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6日），《顧準日記》，頁195。

33 顧準：〈顧準日記〉（1956年3月29日），《顧準日記》，頁67。

須從這樣的歷史現實出發，以作出自己對歷史的評價。

關於毛澤東的歷史作用和地位，顧準有一個概括，我覺得很有啟發性：毛澤東用「最堂皇、最殘酷，也最迅速、最能見效的方法」，實現了他自己的目標，也實現了歷史交給他的使命，「若說這也將記入史冊成為豐功偉績，那確實與Peter the Great〔錢註：彼得大帝〕與曹操一樣。他是聰敏人，他是有意識這樣做的」。³⁴顧準將毛澤東與彼得大帝、曹操類比，而我更願意把毛澤東類比為中國歷史上的秦始皇。毛澤東也自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他確實是用殘酷的手段實現歷史使命與自己目標的「千古一帝」。顧準說毛澤東類似曹操，大概是要強調毛澤東是「一代梟雄」，這抓住了毛澤東的特點：毛澤東本人竭力為曹操辯護，³⁵六十年代還由郭沫若帶頭，掀起「為曹操翻案風」，這些都不是偶然。在二十世紀的現代中國，出現毛澤東這樣的「千古一帝」、「一代梟雄」，並由他來完成現代中國的歷史使命，這既具有歷史的嘲諷意味，又是我們必須正視的。

當然，僅僅把毛澤東說成「千古一帝」、「一代梟雄」，也會遮蔽一些東西：我們不可忽視毛澤東自稱「馬克思」的一面。毛澤東身上確實有中國傳統，特別是帝王傳統和農民造反傳統的深刻印記，但他畢竟還是一個現代革命家、一個社會主義的信仰者與實踐者，正如我們一再強調的，他的中國社會主義實驗，其得失、成敗，都是留給後人的重要遺產。

下面，我們還要簡單介紹，顧準在追問大饑荒背後的體制問題時，所提出的另一個思考角度，即他對人民公社體制的分析與批判。顧準把1958年所建立的人民公社體制的特點，作了五方面的概括。因為時間關係，這裡只能說個大概，不過我有一篇〈1956-1960年間顧準的思考〉的長文，收在《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裡，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參考。³⁶

首先，顧準指出，人民公社所建立的是「產業軍體制」，「它把純粹農村結構組成營連，並可以從中隨時組成野戰(如水利)隊伍」，而「公共食堂，把農

34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0日)，《顧準日記》，頁232。

35 1954年夏毛澤東作〈浪淘沙·北戴河〉歌詠曹操：「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並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見劉景榮、袁喜生：《毛澤東文藝年譜》(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頁138。

36 參見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頁327-355。

村糧食消耗徹底控制起來」，³⁷這就達到了對農民和農村社會的全面控制：不僅控制「生產」，而且控制「分配」與「消費」。³⁸同時，它又「把人的勞動力的價格貶低到無可再低的程度」，「它提供縣社工業以極其廉價的勞動力」，「大小工業將可以不計成本地建立起來」，「這樣，積累的速度將是可驚的」³⁹——中國經濟發展的祕密，正是建立在壓榨農民的基礎上。

其二，人民公社又通過「公安戶籍制度」將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完全剝奪他們憲法所規定的「居住自由」，並以「逃竄犯」的罪名，阻止城鄉勞動力的流動，形成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⁴⁰

以上兩方面，我們已有詳盡討論，不再多說。

其三，也是顧準著重討論、並試圖回答的：農民被緊緊束縛在這個體制之下，為什麼不反抗？反抗為什麼無效？應該說，農民並不是沒有反抗，在大饑荒中農民暴動是時有發生的，我們在第六講中，就提到貴州農民在公社書記帶領下的暴動。⁴¹但應該承認，總體上看，這樣的暴動還是零星、分散的，並沒有出現整個社會的大動亂。

原因在哪裡？顧準提醒我們注意一個事實：「整風反右，加上反右傾鼓幹勁，把僅屬於萌芽狀態的農民代言人禁錮起來，或者洗腦筋」。⁴²通過反右運動和反右傾運動，毛澤東和共產黨確實成功地割斷了有可能成為農民代言人的知識分子（包括黨內知識分子）、農民出身的幹部和農民之間的任何聯繫。毛澤東當年發動革命時，曾號召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到農村去，播下革命火種、和農民相結合，這是使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獲得成功的重要面向；但在掌握政權之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最擔心的，就是反抗的知識分子和農民相結合，因此務必要切斷他們之間可能存有的一切聯繫。我們前面講1957年歷史時就說過，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的原因之一，就是擔心學生進入到已存有不滿情緒的農民之中點火。現在，又通過1959年的反右傾，

37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2日），《顧準日記》，頁184。

38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日），《顧準日記》，頁216。

39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6日），《顧準日記》，頁196。

40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2日），《顧準日記》，頁184。

41 詳見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篇），頁936-939。

42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2日），《顧準日記》，頁187。

毛澤東成功地控制了知識分子和黨內與農民有聯繫的幹部，到六十年代遭遇大饑荒的農民，已經不可能從知識分子和各級幹部那裡獲得任何支持，這也就堵絕了農民表達自己反抗意志的一個渠道。

其四，和城市知識分子之間失去聯繫的農民，他們自身會不會出現反抗的領袖呢？顧準又進一步指出，人民公社有一個機制，就是「從農民中選拔了大批人當連長營長會計醫生技術員高中生。統治階級愈善於自被統治階級中選拔人參加統治集團，它的統治愈是鞏固」⁴³——這一點，通常不被研究者注意，這大概是顧準零距離接觸農村狀況，所提出的獨特觀察與發現。這項機制對體制的穩定性，起了很大作用。

其五，即使沒有知識分子作代表，農民自身也沒有領袖，還是有人會反抗，那又怎麼辦？顧準發現，公社控制農民的最基本手段，就是以所謂「反對農村中的自發的資本主義趨勢」為由，在農村開展無間斷的階級鬥爭，把任何不穩定的因素，都消滅於萌芽時期。⁴⁴

在顧準看來，黨和國家正是通過「人民公社」這樣的組織形式，從以上五方面，形成對基層農村全面而穩固的控制，這就是大饑荒帶給農民如此大的災難，卻沒有引起全國範圍的反抗(特別是有組織的反抗)的祕密所在。顧準由此得出結論：人民公社的「統治體制是崩裂不了的。禁錮與思想統制愈甚，[……]，統治維持下去的可能愈大」、「略鬆鬆弦，中國農民是容易滿足的」⁴⁵——顧準的這些分析，有助於我們認識這段從大躍進到大饑荒的歷史。

最後要討論顧準的希望，即顧準的理想主義。

1960年，中國整個經濟處於低谷，顧準作為經濟學家卻預言：「局面將要大變」，其根據有二：一是經濟必將復甦，甚至會有新的大發展，二是「老一套的『正確錯誤』的絕對論維持不下去了。不同意見的人們必定要組成不同的社團，發展的結果必定是社會主義的多黨制度」⁴⁶——其實，毛澤東之所以要在廬山發動對「彭(懷德)、張(聞天)、黃(克誠)反黨軍事俱樂部」¹的批判，

43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2日)，《顧準日記》，頁187。

44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16日)，《顧準日記》，頁172。

45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22日)，《顧準日記》，頁187。

46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2月28日)，《顧準日記》，頁260；顧準：〈顧準日記〉(3月2日)，《顧準日記》，頁261。

就是要防止這個局面出現。

這背後，表現了顧準自己的理念和理想。他相信用「經濟發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即「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後，高度集中勢不可能長期維持，精雕細刻的發揮生產潛力成為迫切的要求，群眾的智慧要發作用」，即必然要求「實現經濟民主」，同時也就要求相應的思想自由與政治民主，這時候，進入「民主社會主義」也就水到渠成。⁴⁷

後來，顧準在文革期間交代他在這一時期的思想時，說他強調的是：「當前的重要任務是加速經濟發展」，「民主社會主義」是「比較遙遠的將來的事」。⁴⁸在顧準的思考裡，中國的問題都取決於經濟發展；一旦經濟發展了，一切問題，包括中國的民主、自由、一黨專政的問題，都將迎刃而解。這其中當然有「經濟決定論」的問題和陷阱；但它確實提供了思考當下中國問題的一個思路。應該說，顧準所期待的「中國經濟大發展」的局面，並未如他所預言的在六十年代中後期出現，更準確地說，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斷了這個歷史進程，將它整整推遲了40年。也就是說，直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崛起，才真正完成了顧準所說的「社會主義史前期」歷史任務，實現我們前面討論的三大國家目標。按照顧準的思路，這時候的中國，應該告別「史前期社會主義」，建設一個「文明的社會主義」，即「真正的社會主義」。

顧準提出了三個目標：第一，「關懷多數人的生活，使生活水平的懸殊減少」；第二，「在社會道德方面恢復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第三，「消滅社會主義時代所發展的畸形」。⁴⁹據我理解，最主要的目標，就是根除一黨專政的毒瘤，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和平等。在顧準看來，這就是一條「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這些年，一直有人（主要是黨內民主派，大體是顧準的同代人）在呼籲中國向社會民主主義轉化，其所要實現的，正是當年顧準的遺願。在顧準（也許還有他的同代人）看來，這是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這自然也是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顧準原以為經濟發展了，就可以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卻沒想到這個「經濟發展決定論」的思路，竟被今天的中國統治者

47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3月2日），《顧準日記》，頁261-262。

48 顧準：《顧準自述》，頁290。

49 顧準：〈顧準日記〉（1959年12月6日），《顧準日記》，頁163-164。

利用，作為證明其一黨專政合法性的理論依據，即用經濟發展來掩蓋一切問題，彷彿中國經濟的崛起正是證明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顧準所說「羊吃人」的「史前期社會主義」的絕對正確性。這大概是顧準所未曾料及的吧。

(二)《星火》：「國家社會主義」批判

我們在前面曾提到，在反右運動後，林昭的出現所代表的意義。這裡，我們將要討論林昭和她的戰友在大躍進、大饑荒年代的思考。也就是說，此時林昭已經不是孤單一人：通過各種渠道，1959年，林昭和蘭州大學以張春元(1932-1970)為首的一批右派學生取得聯繫，並於1960年元月刻印了《星火》第一期，發出了自己獨立的批判聲音，卻也因此付出血的代價：1960年9月，《星火》成員和其支持者、相關者(包括一些農民)共43人全部被捕，後判刑25人，已經準備發刊的《星火》第二期也因此未見天日。1968年林昭遇害；1970年，張春元以及支持他們的武山縣委書記杜映華(1927-1970)同時殉難。在1981年《星火》集團「宣告無罪」以後，又經過近30年的努力，才找回了兩期《星火》的原稿，並全文收入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星火》倖存者譚蟬雪(1934-)所寫的《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一書中。因為有了這份血鑄的精神遺產，今天的我們也才有可能來討論這這段歷史。

我們首先注意到，《星火》的成員被發配到農村，進行強制改造，他們是在農村親歷大躍進、人民公社與大饑荒的過程中，才逐漸形成自己的批判思想。他們當時的實際地位比農民還要低，因此，也就直接承受農民的一切苦難，面對更加赤裸的農村真實，更有機會體察農民的內心感受；在某種程度上，農民面對的問題和命運，已經內化為他們自己的問題和命運。他們同時又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因此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來思考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以及中國社會體制的根本問題。這就是他們思考的特殊價值所在。

更要注意的是，他們是戴著「右派」的帽子蒙冤受難，是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進行思考、批判與反抗，這需要更加強大的精神力量。如他們其中一個成員在回憶錄裡所說：「如果說57〔錢註：1957〕年我是百分之百毫無知覺地落入陷阱；那麼，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獄，無怨

無悔」，⁵⁰「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世道又與地獄有何區別？為了自由和尊嚴，為了顫慄流血的心得以平靜，我選擇了死亡，十分清楚它的嚴重性和後果」；⁵¹林昭在《星火》上也發表了兩首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⁵²〈海鷗——不自由毋寧死〉⁵³，《星火》的戰士，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盜得真理之火的普羅米修斯、為自由而獻身的海鷗。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顧準對當代海燕命運的思考，林昭、張春元、杜映華們和顧準，以及我們在下面還要講到的張中曉(1930-1966/1967)，才是六十年代，以至二十世紀中國的「筋骨和脊梁」(魯迅語)。

《星火》的批判群體，是這樣看待和規定自己的歷史使命：

我們是百姓的代言人，要把他們的疾苦、他們所受的壓迫、他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狀態揭露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僅僅這樣還不夠，作為一個覺醒的知識分子，還要從理論上去挖掘這一切禍害的根源，去探討解救祖國命運的途徑和方法，我們的任務就是為了這一目標而奮鬥。⁵⁴

於是，他們這樣命名自己：「農民的兒子」。⁵⁵這樣的命名本身就是意義重大的。我們在前面討論顧準的思考時，曾經談到他最感痛苦的是，經過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傾，中國的體制已經成功地割斷知識分子、農民出身的幹部與農民之間的聯繫，於是農民失去了代言人，發不出自己的聲音。現在，我們可以補充：這樣的「割斷」是既有效又無效、既斷又不斷的。毛澤東將1957年的右派發配到農村，也就創造了條件，於是出現了和農民命運相同的批判知識分子；這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當然，這不是偶然：顧準將大躍

50 向承鑒：〈回憶錄〉，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頁238。

51 向承鑒：〈回憶錄〉，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239。

52 林昭：〈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5-51。

53 林昭：〈海鷗：不自由毋寧死〉，《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85-94。

54 張春元1959年語，見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18。

55 這是譚蟬雪對杜映華的評價，可以視為《星火》群體的自我命名。見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100。

進、人民公社的問題，歸結為「國家與農民的衝突」；⁵⁶幾乎同時，《星火》也認定：「在我國當前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矛盾最突出也是最驚人的是農業問題——其實質是農民問題」，也就是說，「如何對待農民」，是一個判斷中國掌權者是否「背叛人民」、「背叛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基本標誌。⁵⁷可以說，《星火》批判群體最為關注、不斷追問的是農民的命運，這是他們對現行體制批判的中心、出發點和歸宿——或許這是具有更普遍的意義的：直到今天，中國的批判知識分子，都是以對農民命運的關照，作為他們批判體制的基本出發點。

這裡要特別提出，中共縣委書記杜映華加入《星火》群體的特殊意義。杜映華出身農民家庭，是1949年前的中共地下黨員、曾為縣立師範的學生運動的領袖、土改工作隊隊長，他一直和農民有著血肉的聯繫，他任職縣委書記時所堅守的原則，就是「只要心裡想著人民，想著農業和農民，你們做事就不會出格」。⁵⁸在大躍進的狂熱中，他始終保持低調，卻因此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這反而激起了他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憂慮與思考，於是，他有了這樣的反省和反思：「革命勝利了，我們給農民帶來了什麼？是饑餓！是死亡！〔……〕蔣介石不知屠殺了多少共產黨人，但社會上還有不同的聲音，例如魯迅的聲音，中國共產黨的聲音。現在一切不同聲音都沒有了，變成一個鬼話、假話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餓死人，還要逼人天天喊形勢大好，多麼奇特古怪的現象呵！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我不知道世道為何變成這樣，變得如此快？」⁵⁹懷著類似杜映華這些困惑的共產黨幹部，當時並不在少數，而且各級都有。但如我們在前面所分析的，當黨的既得利益、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農民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幾乎所有共產黨各級幹部，都選擇維護前者。而杜映華卻毅然決然地站起來維護農民利益，不惜和已經背離農民的黨決

56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9日），《顧準日記》，頁227。

57 張春元：〈論「人民公社」〉，《星火》第二期（未出版），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81。

58 向承鑒：〈悼念杜映華〉（2001年9月17日），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253。

59 向承鑒：〈悼念杜映華〉（2001年9月17日），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255。

裂。這樣，他也就堅守了「農民的兒子」的基本立場，堅守了為勞動人民謀求幸福與解放的原初理想。而毛澤東的共產黨，也毫不猶豫地將他，這位老百姓心目中、《星火》批判群體心目中的「真正的共產黨人」，送上刑場——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歷史。

《星火》批判群體選擇和毛澤東的共產黨決裂，並籌劃成立「中國共產主義者聯盟」ⁱⁱ(或名「中國共產黨革命(或革新)委員會」、「中國勞動農工同盟」)，⁶⁰是基於一個事實：「當前農村的巨大變化之一，就是農民的貧困和破產，農村中出現了新興的階層——農村無產者」，⁶¹這正是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結果。

他們更要追問的是，造成農民貧困和破產背後的社會體制原因。

於是，他們就有這樣的基本判斷：中國現行社會主義體制實質上是一種「由政治寡頭壟斷的國家社會主義，與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屬於同一類型，而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點」。⁶²

在他們看來，這樣的「國家社會主義」具有以下特徵。

首先是「國家集權」，這「其實就是黨的絕對領導」。⁶³在「以黨代政」的黨國體制下，「國家權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國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一切事情都歸書記管」，「書記成了實在的土皇帝」，「原來所謂『黨的絕對領導』只不過是法西斯式的獨裁政權的變種而已」。⁶⁴

其次，在權力壟斷基礎上，形成了「新興的官僚統治階層」。他們明確指出：「一個新興的官僚統治階層，在1957年之前就已萌芽，但在1957年後，它的特徵才清楚和完美起來。官僚統治階層的特徵在於：在政治上、精神上

60 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98。

61 張春元：〈農民、農奴和奴隸——當前農村剖視之一〉，《星火》第一期，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55。

62 顧雁：〈發刊詞：放棄幻想，準備戰鬥〉，《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28。

63 向承鑒：〈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0。

64 何之明：〈論「政治掛帥」〉，《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75-76。

和經濟上都享有特權，對其他階層人民進行欺壓、掠奪和奴役」⁶⁵——這大概最能體現六十年代的《星火》，和林昭繼承的五十年代「五一九民主運動」傳統之間的內在聯繫：他們始終堅持對「特權階層」也即「官僚統治階層」的批判和鬥爭。這是貫穿半個世紀的歷史任務：當代中國社會的每一個階段，特權階層都會有新的發展，因此反對特權階層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當代中國歷史而言，這是一條極為重要的線索，《星火》則是其中一個重要環節。

其三，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另一面，就是其他階層人民（特別是工農基本群眾）被剝奪、侵犯其基本權利，並處於被欺壓、掠奪和奴役的地位。「由於無休止的加班、加點的紅旗競賽，不斷加強勞動強度，嚴厲的懲罰制度（減薪和開除等），惡劣的勞動條件，使工人精神和體力終年終月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過高的勞動定額，使他們失去了應得的勞動報酬」；⁶⁶「農民經過公社化後，喪失了對一切生產資料的使用權，變為生產資料的附屬品和會說話的工具，而隨著也喪失了對生活資料的享有權，生產的產品完全不歸自己支配，不能保留與分得生活所需的起碼數量」，⁶⁷「並強迫以軍事組織形式將農民編制起來，實行奴隸式的集體勞動」，⁶⁸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實際上已經成為「依附農奴與國家奴隸」。⁶⁹這背後，存在一個對農民進行「超經濟、超政治的剝削和統治手段」⁷⁰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的路線。

65 向承鑒：〈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4。

66 向承鑒：〈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3。

67 張春元：〈論「人民公社」〉，《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83。

68 向承鑒：〈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2。

69 張春元：「人民公社化使得農業生產遭受到空前的破壞，糧食減產，各種輕工業原料和農副產品供應緊張，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下降，廣大農民陷於飢餓的漩渦中，這已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究其根本原因。首先是因為廣大農民在政治上既然處於依附農奴與國家奴隸的地位，一些起碼的生活條件與生存權利被剝奪得一乾二淨，就必然會出現像馬克思所說過的那種情況：『奴隸對勞動不感興趣。』」張春元：〈論「人民公社」〉，《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82。

70 張春元：〈農民、農奴和奴隸——當前農村剖視之一〉，《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

其四，權力的高度壟斷，必然形成「政治寡頭」統治；透過提倡「偶像崇拜」，壓制黨內外的民主，完全「沒有法制」，並且剝奪了「人民基本人權」。⁷¹人民公社制度更「扼殺與堵塞了農民在遷居、就業、外出謀生的起碼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與自由方面沒有絲毫權利，給農民戴上了無形的枷鎖，〔……〕像當代統治者所說的一切公民權利，如選舉、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言論自由等等，對農民來說則完全是騙局」。⁷²

其五，「寡頭政治」一方面必然導致思想壟斷，「當代統治者還玩弄著亙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農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以「打擊一些對農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從而對農民進行嚴密的精神控制；⁷³另一方面，則必然導致「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⁷⁴「胡作非為的能動性」，⁷⁵其結果就是任意執行「違反客觀規律、脫離物質基礎、脫離現實的反動政策，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和緊張局勢」，造成「生產力的巨大破壞」，⁷⁶給農民、國家和民族帶來極大的災難。

應該說，《星火》對「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的批判，對其政治、經濟、思想特徵的概括與揭示，把因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引發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危機而起的反思，提升到制度的層面。在很多方面，這些思考和顧準的思考是相通和互補的，構成六十年代民間思考的最高水平，而且具有明顯的超前性。而他們針對「國家社會主義」現行體制，提出「要建立一個使工

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55。

71 向承鑒：〈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4。

72 張春元：〈農民、農奴和奴隸——當前農村剖視之一〉，《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56。

73 張春元：〈農民、農奴和奴隸——當前農村剖視之一〉，《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56。

74 何之明：〈論「政治掛帥」〉，《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77。

75 何之明：〈論「政治掛帥」〉，《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76。

76 何之明：〈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星火》第二期（未出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78。

農勞苦大眾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會」目標，⁷⁷更表明這一代人依然堅持「真正社會主義」的理想，這一點和1957年校園民主運動是一脈相承的；而他們在六十年代的困難時期，再一次高舉「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⁷⁸在民間思想史上，更是上承五十年代顧準的思考，下啟文革、文革後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初，民間對「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再呼喚。

(三)張中曉：毛澤東時代的精神批判

現在，再向大家介紹另一位重要的民間思想者——張中曉。他是被毛澤東欽點的胡風分子，25歲(1955年)時被關進監獄，後因身體太差而保釋出獄。他回到家鄉浙江的小城鎮，在社會底層親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大饑荒、直至文革初期中國社會的變遷，並進行冷靜而獨立的觀察與思考，在極其艱苦的生活和被監視的情況下，祕密讀書寫作。他在36、37歲時(1966年或1967年)病逝，不知死期、沒有後代，但留下了三本筆記。這些筆記寫在小本子裡，字跡難以辨認，經過整理，於2006年編輯、出版為《無夢樓全集》。可以看出，他的思考極其艱難，卻達到了令人驚異的深度，是一個「未完成的思想家」。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一些思想的碎片，加上他是在被監視的情況下寫作，許多地方都是隱約其詞、欲說還休，需要今人作整理與發揮。因此，以下的論述，基本上依據張中曉的原文，但也包括我的理解與發揮。

如果說顧準和《星火》，主要是對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進行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那麼張中曉所關注的就是大躍進、人民公社背後的精神問題，著重於對毛澤東時代的精神批判。大體有三個層面。

首先，是他對毛澤東時代「精神統治的特點」的揭示和討論。我覺得在此

77 向承鑒：〈自白〉，《星火》第一期(油印刊)，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29。

78 在《星火》的其他文章裡，還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顧雁：〈發刊詞：放棄幻想，準備戰鬥〉，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28)，「民主、自由和科學社會主義」(向承鑒：〈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5)等提法，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層面有六個方面比較重要。

(1) 張中曉提出一個「絕對光圈」⁷⁹的概念，以討論毛澤東體制的哲學基礎

張中曉指出，毛澤東時代的思維、觀念、體制，及其外在語言形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使人不能有自己的心靈世界，而是必須把自己浸沒在絕對的光圈中，才能取得自己的存在」。⁸⁰而這個絕對物是多種多樣的，首先是「絕對真理」，比如宣布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絕對真理，此外還有「普遍性」、「歷史必然性」、「國家」、「公」、「上帝」，這些都要絕對服從、不容任何質疑。而所有這些絕對物，最後都落實在「黨」和「毛澤東」身上，張中曉指稱為「假先知」。⁸¹「假先知」是絕對真理的化身，是歷史必然性的體現，國家至上利益的代表，是公的意志的執行者，是人間上帝。因此，服膺於絕對光圈，就是要服膺於假先知、服膺於黨和毛澤東。

(2) 毛澤東時代精神統治的另一特點，就是「流氓政治」與「道德政治」的結合

張中曉指出，「流氓哲學與政治哲學之間，相隔不是萬重山而是一張紙」、「政治的道德性存在於康德所說的純粹理性領域，而在實踐政治中僅有流氓的跋扈」。他同時指出：「東方世間的王道(政治道德)之所以虛偽，就是在人的經驗(特別是感情)中投下道德者的假象，形成溫柔性，而把實際政治中的殘酷性掩蓋了。它形成了人們對統治者的幻想」，⁸²這就是流氓政治與道德政治的結合。由此，我聯想起東方政治中，「流氓皇帝」與「道德宰相」之間常出現的巧妙分工，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與周恩來是一個最佳配合。

(3) 毛澤東時代的精神統治，還是一個「堅強意志」的統治

張中曉指出，「鍛煉一個堅強的意志來統治無數軟弱的意志，是中土哲學

79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6)，頁143。文本裡張中曉談的是「八股文」的特點，但他又強調，這絕非「形式上的缺陷」，他所關注的是形式背後的思維、觀念、體制。

80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43。

81 參看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85、105、135、205。

82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06。

的中心，也是政治學的基礎」。⁸³這也是統治者的政治心理學：普通百姓處於貧弱狀態下，很容易精神貧乏，形成意志的軟弱。這樣的百姓，最容易受到如毛澤東這般有堅強意志的統治者的迷惑。就像我們在前一講中談到的「右派」和鳳鳴那樣，當人處在絕對虛無狀態時，只要一個人（何況是毛澤東這個政治強人，以及中國共產黨這股強勢力量）高呼一聲「跟我來」，就會不由自主地跟著他走。這就是毛澤東的強權統治能夠得到群眾呼應的心理學原因。

我由此想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軟弱性。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哈姆雷特性」，常使他們處於猶豫、懷疑的狀態，而不由自主、盲目地跟隨他者的強大聲音。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國家越弱，其弱勢階層（如農民），就越是希望有一個強權人物能夠引領他們，而實際上，農民構成了毛澤東這個強而有力的「好皇帝」的群眾基礎。這就是為什麼「開明專制」在中國始終很有市場的原因。

（4）張中曉在毛澤東的精神統治裡，發現了「無知和激情交織的東西」⁸⁴

他特意談到了「魔鬼的欺騙」和「假先知」的「誘引」：內心「具有正義感但又過於輕信，存心進步但又沒見過世面，不知人間利害，沒有人生經驗的少男少女們」，最容易上當「成為烤祭的牲畜」。⁸⁵他如此描述集權政治下的青春政治：「一個忿怒而又無理的人，只感到可惡但不知為什麼惡、惡在哪裡的人，還有什麼橫禍不會產生呢？他兩眼充血，滿臉凶光，義無反顧地向他認為可惡的東西撲過去，不管對方是不是無辜者。他像野獸，完全失去理智」。⁸⁶我們在大躍進和文革中都可以看到這種「無知與激情的交織」，這是一種破壞性力量，卻正是毛澤東所需要並最善於利用的。

（5）張中曉關注的，還有毛澤東時代的「愚民之道」

對此，他有兩個重要發現。其一，「愚民之道，最妙之法是讓他滿足於他所做的事情」、「不讓人瞭解他被剝削的真相，他將會滿足於被剝削，而把被

83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13。

84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216。

85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85。

86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32-133。

剝削認為社會服務」。⁸⁷在毛澤東時代，一切事情(包括受壓榨)都要說成是「為人民服務」或「為國家做貢獻」。如我們前面所討論的，本來高徵購是對農民的剝奪，但毛澤東卻用它的意識形態宣傳，將不惜死人也要完成高徵購任務說成一種「光榮」，讓農民心滿意足地被剝奪、心甘情願地做犧牲。

第二種愚民政策，是製造一種每個人皆在「被消滅者之外」的幻覺，彷彿自己「不是被人消滅而是去消滅別人」。⁸⁸其實，毛澤東所謂「兩類矛盾」的說法，就是要製造這樣的幻覺：「他人」是「敵人」，是消滅的對象；而「自己」是「人民」，因此自己在被消滅者「之外」。在反右運動中，我自己就是懷抱著這樣的幻覺，參與批判右派以圖自救的。即使是右派，因為有毛澤東的「矛盾可以轉化」理論，也會使人產生一種幻覺：人可以通過「接受改造」，而將自己變成被消滅對象「之外」的人，條件就是要參與對他人的迫害、永遠置他人於被消滅的地位。這樣，就必然造成為使自己不被消滅而進行的互相殘殺，這就是前已討論過的「受害者的理性合作」，這也是毛澤東的專政特別有效的原因之一。

(6)「愚民之道」以外，還有對付異端的特殊方法

張中曉指出：「對待異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滅它，而現代的方法是證明其系異端。宗教裁判所對待異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現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講出違反他說的本心的話」⁸⁹——這是張中曉的三大發現。

其一，是「證明你是異端」。此法就是橫加各種罪名：毛澤東時代的最大罪名，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反革命」；而當下，就是給異議者加上「反國家」的罪名。其實，只要把你除名，把你排除在黨、社會主義、人民和國家之外，之後加以任何懲罰，就似乎有了合法性。

其二，是「逼迫沉默」。通過對圖書、報刊的審查，限制言論自由，羅織罪名，網入獄中等等手段逼迫異議者沉默。

其三，是強迫思想改造、強迫檢討，強迫人說出「違反本心的話」。這都

87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91。

88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28。

89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21。

是毛澤東思想專政的最大特點、是他最擅長的精神統治手段。張中曉深受其害，自然就能抓住要害。

張中曉精神批判的第二個層面，是對於毛澤東時代「精神病象」的分析，這也有六個方面。

(1)「僵硬」與「敵對」⁹⁰

「僵硬」在此不多說，要集中討論的是「敵對」。

張中曉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當是：互相尊敬，互相幫助，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仇視、殘殺與傷害。應當是夥伴關係，而不是互相敵對的關係」，⁹¹這自然是他的有感而發。如我們前面所討論，毛澤東階級鬥爭的治國路線，從所謂「胡風事件」為開端，實質上就是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地在民眾之間製造仇恨與敵對關係。對此，張中曉有深刻的體驗，因此他痛心而尖銳地指出，人與人關係的敵對化，是把國民培育成了一個個「滿懷復仇情緒的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到處都是仇人」，⁹²而這股怨毒，又反過來構成毛澤東「階級鬥爭」的心理基礎。

(2)「恐懼」

張中曉說：「小人畏刑，君子畏天，恐懼和畏罪，是中國道德實踐的基礎」，「謹慎，由於恐懼」，「恐懼的另一端是盲動。一種拼命主義，但是同樣由於缺乏內在獨立性」，「中國人的行善，同樣由於恐懼」⁹³——這都是極深刻的概括和總結，有著豐厚的歷史內容。

首先，是毛澤東時代的「全民恐懼」：不僅「小人」恐懼、普通老百姓恐懼，「君子」與統治者亦有恐懼。普通百姓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而無安全感，統治者則為統治權威受到挑戰而憂心——我們已多次談過，毛澤東總是時刻感到自己統治合法性的危機。

張中曉進一步討論全民恐懼的後果。不但所有人都謹小慎微、不敢有越

90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18。

91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216-217。

92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86。

93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15。

軌之舉，而且恐懼有時還會導致狂熱與盲目的行動。在反右運動和大躍進中表現最狂熱的那些人，其中有些就是因為自己有把柄落在黨的手裡，因為恐懼，就表現得特別激烈。在毛澤東時代，出身不好的人反而最容易「左」，這種「左」的背後是一種恐懼感；而「行善」的背後，則是怕「遭報應」，因此以行善求安全。張中曉指出，恐懼的實質就是「缺乏內在獨立性」，這是抓住了要害。

(3)「怯懦」

張中曉還發現了大多數普通人身上的「怯懦」：「當看不出是與非之間、固執謬誤與堅持真理之間的區別，而根據一己的利害和當時的標準（風氣）來糾正自己的不合時宜之處，則對於橫逆之來，都可以心安理得」。⁹⁴這也是我們第六講所分析的，毛澤東時代的歷次政治運動（從反右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大多數人都是出於怯懦而跟著走；他們內心明白，雖有不安卻不敢反抗，因而成為毛澤東統治的群眾基礎。

張中曉還指出：「怯懦之人，無力行惡，但也無能行善（為正義而鬥爭）」、「當一旦他們認為自己有力（虛假的）的時候，可粗暴蠻橫哩」，⁹⁵這真是一語道破毛澤東時代的群眾專政的祕密。

(4)「虛無主義」與「感官耽溺」

這又是張中曉的一個獨特發現：人們通常認為，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盲目信仰的時代；但張中曉卻發現了「虛無主義」與「眼前的快感和歡娛就是一切」的「感官中耽溺」。⁹⁶他指出，信仰一旦褪色，很容易便陷入什麼都不相信的虛無主義，「一個偉人無論如何自命為高尚神聖，如果解除了他的思想武器（理性、公義等等），便是一個沉溺於情欲的大壞蛋」。⁹⁷張中曉說，中國的國

94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88。

95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32。

96 張中曉：「懷疑論、虛無主義、不可知論。／存在主義——存在就是一切。／眼前的快感和歡愉就是一切——感官中沉溺，是生活的最高享受，生活的一切不過追求眼前的目標。」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26。

97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83-184。

民性裡，「人類精神的三個方面(人道觀念，人生義務和人生感情)是毫不存在的，只有封建的放縱」，因此，在中國既不會出現真正的抗爭，也不會有真正的順從；「因為人民總以他們的邪惡的情欲、求生的要求來反抗抽象的『禮』的」，⁹⁸「如果物質生活提高，而心靈空虛，精神萎縮，那麼，精神就不足養活肉體，必然流為放縱和狂蕩」⁹⁹——張中曉這一分析有相當的超前性：許多人理解為什麼文革後的中國大陸，會一下子從信仰主義轉向虛無主義和情欲主義。張中曉早就看到其背後邏輯，並為我們解釋了內在原因。

(5)「廉價的信徒」與「廉價的叛徒」

不能否認毛澤東有無數的信徒，但張中曉一眼看穿：「人們聽從你，相信你，為你犧牲和拚命，並不是僅僅由於你的正確，而是決定於許多許多因素。但是使人行動起來的主導原因，往往是一種盲從，而不是出於確信。他們立刻會後悔的，這就是動搖、變節和叛變，因此，廉價的信徒同時也是廉價的叛徒」。¹⁰⁰在某種程度上，這正是毛澤東的悲劇所在：他擁有的只是廉價的信徒，而現在，許多人又成了廉價的叛徒。

(6)「奉承」與「輕信」

這又是一個毛澤東的悲劇：「喜歡奉承便會出現阿諛頌詞，自己輕信就會被別人欺騙」。大躍進中無數的人奉承他、對他說了無數的好話，而他輕信了，並造成嚴重的後果。但張中曉看得更深，他說，輕信是因為謊言「正中他的下懷，使他有了採取符合他本性的行動的藉口，即使沒有什麼證據，他也會相信」。¹⁰¹毛澤東輕信那些高產數字(包括錢學森的「科學論證」)，是出於他的統治需要，因此「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正是因為他需要這些高產數字以證實大躍進的正確性，奉承與輕信，就成為大躍進體制中互相欺騙、自欺欺人的雙重表演，即所謂「上有所好」，就必有「投其所好」者。

張中曉思考的第三個層面：關於毛澤東思想統治下的「精神堅守」問題。

98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11。

99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01。

100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31。

101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86。

首先，他提出一個很深刻的命題：壓迫的「腐蝕」。¹⁰²通常講對人的腐蝕，最容易聯想到金錢的腐蝕或名利的腐蝕，但是張中曉卻發現，被壓迫的狀態也會對人的精神產生腐蝕作用、產生精神的迷亂。他說：「在這多難的人間，人成為畜生的機會太多了，人墮落為畜生的可能、遭遇也太多了。舉凡貧困、監禁、苦役等等，都能使人墮落為獸，使人性情粗暴、脾氣怪戾、絕望和不近人情」。¹⁰³專制的壓迫會造成人的孤獨感、受壓抑感、屈辱感等等，雖有可能因此而激發起人的反抗，但也可能造成自我精神的傷害，最容易產生「怨毒」情緒。「怨毒」一方面是怨憤，這種怨憤可能引發正義的反抗，但同時又是一股毒氣、邪氣，使人性發生扭曲，變得孤僻、乖戾，開始對人性的善良產生懷疑，並且會為了反抗而把自己的心靈硬化，把人性中最柔和的部分，關於愛、關於溫情等等都極力地排除，有時候人就會變得不近人情，構成了受迫害自身的精神黑暗。因此，張中曉提出：人受迫害，陷於孤獨，而「孤獨是人生向神和獸的十字路口，是天國與地獄的分界線」。¹⁰⁴我想，有這種受迫害經歷的人，大抵就會面對到這樣的問題；張中曉的提醒，足以引起我們的自我警覺與反省。

從另一面說，這也是專制體制的罪惡所在：講到專制體制，通常比較重視它對人肉體的摧殘，而忽略它對精神的摧殘；講到精神摧殘，常常講人的被奴化，而忽略了人心的被毒化。其實，對人心靈的毒化是更為內在的。

張中曉據此提出「寬恕和忘記」。他在一篇日記裡這樣寫道：「過去認為只有睚眦必報和鏗而不捨才是為人負責的表現，現在卻感到，寬恕和忘記也有一定意義。」意思是說，只要不被邪惡利用和犧牲，寬恕和忘記是有意義的。他因此說：「耶穌並不是完全錯」。而讓我尤其感動的，是這一段日記下面還有一段話：「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病發後六日晨記於無夢樓，時西風凜冽，秋雨連霄，寒衣賣盡，早餐闕如之時也」。¹⁰⁵就在這般饑寒交迫的逆境下，張中曉還在思考著寬恕和忘記，這確實說明他的精神境界達到一個相當的高度。

102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202。

103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88。

104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89。

105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25。

於是，他又提出了「信深守固」的命題。¹⁰⁶所謂「信深守固」包括兩個含義，一是強調人要有深刻的信仰，才能堅持真理；另一是主張守住作為人最基本的信念，也就是守住人的純潔。張中曉說，人如此就能獲得「心靈的深度和穩定性」：「根本深者，心境安詳，視死如歸，如歸天國如歸大地，或視平常，毫無畏懼之情」、「根本深者，可受長期疾病之折磨」。¹⁰⁷我們可以把這看作是張中曉的自我精神描述：他已經從毛澤東時代的精神迫害裡升華了，並升華出一種精神。而且我們發現，無論是顧準，還是林昭、張春元、杜映華等《星火》戰士，無不是以「信深守固」的精神，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拯救了自己和我們民族的靈魂：這是非常寶貴的精神遺產。

我想，這就是中國歷史的辯證法：在反右運動中出現了林希翎、林昭，在大躍進、大饑荒的全民性災難中出現了顧準、張春元、杜映華、張中曉；這些人都是毛澤東集權體制所培養出來的掘墓人、歷史的審判者，他們的思考與批判，都深扎在中國多災多難的土地上，是民族、民間的精神財富。

二、如何走出困境？

可以這麼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走到1961年時，已經到了谷底，人心的混亂也到了極點。中國該如何走出困境？這是當時所有中國人（也包括毛澤東）眼前要面對的問題。

這裡我們需要補敘一段之前尚未討論的歷史，那就是中蘇關係的惡化。我們之前的講課已經提到，1957年底，世界共產黨的莫斯科會議上，中蘇之間的分歧就已經顯露了，而分歧的核心，是要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¹⁰⁸到了1958年又發生兩件事，一是赫魯曉夫突然建議中蘇聯合組成潛艇

106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55。

107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頁183。

108 據毛澤東1974年5月25日〈同希思的談話〉裡所說：「中蘇的分歧要從1954年開始算起」，赫魯曉夫1955年對來訪的西德總理阿登納（Konrad Adenauer，1876-1967，德國）說：「中國不得了了」。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頁603。《赫魯曉夫回憶錄》裡也說：「自我第一次認識毛澤東起，我就認定並告訴我們的同志，他絕不會聽從於國際共運內部超過他自己的黨之上

艦隊，另外，他又接著提出要在中國南方建立長波電台，允許蘇聯使用。赫魯曉夫這個人做事比較魯莽，他根本沒想到這兩個建議會引起中國方面（特別是毛澤東）極其強烈的反應。後來，赫魯曉夫才發現他的冒失，因此承認他的建議「觸及了這個曾長時期受到外國征服者統治的國家的敏感問題」、「觸及了中國的主權」，也傷害了毛澤東和他的民族熱情，並表示「當時我們有些急躁，誇大了各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一體化的意義」。¹⁰⁹這就表明，中蘇矛盾不僅是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更涉及了國家利益；而後者或許是更為根本的。

緊接著1958年，毛澤東決定向金門開炮，卻沒有預先告知赫魯曉夫。當時中蘇之間尚有軍事同盟，中國在金門開炮，很可能引起美國介入、從而成為國際問題。毛澤東的決定沒向蘇聯事先通報，赫魯曉夫自然很不高興。後來，中國和印度邊境發生戰爭時，赫魯曉夫採取所謂中立的態度，這也讓毛澤東很不高興。

連續發生這兩件事，就引起中蘇關係的進一步緊張。1959年6月，蘇共單方面決定停止供應中國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指導，並開始對中國進行封鎖；而中國方面做出的反應，是藉著列寧的誕生紀念日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幾篇文章，¹¹⁰這實際上就是公開批判蘇聯，因而拉開中蘇冷戰的序幕。1960年7月16日，蘇聯單方面宣布將在華的俄籍專家（約1,390人）全部撤回，原本要派900名專家來華也取消了，並在同時，宣布停止執行443項專

的任何別的共產黨，他絕不會容忍這樣的事」（見《赫魯曉夫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頁659）、「我記得1954年我從中國回來以後曾告訴過我的同志：『同中國人的衝突恐怕難以避免了』」（見赫魯曉夫著，張岱雲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頁665）、「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至少在我認識他的時候，他爆發出了一種急不可待地要統治世界的願望。他的計劃首先是統治中國，然後統治亞洲，然後，……又是哪裡呢？」（見赫魯曉夫著，張岱雲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頁673）。

109 赫魯曉夫著，斯特羅勃·塔爾伯特編，上海《國際問題資料》編輯組譯：《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北京：三聯出版社，1975），頁399、401。

110 三篇文章除《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列寧主義萬歲〉外，還有《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和時為中宣部長陸定一在列寧誕辰九十週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參看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067。

家的合約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¹¹¹

蘇聯單方面地撤出對中國的經濟支持，這對正面臨著嚴重困難的中國經濟，自然是雪上加霜——雖然這嚴重地打擊了中國，但中共之後的宣傳，把大饑荒原因歸咎於蘇聯的封鎖，並不符合事實，因為大饑荒在此之前已經發生了；蘇聯的封鎖只是加深了中國經濟的困難，並不是造成災荒的原因。

赫魯曉夫宣布對中撤回蘇聯援助時，中國共產黨正在開工作會議，毛澤東當即做出回應：「我們既不能向赫魯曉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國乞求。〔……〕。現在我們可能而且必須搞自力更生」，¹¹²並且迅速地將赫魯曉夫的背信棄義向全黨傳達，為全國人民所知。這引起強烈反響，並集中在兩點，一是「革命的重心已移向亞非拉，革命的指導中心已移到中國，我黨應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責任擔當起來」；另一是強調「將義憤化為力量，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勤儉建國」。¹¹³

顯然，蘇聯在這個時候對中國高壓封鎖，喚起了極大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這是中國所遭遇的第二次封鎖：第一次在1950年的建國初期，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 1884-1972, 美國)宣布保護台灣之後，接著全面封鎖中國大陸，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封鎖；到了六十年代，就是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陣營對中國的封鎖。而這次封鎖，來自於被大家視為老大哥的蘇聯。我曾經談過，我那一代人都認為「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當蘇聯這個學習榜樣突然對中國背信棄義，就使得六十年代新一輪的民族主義情緒沾染上悲壯色彩。當時，幾乎所有中國人，包括我這樣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被欺騙、被出賣、被全世界拋棄、包圍的感覺，彷彿整個國家、民族都走到了絕境。我要強調，這些感覺是全民性的，而不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正像去年(2008年)汶川地震時我說過的，中華民族平常惰性很強，然而一旦到了絕境，就會自然產生一種反彈力量，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就靠自己救自己。在中國，這股全民族的自救力量，

111 轉引自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頁86。

112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頁335。

113 〈黑龍江省委傳達北戴河會議精神的報告〉(1960年8月29日)，詳見毛澤東：〈轉發黑龍江省委傳達北戴河會議精神報告的批語〉(1960年9月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281-282，註釋(3)。

是非常巨大而深厚的。

毛澤東作為一個政治家，他的過人之處，就在於能夠非常敏銳地把握民族情緒。當時，他立刻牢牢地抓住這些氣氛，展開了大規模的宣傳攻勢，竭力誇大世界反華浪潮，強化中國「被包圍」的孤獨感，並強調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他以「國際反華勢力」轉移人們對國內問題的所有不滿，反過來以此增強國內的凝聚力。我們以前講過，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是用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來作社會動員，在大躍進導致大饑荒後，空想社會主義理想已不再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這時就只能依靠民族情緒。毛澤東及時高舉兩個旗幟，一是「自力更生，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的旗幟，一是「反對修正主義，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使中國成為世界革命中心」的旗幟。歷史又再一次把毛澤東推上「民族獨立意志的代表」、「民族利益和尊嚴的維護者」的地位，並且迅速得到了老百姓，也包括知識分子的支持。

由此可以看出，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有兩面，一面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性，另一面也有強烈的民族性；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既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時也是民族主義者。而實際上，最後真正站得住腳、真正得到民眾支持的，是民族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想可以振奮人心，然而，一旦自身發生問題，就很難以之凝聚人心；但民族主義的凝聚作用是持久的，而且很有力量。這一次，本來處於大饑荒困境中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以蘇聯封鎖中國為契機，再一次地以「民族利益和民族精神的代表」身分，取得民眾支持，絕路逢生。

同時，毛澤東和他的同僚，面對由經濟困難引發的整體性緊張狀態，採取了相對寬鬆的政策，及時提出了「調整、整頓、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總體來說，這就是向老百姓（特別是農民）、向知識分子讓步，以重新凝聚人心，並且在經濟、政治上很快地取得成果。這裡要多說幾句的是，1961年政府提出「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方針，大幅調整農業政策。

首先是大幅削減國家徵收、徵購糧食，從1959年的6,740萬噸減到1961年的4,050萬噸，之後農村留糧大增，占總產量的82.6%，基本上達到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水平。同時，農產品收購牌價也提高了，1961年油料作物提高19%、1963年棉花收購牌價提高10%。最後，為了提供低收入農民更多

現金和實物，農村地區福利費ⁱⁱⁱ在1963年已達到1958-1962年一般水平的3倍。¹¹⁴這些及時、到位的措施，都對促使農村走出饑荒絕境，農業生產恢復並發展，也緩和了黨與政府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對穩定社會起了很大作用。

三、我在大饑荒年代形成的毛澤東觀和魯迅觀

這裡，我要講一點自己在大饑荒年代的經歷和思想。1960年8月我大學畢業，經過一些曲折，最後分配到貴州安順的衛生學校教語文。本來，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很想進研究所繼續學習。但那時研究所入學不是通過考試，而是保送。按道理說我很年輕、成績很好，應該是理想的保送對象，但黨組織卻告訴我：「你書讀得太多，已經夠愚蠢了，應該到實際生活中去改造」。當時我聽了也覺得有道理，還抱有個浪漫的想像：愈到邊疆、偏遠的地方去，愈能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所以，某種程度上，我是半被迫半自願地到了貴州。一到貴州，就遇到大饑荒；我每個月的糧食定量，由大學的40多斤（有一部分是飯量小的女同學支持的）一下子降到23斤，幾乎減了一半。可以想像當時的我，完全被饑餓所困擾著，情況跟顧準日記所描述的差不多，晚上餓得睡不著覺，真的餓得心慌！不過，我畢竟還有23斤的糧食，再加上「瓜菜代」，儘管我也患了浮腫病，但總算沒有倒下。面對饑餓，我自己的辦法是用精神來補，用很大的勁拼命讀書。讀些什麼書呢？一是讀魯迅，我從北京帶來一部《魯迅全集》；另一是讀毛澤東的著作。1960年9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公開出版，集中了從抗戰勝利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幾年時間的毛澤東著作，突出毛澤東自力更生的思想，我讀了以後大受啟發。此外，一個偶然的原因之下，我發現安順小城的圖書館裡，正好有一些東方國家的書，我因此讀了些印度、日本的作品。我在大學裡主要是讀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名著和俄國文學，在大饑荒年代，我卻補讀了東方文學作品，也因此有了下面要討論的「東方」的觀念，當然這也和魯迅一貫強調「被壓迫民族文學」的影響有關，可以說是個意外的收穫。

當時，我還一邊讀書一邊思考，思考的中心就是毛澤東高舉的兩個旗

114 數據轉引自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424-425。

幟：一個是自力更生，一個是反對修正主義。正是這樣的思考中，我找到了魯迅和毛澤東之間的連結點，也找到了我和魯迅、毛澤東之間的思想通道。

我在1962年1月1日那天寫的讀書筆記，已經收入了《課用選文》，同學們有興趣可以去讀，這裡僅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1962年初中國還沒走出大饑荒，也就是說，我是餓著肚皮寫讀書筆記的，題目就是〈魯迅與毛澤東〉。文章一開始，我就引用了葉劍英元帥的詩句：「東方風格千秋在，舉世囂囂也枉然」。「舉世囂囂」顯然是指全世界的反華浪潮，重點自然是強調在反華浪潮面前無所畏懼（「也枉然」），因為自有「東方風格千秋在」。這裡，我突出了東方被壓迫民族的精神，而且把毛澤東和魯迅看作是「東方民族精神」的代表，並由此引出這樣一段文字：

在1962年的第一天，我寫下這兩個光輝的名字，心裡感到說不出的驕傲與幸福。我為我們民族產生了這兩位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巨人感到自豪；我也為我們能夠從這兩位巨人的著作裡吸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與力量感到幸福。在我唸著這兩個巨人的名字的時候，心中很自然地就湧現出在這篇文章一開頭所引用的葉劍英的這兩句詩。提到「東方風格」就不能不想起這兩個巨人；在這一一年來，我常常深思這個問題：什麼是為無產階級思想所照耀的我們民族的性格特點？這個民族性格（也就是葉劍英在這裡所說的「東方風格」）有什麼意義？作為一個現代中國人，作為一個黨的事業的接班人，應該怎樣繼承與發揚這個「東方風格」？……。在我深思這些問題時，在我的面前，總要浮現這兩個巨人高大的身影。他們「橫眉冷對千夫指」，在一切敵人與困難面前，昂首闊步，高舉著投槍，如入無人之境；他們「俯首甘為孺子牛」，在人民面前，謙虛謹慎，吃進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們埋頭苦幹，實事求是，不事喧嘩，不尚空談，一步一個腳印；他們堅忍不拔，刻苦勤儉樸素，宛如一個田間的農人。……正因為這樣，我大膽地在這新的一年的開始，寫下了這個題目。¹¹⁵

這篇文章很長，有上萬字，詳細地討論毛澤東和魯迅的關係，且著重討論

115 參看錢理群：〈魯迅與毛澤東〉（1962年1月1日），《走進當代的魯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355。

「毛主席稱讚魯迅先生的那種沒有絲毫奴顏與媚骨的『硬骨頭』性格，那種對無論什麼凶惡的敵人都絕不屈服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嫉惡如仇的反抗性格」，¹¹⁶並談到毛澤東與魯迅共有的韌性精神，「就是『鏗而不捨』地與敵人做堅毅、刻苦、執著的持久戰鬥，就是冷靜地對待敵人，注意保存實力，講究鬥爭藝術」，¹¹⁷因此，我的結論是：「如果說魯迅先生是站在文化的戰線上，那麼，毛主席就是站在整個革命鬥爭的戰線上，帶領著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¹¹⁸

緊接著，我就作了一個歷史的回顧，回顧建國初期「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帝國主義者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著我們失敗』。正像毛主席所形容的，『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但也正像毛主席所說，「『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¹¹⁹

最後，文章就講到這樣一個魯迅式的東方風格，在1962年的現實意義：在62年的開始，總結由毛澤東同志與魯迅先生所集中代表的中華民族這一光榮革命傳統、戰鬥風格是極有意義的。我們現在正在與現代修正主義者展開一場極為複雜艱巨的鬥爭。現代修正主義者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物。他們的重大特色就是「被帝國主義的核戰爭訛詐政策嚇破了膽。他們由害怕戰爭進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進而反對別人革命」，他們散布對帝國主義的幻想，企圖向帝國主義乞求和平。他們沒有絲毫的革命者的骨氣，相反，倒處處顯露出他們為人不齒的「奴顏」和「媚骨」。不僅如此，現代修正主義者還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在政治、經濟、軍事

116 錢理群：〈魯迅與毛澤東〉（1962年1月1日），《走進當代的魯迅》，頁357。

117 錢理群：〈魯迅與毛澤東〉（1962年1月1日），《走進當代的魯迅》，頁358。

118 錢理群：〈魯迅與毛澤東〉（1962年1月1日），《走進當代的魯迅》，頁358-259。

119 錢理群：〈魯迅與毛澤東〉（1962年1月1日），《走進當代的魯迅》，頁359。

上對我們施加壓力，企圖封鎖我們，孤立我們。他們更指望幾年來嚴重的自然災害所給我們帶來的暫時困難，會使我們向他們屈服，向他們乞求。但是他們是大大失算了，今天的中國已遠遠不是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了。那時候，毛主席就說過：「多來一點困難算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現在十年八年已經過去了，中國不知道闖過了多少關，已經奠定了強大的工業化基礎了。現在的形勢更加是：「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了，他們快要完蛋了。」現代修正主義者在帝國主義唆使下瘋狂一時，也只是迴光反照而已。「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中國人民一定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發揚民族的浩然正氣，發憤圖強，立革命大志，樹雄心，衝破一切困難，一切敵人的包圍、封鎖，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且應該看到，中華民族的這種「硬骨頭」精神，這種「韌性戰鬥精神」，正在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鬥爭，發生越來越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在目前與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者的尖銳鬥爭中顯得更加明顯，也更加重要。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現在已經到了中華民族對世界作出更大貢獻，發生更大影響的時候了。¹²⁰

這裡所表達的情緒，在當時大概是有相當代表性的。但在今天重新審視，恐怕也還是要說兩句話。

首先注意到，整篇文章談的都是如何去反抗帝國主義的封鎖、如何反對修正主義，完全回避了國內的問題，包括大饑荒這樣的嚴重問題，可以說是用「反帝反修」掩蓋了國內問題。這本身就違背了魯迅的思想。魯迅一再發出警告：絕對不要在「一致對外」的口號下，遮蔽國內的壓迫關係，用民族問題掩蓋社會矛盾，絕不能因為拒絕「異族的奴役」，而甘心做「自己人的奴隸」。¹²¹

問題更在於，我根本沒有獨立面對、深入思考大饑荒所暴露出的中國社

120 錢理群：〈魯迅與毛澤東〉（1962年1月1日），《走進當代的魯迅》，頁363-364。

121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半夏小集》（1936年10月），《魯迅全集》第6卷，頁617。

會體制問題，反而輕信當時的意識形態宣傳，深深地陷入盲目崇拜毛澤東的思想陷阱之中。今天，對照同時期顧準、林昭、《星火》思想群體、張中曉們的思考，實在感到汗顏。

然而，也不能因此否定文章裡所傳遞出的，當六十年代中國面對確實存在的蘇、美聯合封鎖時，所激發出的民族精神的積極意義。這篇文章所強調的魯迅式「硬骨頭精神」和「韌性精神」，以及六十年代中國工人所創造的「大慶精神」^{iv}、農民所創造的「大寨精神」^v、知識分子所創造的「導彈精神」^{vi}，同樣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精神財富。儘管這些精神，曾經被意識形態化，並且產生不同程度的扭曲，但構成其核心價值的「不屈服於任何壓力」的民族獨立自主精神、「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民族自救精神、以及「不屈不撓」的長期奮鬥精神，依然可以作為「東方風格」，並成為今天的重要思想資源。

對我自己而言，我在1962年的「魯迅觀」和「毛澤東觀」，儘管在後來產生很大變化——比如我對毛澤東，以及毛澤東和魯迅之間的關係，就有了更為複雜的認識（可以參看我的〈毛澤東與魯迅〉演講）——但其中所強調，作為「東方風格」的魯迅式硬骨頭精神和韌性精神，依然是我今天思考的重要出發點。

大饑荒的問題，到這裡才算講完。

編註

- i 「彭、張、黃」反黨軍事俱樂部：「彭、張、黃」指彭懷德（國防部部長）、張聞天（外交部副部長）、黃克誠（中國軍隊總參謀長）。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些人因批評毛澤東的三面紅旗，被毛澤東定成反黨集團，此集團包括彭、張、黃三人與周小舟（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因此也被稱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又稱「彭德懷反黨集團」。
- ii 中國共產主義者聯盟：1960年5月，《星火》群體張春元、林昭、杜映華、顧雁、向承鑑等人籌組擬以「中國共產主義者聯盟」為名的組織，又擬有「中國共產黨革命（或革新）委員會」、「中國勞動農工同盟」等名，但因意見不一而未正式擬定，也因成員謹慎而未真正組成。
- iii 農村地區福利費：指國家為農村貧困農民專門提供的福利經費，在大饑荒年代有所提升。
- iv 大慶精神：1960年代中國遭到了外國經濟封鎖以後，在東北大慶油田，舉行石油會戰，集中開採，很快做到了石油自給，並形成了以「愛國、創業、求實、奉獻」為中心的「大慶精神」。
- v 大寨精神：1963年山西大寨遭逢水災，卻提出「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物資，但是國家賣糧不少、社員口糧不少、集體庫存糧不少）的口號。1964年1月支部書記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介紹大寨經驗。3月28日毛澤東南巡聽取了山西

省委書記陶魯笏關於大寨的報告，毛澤東在之後強調要搞好中國農業，要依靠大寨精神。1964年4月周恩來考察大寨經驗，並於12月將大寨精神寫入三屆人大的工作報告中，宣布大寨精神是以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為原則，特點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vi 導彈精神：指六十年代研製導彈過程中形成的「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科學技術」的精神。

第八講

通向文革之路(上)

1962-1965

| 2009年11月3日講 |

歷史走到了1962年，這又是共和國歷史一次大轉折的開端。

這一年，中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又經歷一次風雲突變。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召開一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有中央、省、地、縣四級幹部和重要工礦企業及大型軍工廠、軍隊的領導參加，共7,000人，是中共成立以來所舉行過規模最大的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用毛澤東的話說，最後成了「出氣會」，總結了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到大饑荒這一段歷史的經驗教訓，從毛澤東到各級幹部都做了檢討，承擔了各自的責任，底層的幹部終於出了一口氣，最後一起商量走出困境的方法。¹應該說，這次會議對中國共產黨走出大躍進、大饑荒造成的困境起了積極作用，但在同時，也暴露出很多矛盾，為後來的突變埋下了根。不管怎麼說，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確立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1958年以來一直繃緊的弦終於鬆了下來，國民經濟也在逐步恢復中。但是，到了1962年的7、8月又開了一次工作會議，9月在北京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¹，情勢卻又風雲突變，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隨即又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階級鬥爭新風暴。這就是1962年的中國歷史：從年初到下半年，短短六、七個月時間之內，中國政局發生了急劇動盪。變化如此之快，如此之突然，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1957年5月「整風」到6月「反右」、1959年廬山會議從「反左」到「反右」，都是在很短時間內驟然突變。究竟怎麼一回事？這又是一個「共和國之謎」。

風源在中國農民這裡。我們一再說過，考察中國問題（特別是毛澤東時代

1 參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的中國)，一定要注意中國農民的動向。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和農民的關係，始終是一個「中國主題」。因此，我們首先要從這裡談起。

一、中國農民的呼聲

我想從我身邊發生的一件事說起。

1962年3月31號，當時貴州省委的宣傳部長汪小川(1913-2005)，到我所住的城市安順的郊區二鋪(今天人們所熟悉的屯堡區之一)作農村調查。調查會所反映出來的情況，讓調查者大吃一驚：一個大隊1957年的糧食產量高達32萬斤，但1961年卻只收到12萬斤，而徵購任務仍然是6萬斤，這也就是說，農民手裡的口糧只有6萬斤。如果扣除其他的消費，每個農民拿到平均不到100斤的口糧，按一天吃1斤計算，勞動一年只夠吃三個月。於是大隊長汪榮武(生平不詳)說：「『一日無糧千兵散』，社員口糧少了，牛飼料也沒有了。『沒有飯吃，人心不齊，社員思想落後，不聽話了。』」更嚴重的是，饑荒造成了大量的死亡：黃臘公社(我曾在那裡勞動過)1961年的人口，比起1957年的少了2,000多人、牛的死亡率達到60%。²

這位大隊長說出了當時中國農村的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也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沒有飯吃」。我們前面討論過，從顧準「糊口經濟」的角度來看，歷史所提出的「史前期社會主義」中心任務是要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但是，即便1958年曾經雄心勃勃地提出「吃飯不要錢」口號，但到了1961年中國農民卻落入「沒有飯吃」的境地，這是一個極大的失敗，從而構成了史前期社會主義的空前的危機。

如何解決危機？農民提出，他們可以「生產自救」，前提是「把土地還給我們」，農民至少要擁有經營權，這當時稱為「包產到戶」：土地的所有權歸集體，以「戶」為單位進行生產、經營，收穫的糧食在繳納國家公糧之後，都歸農民自己支配。農民說得很清楚，現在若還要像1958年那樣搞「大兵團

2 《二鋪調查》：〈石龍達對座談會紀要〉、〈對某些經濟政策的反應〉(1962年3月-4月)，轉引自杜應國：〈理性的聲音——汪小川《二鋪調查》四十五周年祭〉，《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62期(2007年5月31日)首發。

作戰」，是不可能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一位大隊書記說：「農民習慣單家獨戶的生產，祖祖輩輩都是這樣，一家三哥四弟都要分家，何況幾十個在一起生產」。農民總結這幾年的經驗：「酸、甜、苦、辣都嘗過了，飯也餓夠了」、「只有各幹各，不然還要餓飯」。有個農民甚至在會上說：「就是把機槍抵在肚皮上，也是不願〔錢註：把土地〕收歸集體」、「要叫我們餓飯，就把土地收回去，要叫吃飽，就讓我們這樣〔錢註：各幹各〕做年把看」。這就是農民的邏輯：要解決吃飯問題，就要把土地經營權和糧食分配權交給農民自己。³

由於已經到了生死關頭，農民要求單幹、要求包產到戶的意志十分堅決、不可動搖。參加會議的人有94%主張田土下放，而且他們已經採取各種形式，自發地實行包產到戶，並已收到效果；事實上，農民是靠著包產到戶而逐漸地恢復生產、度過饑荒的。⁴

應該說，我所在的安順地區的農民呼聲，代表了當時絕大多數農民的聲音。農民運用各種方式，通過各種途徑，頑強地表達他們的意志。其中一個方式，也是中國農民的傳統方式，就是「上書」。這裡有一本書《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編者苦心搜集了一批那個年代農民的上書，我在這裡選兩段唸給大家聽——這是真正的農民呼聲。

一位湖南澧縣開口公社的農民，在1960年6月16日寫了一封信給當時各級的領導：「敬愛的首長，我們今天的生活真是苦極了。我們這裡餓死的人太多了，哪個生產隊都有上百個人餓死」，「社員沒糧食，只好到處去挖野菜、剝樹皮，就連觀音土都是好東西。還有的人偷偷吃死人，有吃死屍的，有吃逃荒死在路上的，還有吃活人的！這樣下去怎麼得了！我們公社就發現好幾起吃人的事，讓人聽起來就寒心！活著的人就遭了大罪了。家家戶戶都有人得浮腫，小孩子餓得兩根腳杆像麻杆，老人全身像乾柴，婦女連月經都停了」。「我想，這都是公社化以後的事。一是公社化，土地歸公，吃飯食堂，

3 《二鋪調查》：〈石龍達對座談會紀要〉、〈對某些經濟政策的反應〉（1962年3月-4月），轉引自杜應國：〈理性的聲音——汪小川《二鋪調查》四十五周年祭〉，《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62期（2007年5月31日）首發。

4 《二鋪調查》：〈石龍達對座談會紀要〉、〈對某些經濟政策的反應〉（1962年3月-4月），轉引自杜應國：〈理性的聲音——汪小川《二鋪調查》四十五周年祭〉，《二十一世紀》網路版第62期（2007年5月31日）首發。

幹部有權，作威作福，他們吃肉喝酒，社員吃糠咽菜。二是糧食徵購，上交太多，社員吃不飽，生產沒積極性」。「領導上只要能開恩，讓我們種一點自留地，子孫後代都會感念共產黨大恩大德的。政策不變，只怕拖不了兩年，人都會餓死的」。

這封信還專門討論了共產黨和農民的關係：「得人心者得天下，共產黨得天下是得了人心的。就我來說，餓死也要說共產黨好。但如果能讓老百姓不餓死，不是更好麼？唐皇李世民得天下後，還提醒自己，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資治通鑑》上都有這句話的。當初大躍進時，中央不是告訴我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天堂，一天三餐，有肉有魚有水果，樓上樓下，汽車電話麼？縣委組織各鄉討論，這個文件精神是傳達了的。怎麼今天搞成這個樣子？我始終沒想出一個名堂來」⁵——大躍進時「共產主義幸福生活」的承諾猶言在耳，轉眼間卻變成餓殍遍野，善良的農民並沒有追究責任，只要求共產黨和毛澤東放自己一條活路。而共產黨與毛澤東又作何回應呢？

這裡還有一封從劉少奇的家鄉——湖南的花明樓的農民於1960年寫給劉少奇的信：「您當了國家主席，是我們寧鄉人的驕傲。一說起國家主席是我們花明樓的人，那更是我們的光采。但是，少奇主席，您知不知道您家鄉的鄉親們在遭的滔天大罪嗎？這兩年，我們的生活太困難了。公共食堂吃不飽，糧食絕大部分都交國家了，食堂的糧油，大部分都幹部占便宜吃了」，「問幹部怎麼不讓人吃飯，幹部回答說，收下的糧食還不夠交徵購任務的，你們不好好地幹活，多生產糧食交國家，餓死你們這些懶漢沒話說！可憐社員哪裡是偷懶吃飽飯不幹活，一個個餓得都走不動路了，田裡莊稼沒心思種，也無力氣種。收上來的糧不夠上交國家徵購任務的，那我們種田的人就該餓死嘛？！我們真怕長此以往，年復一年，那一定有一天社員都會死光的，還有誰來給國家種糧食呢？您當國家主席的人，是不是要想想這個道理呢？劉主席，我們天天在餓肚子，得了浮腫病還不能說，說了就要挨打餓飯，搞不好就說你是『反黨、反三面紅旗』，要送勞改。餓死人只能說自己病死的，社社隊隊，死人常見，一個生產隊餓死的怕不有幾十上百呢！現在我們心裡只想

5 湖南澧縣澧口公社社員：〈關於幹部問題上中共中央領導人書〉（1960年2月16日），收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頁165、166。

吃一頓飽飯，也沒枉來一回人世」。「劉主席啊，當了那麼大的官，你能不能照顧一下鄉親們？自古以來，好官護一方，好狗護一莊，要讓鄉親們百世千代都頌你的好才真好呢，不要讓後人說起我們花明樓出過一個國家主席，在他手上，餓死的寧鄉人有成千上萬！」⁶

這封信據說後來送到了劉少奇的手裡，引起他的重視。1961年劉少奇回鄉調查，縣委書記告訴他：「1959年全縣是86萬人，1960年只有77萬了。水腫餓死5萬多，外逃謀生的3萬多人」。劉少奇大為震驚，當即表示：「我們工作沒有做好，中央和省地縣有責任，我當主席的更有責任。要立大碑，銘刻心中，子子孫孫再不犯這個錯誤」。⁷後來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話實際上就是這次調查中一位70多歲的老人對他說的。⁸

上書之外，一些農村知識分子開始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於是就出現了農民代言人和農民思想家。

首先要介紹的，是被毛澤東稱為「兩個半單幹理論家」、⁹來自浙江農村的三個小知識分子。他們都應該載入史冊：楊木水(1932-2000)，嵊縣農業局蠶桑技術員；馮志來(1936-不詳)，瑞安縣湖嶺農技站技術員，「右派」；陳新宇(生平不詳)，新安縣專職辦社幹部。他們三位都寫有文章，有的文章還有一定的理論性，藉由向報社投稿以表達農民的呼聲。他們尖銳地追問：「錯在哪裡？」並明確地回答：「天災是次要的」，「實質是左傾錯誤！」¹⁰這把問題看得很準，可謂一針見血。接著他們又問：「怎麼辦？什麼是我們眼前的出路？」

6 花明樓群眾：〈關於寧鄉災情上劉少奇書〉(1960年10月16日)，收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頁249-250。

7 余習廣等：〈共和國主席的故鄉——湖南寧鄉縣大躍進紀實〉，收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頁327。

8 見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頁149。

9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對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的講話(1962年7月)：「你們浙江出了兩個半單幹理論家，必須徹底批判！」轉引自馮志來、陳新宇、楊木水：「兩個半」單幹理論家，載《中國合作經濟》2008年第9期《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鄉戀》專號。

10 引文處見馮志來：〈怎麼辦？〉(1962年)；見馮志來、陳新宇、楊木水：「兩個半」單幹理論家，載《中國合作經濟》2008年第9期《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鄉戀》專號。

回答也依然明確而一針見血：「包產到戶」。¹¹他們同時十分堅定：「一人做事一人當」，「打破腦袋扇子扇」，「絕不放棄自己的主張」。¹²

楊木水為了使自己的信能讓黨中央、毛澤東看到，希望有人傳信，因此就把文章寄給了他的老鄉、北大馬寅初校長，他並不知道此時的馬老也正處在被圍剿的困境中。但誰也沒有想到，近80歲的馬校長收到了他的小同鄉來信，竟不顧個人安危，親自跑回家鄉去見楊木水。這一老一小，一位是中國頂級的經濟學家，一位是底層的蠶桑技術員，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進行了攸關國家民族命運的一席長談：就在這一晚上，他們共同修改了楊木水起草的〈恢復農村經濟的頂好辦法是包產到戶〉宣言書，兩人分手時，馬寅初又丟下一句話：「不要輕易放棄，真理是批不倒的」¹³——這真是讓人難忘的一次歷史性會見。同學們可能還記得，我多次無奈地談到中國知識分子在關鍵時刻的缺席與無言，但是馬老的挺身而出，多少讓我們感到一點欣慰。中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大饑荒的關鍵時刻終於和中國農民站在一起，這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

和浙江臨近的江蘇睢寧縣有兩位公社農業中學的年輕教師鈕惟新(1939-)、蔡撫民(生平不詳)，蔡撫民是我所就讀的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學弟，他們於1961年12月寫了〈關於我國農業問題的意見〉的長文，並發出〈給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緊急信〉，表示自己作為「有文化知識的鄉村教師，有義務把廣大農民的意見綜合起來，反映給親愛的黨」，他們在信中滿懷焦慮地說：「凡是一個身居廣大人民群眾之中(特別是農民群眾之中)的人，都會為我們國家已暴露的嚴重危機和潛伏將發的更嚴重的危機而深切地感到不安」，因此他們大聲疾呼：「正視現實，行動起來，尋求途徑，挽救民族危亡」，而辦法就是「根據農民的要求，迅速搞包產到戶的試點，並及早推廣之」。他們認為，「『包產到戶』的生產關係，適應於當前落後生產力水平」，並「適應於當前農民的覺

11 引文處見馮志來：〈半社會主義論〉(1962年)；見〈馮志來、陳新宇、楊木水：「兩個半」單幹理論家〉，載《中國合作經濟》2008年第9期《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鄉戀》專號。

12 陳新宇：〈給《人民日報》的信〉(1962年)，〈馮志來、陳新宇、楊木水：「兩個半」單幹理論家〉，載《中國合作經濟》2008年第9期《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鄉戀》專號。

13 參看〈馮志來、陳新宇、楊木水：「兩個半」單幹理論家〉，載《中國合作經濟》2008年第9期《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鄉戀》專號。

悟水平」；他們同時也看到，「包產到戶」有可能「導致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增長」，但認為「是可以通過國家的政權、措施加以克服的」——他們的呼聲得到了時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1896-1872)的回應，但鄧子恢很快地就被毛澤東宣布為修正主義的代表，這兩位農村教師竟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獄，分別判了十年、五年徒刑。¹⁴

在西北地區則出現了一位名叫楊偉名(1922-1968)的農民思想家，他也是應該被歷史記住的人物。他是陝西的農民，前幾年大陸給他出了一本小冊子《一葉知秋》，收集了他有關農村問題的一系列文章。這人的經歷也很特別，他曾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建國後最初是一個鄉的副鄉長，但是他不願意當幹部，就自動離職回家種田，一直到1958年才重新入黨。他寫這些文章的時後職任一個大隊的會計，看得出來他讀過一些古書、文字是半文半白的。

如果說，前面所介紹的農民上書和農村知識分子的批判，基本上就是農村談實際的農村問題，楊偉名思考的卻是整體中國發展道路的問題，並在這個大視野下思考農村問題。因此，他所提出的問題是：「目前嚴重困難產生的淵源是什麼？」他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打了個比方：「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過五里」，¹⁵他說中國問題的淵源就出在這個「過」上。什麼意思呢？他對中國社會和社會發展道路作了這樣的分析：「我們的國家是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首先要做的是「把一個具有六億人的落後的農業國家，建設成新民主主義的強大的工業國家」，我們卻急於搞社會主義，因此過了。「有人曾經說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要兩步走(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那麼如果說，我們第一步沒有走好，第二步怎麼會走好呢？按說新民主主義建設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義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一個長期的轉化過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來，像我們過去所做的顯然是拔苗助長，違反

14 鈕惟新、蔡撫民：〈關於我國農業問題的意見〉(1961年12月)，〈給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緊急信〉(1961年12月)，韓三洲：〈黑荒·熱血——鈕、蔡上書紀實〉，文收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頁362、364、365、361、380。

15 楊偉名：〈當前形勢懷感〉(1962年5月10日)，《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8。

了客觀規律」。¹⁶因此他提出要「退」，退到哪裡去？退到「新民主主義建設」；他說，或者叫作「社會主義初期建設」階段¹⁷——有學者認為，他提出這個概念，和八十年代末中共十三大ⁱⁱ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相通之處，也就是說，他的想法整整提前了20年。¹⁸

在另一篇文章裡，楊偉名對「社會主義初期建設」時期還作了更具體的分析：

從理論上講，我們的國家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我們的建設整整飛躍了一個歷史時代——資本主義時代，但所謂「飛躍」卻不是繞過，而是一種方式的轉換。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建設期間，同時允許出現一個有條件的但又相仿於資本主義範疇的「自由競爭」時期。而所謂「有條件的」，是說，這個「自由競爭」裡面：第一，一切剝削方式不容存在；第二，生產資料私人不能占有；第三，經營方針應服從國家計劃；第四，競爭的目的旨在謀取全民幸福，最終達到全人類徹底解放。因之，這個「自由競爭」本質上是代替了資本主義時期的「自由競爭」，而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勞動競賽」。我們的國家要在原來「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儘快地建設成具有現代工業、農業、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經過這樣一個「自由競爭」時期。我們目前堅持「按勞取酬」的原則，也正是為了在廣大群眾中掀起一個「自由競爭」的高潮。¹⁹

這樣的論述，同樣是超前的。

在具體操作層面，楊偉名提出了四個方面的「退」，實際是代表農民提出了四大自由的要求。第一，給農民自願選擇土地制度的自由。他說：「願意單幹者，可以允許，願集體者可以另行自願結合」，²⁰關鍵是農民要有獨立自主的選擇權。第二，要求開放自由市場，按照價值規律實行自由貿易。²¹第

16 楊偉名：〈當前形勢懷感〉（1962年5月10日），《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9。

17 楊偉名：〈當前形勢懷感〉（1962年5月10日），《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16。

18 盧躍剛：〈不平常的追悼〉（代序），收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5。

19 楊偉名：〈有關處理目前「物質供應困難」問題的建議〉，《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40。

20 楊偉名：〈當前形勢懷感〉，《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7。

21 楊偉名：〈當前形勢懷感〉，《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10-11。

三，要求讓中小型工商業自由生產。他特意提出應該用孫中山先生「節制資本」的方法，而不能絕對限制資本。²²第四，要求「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他專門討論了「民主集中制」的問題，強調「群眾意志能否廣泛、正確而及時地集中上去，是能否正確制定與貫徹政策的唯一關鍵」。²³

在另一篇文章裡，楊偉名還提出「我們應立即把『計劃經濟』範圍收縮到應有的限度，同時相應地擴大『非計劃經濟』的範圍」，「全國六億五千萬人口的生活，其中約一億五千萬非農業人口的生活由國家統一計劃安排。五億農民的生活由農村自己安排」²⁴——這充分表達了中國農民要求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與命運的願望。

但這些要求卻被自以為代表農民的毛澤東堅決拒絕。他在1962年8月北戴河工作會議上點名批判了楊偉名，抓住他文章中「一葉知秋，異地皆然」這句話，說這是農村倒退復辟的預兆，並且嚴厲地說：「共產黨員在這些問題上不能無動於衷」。²⁵毛澤東此言一出，楊偉名自然受到了批判；但他卻得到當地農民暗地的支持與尊重，地方黨組織也在可能範圍內予以保護，因此他雖然作了檢討，卻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楊偉名就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卻選擇了沉默。後來西安一位叫劉景華（生平不詳）的紅衛兵大學生，在看了他的《一葉知秋》後就去找他，於是又有一次紅衛兵和老農民之間的對話，這和前面所說的馬寅初和蠶桑技術員的對話可以類比，都具有某種歷史的象徵意義。楊偉名告訴這位毛澤東的紅衛兵劉景華：毛主席也是人，也是農民出身的，但是他掌權之後要搞個人崇拜了！²⁶劉景華大受震動，說：「在我接觸的所有人中，包括大學裡馬列主義教研室裡的教授講師在內，你的馬列主義水平最高，{……}而

22 楊偉名：〈當前形勢懷感〉，《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9。

23 關於楊偉名對於「民主集中制」的討論，詳見楊偉名：〈當前形勢懷感〉，《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14-15。

24 楊偉名：〈談關於「一類物質」的開放問題〉，《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73-74。

25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8月）。轉引自盧躍剛：〈不平常的追悼〉，文收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1-2。

26 參看全德普：〈歷史的誤傷——一位農民黨員的非凡遭遇〉，文收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177。

且你敢講真話，直言不諱的勇氣、膽識，是這些人難以企及的」。²⁷劉景華於是在這位有獨立思想的農民這裡，找到自己真正的老師。血氣方剛的劉景華把自己對文革的懷疑公之於眾，立即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在抄劉景華家時又發現了楊偉名的信，兩人就成了「楊劉反革命集團」。最後楊偉名夫婦雙雙自盡，以示抗爭，這又是一個悲壯的犧牲。²⁸

但執政黨必須面對楊偉名代表幾億中國農民所提出的問題；特別是在饑餓的年代，對於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所發出的呼聲，是絕不能充耳不聞的。正是農民的不斷吶喊，引發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的矛盾和衝突。

二、底層和中層幹部的反應

首先作出反應的是接近農民的底層、中層幹部。這裡也講兩個引起毛澤東注意、並讓他震怒的故事。

一個是安徽太湖縣委宣傳部的普通幹部，叫錢讓能(1933-)。他寫信給毛澤東，旗幟鮮明地站在農民一邊：「『責任田』的辦法是農民的一個創舉」，「儘管有人責難它『糟了』『錯了』，然而廣大農民群眾卻認為是『好了』『對頭了』」——他幾乎重複提出了毛澤東在1927年面對湖南農民運動時提出的「好得很」還是「糟得很」的問題。而且他把問題提得十分尖銳：「據我們調查摸底，擁護責任田的起碼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於百分之九十以上。站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這一邊同呼吸，該不能算是尾巴主義吧！怕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不跟我們走，這恐怕也不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害怕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大眾的道理呢？」²⁹他大概沒有想到，這些話在毛澤東聽來，就幾乎是向他本人叫板，自然要「龍顏大怒」

27 全德普：〈歷史的誤傷——一位農民黨員的非凡遭遇〉，文收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173。

28 參看全德普：〈歷史的誤傷——一位農民黨員的非凡遭遇〉，文收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頁151-180。

29 錢讓能：〈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文收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頁403、414。

了。³⁰

還有一位胡開明(1913-1997)，也是毛澤東所不容的。他是黨內知識分子，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他曾經當過河北省的副省長，當時是張家口地委書記。作為一個省級幹部，他有較高的理論素養，將問題看得更準、更深刻。他認為根本的問題在於兩個「過」(這一點，倒和農民思想家楊偉名不謀而合)，一是「對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速度估計過快」，二是「生產關係的變革搞過了頭」。³¹因此他寫信給毛澤東，提出要從勞動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上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並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從一開始就不能不認真保障全體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在吃飯問題上保證集體成員的最低需要，正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具體表現，決不是什麼平均主義」。³²這樣就將批判提到一定的高度，也擊中了毛澤東的要害。實際上胡開明還是謹慎的，他並不同意包產到戶，因為他認為完全單幹，會「否認組織起來的優越性」，也難以避免兩極分化。但他認為應該尊重農民的意願，如果有農民堅持單幹，或居住過於分散，不便集體生產，也應該允許。³³但胡開明這一個比較溫和的主張，也遭到了毛澤東的拒絕和批判。而且毛澤東居然在他的名字上做文章，一句「河北開明，有這麼一個人，『開明』，但就是個『胡』開明」，³⁴就把他打入了萬丈深淵。

30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對錢讓能給他的信，作了批示：「印發各同志」(1962年8月2日)，作為供批判用的材料。見〈在保薦責任田辦法的來信上的批語〉(1962年8月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127。錢讓能也因此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到處遊鬥。見錢讓能：〈上書毛澤東：保薦「責任田」始末〉，文收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

31 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191。

32 胡開明：〈對於農村口糧分配辦法的意見〉(1962年8月18日)，收《位卑未敢忘憂國：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頁475。

33 胡開明：〈關於推行「三包」到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1962年8月8日)，收《位卑未敢忘憂國：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頁459-460。

34 胡開明的報告可參見毛澤東：〈對胡開明建議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報告的批語〉(1962年8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152-153，註釋(1)。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8月9日)，轉引自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頁464。

問題是，這些中層幹部為什麼要冒死上書？胡開明上書前，曾和他的夫人商量，夫人對他說：「毛主席說要五不怕(即指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我們革命、工作了幾十年，怕甚麼？」³⁵胡開明在一篇文章裡也這樣寫道：「共產黨員為了共產主義事業，從來都不怕流血和殺頭，難道還能夠為了一些個人利益得失而不向黨講真情實話嗎？」³⁶錢讓能則說得更加樸實：我在農村工作，「長期以來和農民一往情深」，「我總想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最大努力為農民說些公道話」，「熱愛腳下的田野國土，忠誠已經遭遇不幸的農民，是起碼的道德」³⁷——這都說明，中國共產黨內有一批忠實於自己的信念、和農民有著深刻精神聯繫的幹部和黨員，這本來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所在，現在卻因為他們違背了毛澤東的意志而遭到殘酷迫害，這無異於「自毀長城」，無論對這些忠誠幹部，還是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而言，都是一個悲劇。

但面對大饑荒，不管毛澤東如何震怒，農民和各級幹部的聲音卻是壓不住、也不能不聽的。其間的關鍵是黨內高層領導的反應。

三、高層領導的回應與選擇

我們還是先講兩個小故事。

1960年3月，有一位四川達縣的農民，他覺得日子太苦了、不堪忍受，於是一個人跑到天安門廣場，在大白天手提白色燈籠走來走去，顯然在暗示「暗無天日」，他用這個方式表達他的抗議，並被一位英國記者拍到照片，由路透社轉發了一個報導。這位農民當然很快就被抓起來了，在審訊中他供認自己由於高徵收導致家鄉農民大批死亡，其中包括他的母親和兩個孩子，老婆也因此失蹤，他幾次到區、省上訪，均遭拘押，不得已才到北京鋌而走

35 轉引自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193。

36 胡開明：〈要如實反應情況〉，參見賈文平：《真理與命運——胡開明傳略》，頁194-197，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193。

37 錢讓能：〈上書毛澤東：保薦「責任田」始末〉，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頁431、432。

險。北京公安局派人到達縣調查，證明情況屬實。彭真向劉少奇彙報此事，劉少奇沉默不語，最後說：「情況早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境地了！」或許是因為劉少奇有這樣的態度，北京市公安局僅給這位農民象徵性的判了點刑，並且徵詢他的意見是否要回家鄉；這位農民表示做了這些事無法回到家鄉，只能去找貴州的一個老鄉，而北京公安局居然就將他送到貴州老鄉那兒去。³⁸中國的專政部門這樣處理案件，過去不曾有，現在也不會有。

還有一位湖南女工劉桂陽(生平不詳)，她回到農村的家，發現雙親患了浮腫病，很多鄉親都死了，非常憤怒，就寫了12張標語：「毛主席、黨中央、各位首長，睜開你們雪亮的眼睛吧，看看廣大農民的痛苦生活」、「人民公社是阻礙社會主義前進的高山」、「打倒、鏟除人民公社」等，³⁹並給丈夫留下遺書：「我為挽救全國人民的生活獻出我的力量，也可能獻出我的生命。萬一如此，望你把兒子撫養成人」，然後孤身來到北京，在中南海的北門貼出標語，還叫守衛出來看。結果她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判了5年徒刑。但出乎意料之外，這件事情為劉少奇所知，並寫了一個批示：「反動標語是以反革命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還相信中央，這能說是以反革命為目的嗎？她對人民公社的認識有錯誤，採取的方法是錯誤的，但這不應該判刑」⁴⁰——這樣的事，同樣過去不會有，現在也不可能發生。

兩個故事都發生在大饑荒的年月。這說明，當時的最高層已經深切地感受到底層人民的不幸，聽到了農民的呼聲，他們對於這些呼聲的危險性有充分的估計，同時也懷有理解與同情。當年林昭說她有「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幹部，從底層、中層到高層幹部也都有著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大饑荒把這樣的矛盾激化，也一定程度公開化了。

38 沈河：〈發生在1960年的「白日點燈案」〉，上海《報刊文摘》2006年11月8日，轉引自林蘊暉：〈三年大饑荒中的人口非正常變動〉，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5期。

39 還有一種說法：這位女工劉桂陽所寫的標語中還有「打倒毛主席，彭德懷萬歲」的內容，見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上)，頁363。

40 何志強：〈命運，與劉少奇相連〉，收陳明洋編：《當年事：《南方周末》解密檔案》(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頁54-70。有意思的是，「故事」的下半截：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被打倒，劉桂陽再次入獄，加判5年，執行10年有期徒刑。文革後，隨著劉少奇平反，劉桂陽也被宣告無罪，並在1998年(即38年後)應邀來到北京，和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相見。

陳雲有一段話，大概最能夠表達這個時期黨中央最高領導層的想法。陳雲在一次會議上說：「同志們！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裏失掉。現在我們面臨著如何把革命成果鞏固和發展下去的問題，關鍵就在於要安排好六億多人民的生活，真正為人民謀福利」。很快就傳出，陳雲私下還有更加坦白的說明：「共產黨讓老百姓吃不上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必須採取非常措施，哪怕這個措施在改變了困境之後再棄之不用也可以」。⁴¹

陳雲這段話，傳遞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集體面對大饑荒時極為重要的思想與心理，大可琢磨與討論。

第一，「共產黨讓老百姓吃不上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這也是我們反覆討論過的：史前期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就是要讓老百姓吃飽飯，許多共產黨員，特別是農民出身的共產黨員，之所以參加革命就是因為吃不飽飯，而後來農民之所以跟著共產黨搞大躍進，也是因為共產黨給他們一個「吃飯不要錢」的許諾。領導革命和組織大躍進的高層幹部心知肚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合法性，都建築在使老百姓吃飽飯的基礎上，現在共產黨不能讓老百姓吃飽飯，不但說不過去，實際上要失去合法性，失去民心。在他們看來，失去農民的信任是尤其危險的，事關「工農聯盟」的國家基礎。黨的高層還有這樣的擔憂：黨的基本成員都出身於農民，讓農民吃不飽飯，就會脫離廣大農民黨員，動搖黨的基礎。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能不能讓老百姓吃飽飯，關係到政權是否鞏固、共產黨的江山坐不坐得住的問題。如果說，錢讓能、胡開明對農民呼聲的響應，更多是出於「樸實的階級感情」，而最高層的響應，則具有非常明確的政治利益的考量：千萬不要讓無數共產黨人用生命奪來的政權，因為「讓農民吃不飽飯」而喪失在自己手裡，這才是真正讓他們寢食不安的原因，統治合法性是他們真正關心與考慮的問題。

於是，就有了第三個層面的思慮與思路：只要讓農民有飯吃，一切暫時性的辦法都能考慮，其實這正是基層與中層幹部此時的想法。後來錢讓能在

41 陳雲在中央財經小組會上的講話(1962年3月7日)，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164。

回憶他當年的思想時也這麼說：「先把全國人民吃飯問題解決再說，關於『責任田』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爭論，可以留待以後去解決，因為吃飯是第一件大事，這是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的」。⁴²也就在這個背景下，鄧小平提出了他的著名的「貓論」。他的原話是這樣說的：「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⁴³——鄧小平的這個「貓論」，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成了他的主要罪狀，也因此傳遍全國；八十年代以來，「貓論」就成了他的治國方針。這個「貓論」，當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色彩，但至少表明，像鄧小平這樣比較務實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並不那麼執著於某種意識形態、某種理想，而是更注重於怎麼解決實際面臨的統治危機。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鄧小平的「貓論」，代表了1962年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這些中共最高層的共識。

這裡，必須對此時劉少奇的思想、心理與做法作一點討論。劉少奇和陳雲一樣深切感受到統治危機，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就強調「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⁴⁴在隨後的西樓會議ⁱⁱⁱ（1962年2月21日召開）上，他就作出了更嚴重的估計，認為中國到了最危急的「非常時期」，⁴⁵在一個文件的批示裡，他甚至說到了「亡國」的危險。⁴⁶也就是說，這對劉少奇而言，不僅是經濟危機，更是統治危機；可以說劉少奇的心情、心理是十分沉重與緊張的。因此，在他主政期間（七千人大會以後，毛澤東就南下，留劉少奇在北

42 錢讓能：〈上書毛澤東：保薦「責任田」始末〉，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頁432。

43 鄧小平：〈怎樣恢復農業生產〉（1962年7月7日），這是鄧小平在接見出席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代表時講話的一部分。文收《鄧小平文選》第1卷，頁323。

44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轉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30。

4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52。

46 劉少奇：〈對財政部一個報告的批語〉（196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49-550。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159。

京主持工作，彷彿毛澤東真的退居二線了)，其施政方針，就是「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⁴⁷按當時的說法，就是「毒蛇噬臂，壯士斷腕」。⁴⁸這一點得到了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的全力支持；簡單說來，就是四個字：「猛抓」與「猛退」。按周恩來的說法，「猛抓」就是「先抓吃穿用，實現農輕重」，⁴⁹其實就是「解決吃飯問題為中心」，千方百計改善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條件。「猛退」就是一切和老百姓吃穿用無關的，通通退。首先就是工業大後退，規定兩三年之內不搞基本建設，把多餘的城市人口下放到農村，當時精簡了940萬職工，減少城市人口1,048萬，這樣的大遷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見的，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組織力之強。其次，是過去的高積累率大幅度下降，1960年的積累率還是39.6%，但到了1962年就下降到10.4%。⁵⁰其三，是農業大倒退，宣布食堂解散，並在實際上允許包產到戶。其四，在思想文化上也後退，為緩和與知識分子的矛盾，便重提毛澤東的雙百方針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更在1962年宣布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⁵¹

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全面的後退，但要退到何處？大致看來，工業要退到大躍進之前，農業至少要退到合作化初期，甚至要回到合作化以前（陳雲就提出要用重新分田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生產），而思想文化更是退到了反右之前（此時大量的「右派」都摘了帽子）；從總體上看，幾乎退到了農民思想家楊偉名所說的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事實上，劉少奇的確回到了他最初的主張，只不過沒有發表公開宣言。這一切當然就超過毛澤東的底線，因為這不僅是在實際上否定他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也否定他的社會主義革命。儘

47 劉少奇在1962年2月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的講話，見《劉少奇傳》（下冊），頁898，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154。

48 在196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舉行的工作會議上，有人大聲疾呼：「要有『毒蛇噬臂，壯士斷腕』的決心，把一切人力、財力、物力集中用在刀口上，打殲滅戰，同時忍痛割掉一些東西」。見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169。

49 周恩來：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的插話（1962年3月7日），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462。

50 見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175、176。

51 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1962年3月27日，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作），見《周恩來年譜》（中卷），頁467。

管此時劉少奇再三宣稱這些方法都是權宜之計，但毛澤東卻自有他的分析。於是，我們的討論也就必然要進入最實質性的方面。

四、毛澤東的決策：重啟階級鬥爭的戰車

在討論毛澤東怎麼反應之前，我們還需要考察一下在1961、1962年之間，毛澤東的思想、心態與情緒。

毛澤東並不是不知道問題的嚴重，他在1961年的一次會議上說：「這幾年我們掠奪農民比國民黨還厲害」，⁵²還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搞不好就下台，由國民黨來」。⁵³因此他原則上並不反對「退」，並且親自做了兩個決定，一是宣布解散食堂，一是退到生產小隊，就是以村為單位組織生產、經營與分配，這是他對農民做的讓步。他在1961年12月和鄧小平的一次長談中他說到「去年前年〔錢註：即1960、1959年〕心情不那麼愉快」；⁵⁴1962年2、3月，毛澤東在修改他的七千人大會的講話時，突然加上司馬遷《史記》中〈報任少卿書〉中的一段話：「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⁵⁵自然也會想起太史公的命運。如一位研究者所分析：他正是要藉此表達「忍辱負重，待時而起」的心情，⁵⁶這大概能表達毛澤東在困難時期的真實心態。

但1961年底，毛澤東在和鄧小平的談話時，已經認為「經過兩年的調整，『退』得已經差不多了，到了『谷底』了。1962年應該是向上爬行的形勢」，⁵⁷在同時和地方官員的談話中就說得更清楚：「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

52 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轉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23。

53 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111。

54 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談話。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55。

55 據達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210。修改稿見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頁293。

56 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136。

57 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談話。轉引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56。

灰溜溜。潛力是很大的，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⁵⁸，「形勢已經在向好的方面轉。[……]再有一年就過去了」，⁵⁹並同時透露出的是他的底線：有錯誤要改正，有亂子要處理，但改正、處理後還要繼續前進——他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是中國終於找到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因此絕對不能放棄。

這表明毛澤東對形勢的分析完全不同於劉少奇，他根本不認為中國到了非常時期，也不認為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遭到威脅；他始終相信自己代表農民、人民的利益，他始終相信農民是支持他的。因此，對他來說，1962年不是要「退」，而是要考慮如何「再前進」。他似乎不太反對「工業退」，但對「農業退」卻絕對不能忍受，認為只要退到「生產小隊」就行了，再退到「單幹」就是過線。而他更是不能容忍對知識分子讓步，根本反對給知識分子脫下資產階級帽子。

毛澤東不是不知道大饑荒所引發的農民、黨員、各級幹部的不滿情緒。因此他在七千人大會上採取了以退為進的辦法，公開承認自己對「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⁶⁰——如果對照毛澤東在1956年對於劉、周、陳「反冒進」時的壓抑，以及1958年表示自己要主掌經濟時的躊躇滿志，此時毛澤東公開承認自己「還不懂」經濟，其內心的沉重與無奈是不難想像的。但深懂進退之術的政治家毛澤東，還要進一步主動承擔責任：「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⁶¹他的表態讓所有幹部非常感動，一些

58 毛澤東聽取江渭清等彙報時插話的傳達記錄(1961年12月20日)，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186。

59 毛澤東聽取劉子厚等彙報時的插話記錄(1961年12月19日)。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187。

60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1962年1月30日)，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30-1031。

61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

地委、縣委書記激動地說：「主席都檢討了，我們還有什麼說的？」⁶²毛澤東還號召大家「出氣」，用他特有的幽默語言，宣布「白天出氣，晚上看戲」。⁶³毛澤東非常能夠掌握幹部和群眾的情緒，他知道黨內幹部的怨氣癥結所在：這些年，特別是廬山會議以後，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造成黨內關係的極度緊張。因此，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又高舉黨內民主旗幟，大談「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現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⁶⁴並且猛批第一書記專政：「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⁶⁵凡是個人說了算的第一書記「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⁶⁶「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⁶⁷他故意忘記了，這個第一書記「獨攬大權」的體制，正是他在反右之後親自建立的，現在他卻把體制的問題，輕描淡寫變成了第一書記的個人作風問題。他這些政治家的謀略還是有效果：他不但成功化解了黨內的怨氣，還使自己成為黨內民主的倡導者。他這些批判第一書記專政的言論，後來在文革時期，就成為紅衛兵和造反派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有力武器，比如「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摸不得嗎？偏要摸！」⁶⁸這些話，在文革中都是風行一時的「毛主席語錄」——不過這已是後

頁296。

- 62 蕭東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頁822。轉引自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68。
- 63 毛澤東的講話，據《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紀錄》(1962年1月29日)。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198。
- 64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頁296。
- 65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頁294。
- 66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頁295。
- 67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頁295-296。
- 68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頁296。

話。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中，只有一處談到階級鬥爭，而且是說「對於階級鬥爭，我們有一套經驗」，⁶⁹並沒有涉及現實的階級鬥爭問題。

毛澤東顯然意識到，在困難時期無法再談階級鬥爭。我們現在看到的文本裡，卻有一段大談「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⁷⁰云云，這是1966年公開發表時加進去的，而且是原封不動地抄錄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公報裡的話，⁷¹原因是那時的毛澤東已經斷定經濟開始好轉，可以大抓階級鬥爭了。

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基本上是滿意的，只是對劉少奇的一些說法，如「大饑荒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持保留態度。⁷²因此，在七千人大會以後，毛澤東就南下，放手讓劉少奇去收拾大躍進留下的「爛攤子」，其目的是尋求地方官員的支持，也藉此觀察以劉少奇為首的同僚們。到1962年，經濟確實在逐漸復甦，而地方官員也只向毛澤東報喜，畢竟他們的權力本來就來自於毛澤東，自然要迎合他的希望報喜的心理，更重要的是，大躍進的成績涉及他們自己的利益，當然要竭力誇大。毛澤東卻似乎心裡更有了底，在他1962年7月6日回到北京之後，便準備按自己的想法，繼續前進；然而此時黨中央的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已經達成共識、要搞包產到戶，只等毛

69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頁301。

70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頁297。

71 參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71、170。參與1966年文本修改的龔育之在〈《二月提綱》和東湖之行〉中也有這樣的回憶，文收蕭克、李銳、龔育之：《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頁301-302。

72 在研究七千人大會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關係的有關文章中，許多人都提到毛澤東1967年2月在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貝基爾·巴盧庫，Begir Balluku，1917-1975，阿爾巴尼亞）的談話中，談到他在七千人大會講話裡，就提出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的問題。據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的原始記錄稿，以及1962年2月的整理稿上，都沒有這樣的內容，毛澤東顯然把他在1964年、1965年的判斷，前移到1962年去了。參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72-173。

澤東回來首肯，以便在全國大規模推行。這樣，毛澤東和他的同僚之間的衝突，就不可避免了。

7月6日下午，陳雲向毛澤東報告，提出以重新分田的辦法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同日，毛的祕書田家英在取得劉少奇同意後，向毛澤東彙報農村調查結果，希望包產到戶。毛澤東聽完之後一言不發，只問：「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一語抓住了問題的要害；⁷³第二天就傳出了毛澤東的意見：「分田單幹」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是修正主義；⁷⁴7月8日，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開會，明確表示反對包產到戶。⁷⁵

據劉少奇兒子劉源(1951-)的回憶，大概在此前後，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有一場十分重要的對話。當時，毛澤東正在游泳池游泳，劉少奇趕去向他彙報。一個在泳池裡，一個坐在泳池外，毛澤東一見他就說：「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劉少奇按捺不住，說了一句話：「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這大概是劉少奇鬱積已久的話，包括他看到了鄉親的信以後的反應，而且他又是國家主席、覺得自己有歷史責任。毛澤東不予理會，只是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⁷⁶這就涉及到更敏感的「接班人」問題，以後我們會再詳加討論。但在此時，毛澤東還是留有餘地，只是指責劉少奇「不頂住」，並沒有說劉少奇是所有主張包產到戶的人的後台。

這裡有個問題：從農民到中層幹部到上層，幾乎全黨全民都主張要包產到戶，為什麼獨獨毛澤東拒絕包產到戶？這有什麼原因？不能用道德主義的觀點簡單地把問題歸結為毛澤東的性格、品德，而應該承認，毛澤東的主張是自有其邏輯的，我們在討論這段歷史時，也應該首先弄清楚毛澤東的邏輯，然後再根據事實(包括其後果)，作出我們的判斷和批判。8月9號，在

73 逢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祕書田家英〉，文收董邊等編：《毛澤東和他的祕書田家英》(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92。

74 據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86。

75 據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232。

76 高曉岩：〈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劉源、何家棟對一段歷史公案的回憶、考證〉，文收陳明洋編：《當年事：《南方周末》解密檔案》，頁56。

一次開會的時候，毛澤東終於亮出他的底牌，說明他為什麼反對包產到戶。他認為，實行包產到戶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出嚴重的階級分化：「一方面是貪污多占、放高利貸、買地、討小老婆，其中包括共產黨員、共產黨的支部書記；一方面是破產，其中有四屬(軍、工、烈、幹屬)戶、五保戶」，⁷⁷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我們的依靠」⁷⁸——毛澤東顯然是擔心兩極分化，以及其可能帶來更為長遠的統治基礎的危機。在另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又指出，如果基本上單幹或者全部單幹，那就是「把五億多農民都變成小資產階級，讓小資產階級當權，讓小資產階級專政」，⁷⁹在毛澤東看來，這就是對農民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倒退，會根本危及無產階級專政，這也是他所不允許的。

這樣，這場發生在1962年的爭論，實際上就是1951年爭論的延續。這裡，我想請同學們回憶一下我們曾經講過的建國初期那段歷史：1951年較早進行了土地改革的東北和山西地區，已經出現兩極分化，對此黨內有兩種態度。劉少奇認為發展生產力最為重要，即使發生兩極分化，也是應該付出的代價；而高崗和毛澤東則認為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絕不允許兩極分化。1962年這樣的分歧幾乎重演：劉少奇等認為，解決農民迫在眉睫的吃飯的問題，只能單幹，即使出現了兩極分化，也要等到生產發展之後再回過頭解決；但毛澤東卻認為，這對於共產黨人而言是原則問題，絕不能讓步，共產黨人的天職就是要領導農民走集體化的社會主義道路，因此絕不允許兩極分化。應該說，許多共產黨人都心懷社會平等的理想，對兩極分化有著特殊的敏感和警惕，因此，當時雖然絕大多數的幹部、農民都要求單幹，但在黨內還是有一些人對包產到戶持保留態度，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大家所熟

77 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核心小組會上的講話(1962年8月9日)，轉引自逢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文收董邊等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頁93。「四屬戶」指農民中的軍人、工人、烈士、幹部家屬，他們的勞動力相對比較弱；「五保戶」是指農村中的老弱病殘，在衣、食、住、行、醫療等方面不能自理，需要公社特別保護、照顧。

78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242。

79 毛澤東同華東和中南地區負責人談話記錄(1962年8月5日)。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237-1238。

悉的胡耀邦(1915-1989)。

胡耀邦時為共青團第一書記，在1961年秋到安徽等地考察之後，得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結論。他說：包產到戶確實有調動農民積極性的作用，但是也會「出現了一些難以解決的矛盾和糾紛」，「發展下去，最終會導致降低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水平」；他的結論是：包產到戶「這種做法如大家還要幹，仍可試行，但要允許不同意的地方不這樣做，更不要把它說得絕對，避免被動」。⁸⁰胡耀邦為此寫了一個〈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察看〉的報告上呈毛澤東，毛看了大為高興，在批示中說：「寫得很好」，「值得一看」。⁸¹如前所說，即使是被毛澤東批判的胡開明也不贊成包產到戶，理由是擔心發生兩極分化，其實劉少奇也視包產到戶為權宜之計，說明他心裡也認為共產黨應領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只是現在為了解決現實饑荒問題，必須採用非常手段。

對於毛澤東而言，反對包產到戶或許還有更重要的理由：在他看來，如果實行全國範圍的包產到戶，就意味著人民公社的全面瓦解。如我們在前一講再三論述的，人民公社對於毛澤東所要尋找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對他的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是決定性的關鍵環節，因此在這一個事關根本的問題上，毛澤東是不會也不能讓步的。

毛澤東也知道自己的主張並不會為農民所接受，但他有自己的說法。他對田家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⁸²他這一態度倒是符合列寧主義原則，列寧早就有過這樣的闡釋：工人自發的要求只會產生福利主義，工人(或許還有農民)，他們的直接要求只是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不會提出社會主義的要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是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提出來的，他們代表了工人、農民的長遠、根本的利益。因此，共產黨人反對崇拜

80 以上引文請見胡耀邦：〈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查看〉(1961年10月2日)，見毛澤東：〈對胡耀邦農村考察報告的批語〉(1961年10月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575。

81 毛澤東：〈對胡耀邦農村考察報告的批語〉(1961年10月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574。

82 毛澤東對田家英的談話。見逢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文叢董邊等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頁91。

工人、農民運動的自發性，稱為「尾巴主義」，而強調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與引導。這也正是中國1962年爭論中毛澤東的立場：他認為自己代表了農民長遠的根本利益，並要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而劉少奇則是屈從於農民的眼前利益，是犯了尾巴主義的錯誤。於是，毛、劉之爭，就變成了照顧農民眼前利益、還是考慮長遠利益的爭論。

我們今天不一定認同這種說法，很難評斷毛澤東就一定代表了農民的長遠利益，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場爭論並不具有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性質，實際上僅是執政黨面對農民吃不飽的問題，所產生的兩種不同意見、思路，因此是完全可以妥協的。那位農民思想家楊偉名提出的方案，就是一個解決辦法：願意單幹允許單幹，想要集體的可另行自願結合，集體與單幹兩種形式同時並存，關鍵是把選擇權利交給農民；也可以採取「允許單幹，鼓勵集體」的方針，以顯示黨和國家的引導方向。事實上，當時在劉少奇、鄧小平等支持下，由田家英起草的〈恢復農村經濟的十大政策〉，其指導思想也是「當前在全國農村應當實行多種多樣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體、半集體、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以便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田家英還具體設想，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可能達到40%，集體和半集體占60%。⁸³但在毛澤東看來，這些都是從全面集體化的倒退，是他所不能接受與容忍的。

但是，在1962年的中國，一旦發生不同意見，就絕不允許妥協，而且必然變成你死我活的鬥爭，從而引發出一系列連當事人都很難預計的嚴重後果，並成為共和國一個新災難的起端。

這是為什麼？原因就在中國當時的社會體制上，其根源就是我們一再強調的「五七體制」。

「五七體制」有兩個大特點，在這個關鍵時刻就發生了作用。首先是黨的第一書記獨攬大權，特別是經過1959年批判彭德懷，共產黨在黨內已經建立了一種君臣關係。用君臣關係的思路、第一書記獨攬大權的思路來看這場爭論，就不再是不同意見相爭，而是一個「必須服從」的問題——而且是絕對無條件的服從，何況早在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作出過決議，授予毛澤東以

83 逢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文收董邊等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頁92。

「最後決定權」。⁸⁴所以，毛澤東一旦表態說不行，並且再一次像廬山會議那樣、以「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相威脅，⁸⁵劉少奇他們只能不戰而退。

再者，毛澤東建立的第一書記專政體制是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各省、各區、各縣，甚至到各鄉，這已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因此，毛澤東在中央一聲號令，就立即得到底下幹部的響應，這不僅是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性，更是其利益所在。如前一講所分析，人民公社的最大特點，就是集國家政權組織與經濟組織、軍事組織、社會組織、教育組織為一體，這就意味著權力的高度集中，同時也就形成了一個利益鏈條所結成、上下勾連的既得利益群體：否定人民公社、大躍進，就是對他們自身的否定，權力的限制，和利益的損害。因此，是否堅持人民公社、大躍進，是否要搞包產到戶，實際上是個利益之爭。這就是1962年7、8月份八屆十中全會上情勢風雲突變的原因所在。

首先，劉少奇迅速改變態度；毛澤東在7月10日表態，劉少奇在7月18日就做出反應，在一個報告會上強調要鞏固集體經濟，⁸⁶並且在八屆十中全會作總結報告時聲色俱厲地批判鄧子恢。鄧子恢是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在農業問題上一貫與毛澤東唱對台戲，因此毛澤東便拿鄧子恢作為靶子、批評鄧子恢，這也是給劉少奇留了餘地，並未直接點名劉少奇。於是劉少奇也就乘勢批鄧而自救，說他「在困難面前被嚇倒，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向後倒退、單幹」等等。⁸⁷整個八屆十中全會也完全一邊倒，群情憤激地批判包產到戶，出現與廬山會議一樣的情況。

恰恰就在此時，彭德懷寫了萬言書為自己辯護，這時他已被貶抑到權力圈之外，並不清楚中央鬥爭的複雜情況，這一上書，就正好提供了新的靶子。會議立刻轉向批判彭德懷，而且重提「高饒事件」，把彭德懷定為高崗事件的頭子、是「彭高饒反黨集團」，還因此又牽連出另一個「大案」：有人揭發

84 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431。

85 毛澤東同華東和中南地區負責人談話記錄(1962年8月5日)。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239。

86 劉少奇對中直機關和國家機關下放幹部的講話(1962年7月18日)，《劉少奇選集》(下卷)，頁461。

87 劉少奇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6日)，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284。

1962年出版的小說《劉志丹》^{iv}是為高崗翻案，理由是劉志丹(1903-1936)和高崗同為陝北根據地的領導人(劉志丹後來在戰爭中犧牲)，這自然是捕風捉影，但正符合批判彭德懷的需要，毛澤東因此而大談「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⁸⁸為文藝上的大批判提供了新的「理由」。會議上，還由此牽連出陝北根據地的另一位領導人習仲勛(1913-2002，為現今國家副主席習近平(1953-)的父親)，說他是小說《劉志丹》的幕後指揮者，搞了一個「彭高習反黨集團」。

在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重返「高饒事件」並加以擴大化，看來有些奇怪，卻充分反映了中共黨內鬥爭的複雜性。我們前面已經分析，在某種程度上1962年的論爭是1951年論爭的繼續。弔詭的是，1951年高崗是與毛澤東一起維護集體化、反對劉少奇的；但在1962年，高崗卻作為「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而被再批判，劉少奇也再次藉批判高崗、彭德懷而金蟬脫殼，一如1954年那場鬥爭——劉少奇始終抓住高崗、彭德懷不放，說明他是熟諳中共黨內鬥爭「借刀殺人以自衛」那套的。當然，劉少奇的迅速轉向不完全是出於他的投機，因為根本上他與毛澤東具有共同利益，在維護黨的團結、利益這些根本點上，他們是完全一致的。劉少奇確有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但組織性始終占上風；所謂「組織性」的核心，就是要維護黨的統治權力，這就需要黨的團結，特別是最高領導層的團結，劉少奇很懂得這個大局。

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補充，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批判包產到戶時，除了各地方第一書記紛紛響應之外，還得到了軍隊的支持。我們一再提醒，考慮中國的問題必須注意農民，這裡則要強調必須注意軍隊的反應，因為軍隊始終處於中國的核心地位，軍隊的反應對中國政治的作用與影響絕不能低估。早在1962年6月上旬，就有一些軍隊幹部向毛澤東反映，說他們認為國內形勢並沒有那麼困難，他們對劉少奇主持的黨中央總是強調形勢困難有意見。毛澤東當即表示：「你們是中央委員可以提意見嘛」。⁸⁹在八屆十中全會

88 據薄一波回憶，1962年9月24日在毛澤東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張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當場念了這張條子，並且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096。

89 毛澤東同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同志的談話紀錄(1964年5月27日)，轉引自張素華：《變局：

上，就有一位軍隊幹部作了這樣的發言：「農業恢復的時間越說越長，工業指標也越講越少，我們一輩子沒有希望了，還有甚麼搞頭」。⁹⁰總參謀長羅瑞卿(1906-1978)在一次小組討論會上也明確表示反對錢讓能為包產到戶辯護的文章，並且認為「軍隊一些高級幹部，對於把形勢講得很壞有意見」，對此，毛澤東回應說：「軍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幹部講的是一片黑暗」。⁹¹軍隊不能接受劉少奇「非常時期」的估計，這是可以理解的：軍隊幹部是和地方、社會隔離的，他們對饑餓沒有切膚之痛，所以更願意保留那些烏托邦理想：大躍進、高速度，前途一片光明。而且在他們看來，擁護毛澤東就是擁護政權的穩定性，而軍隊歷來是把政權的穩定看得更加重要的。也就是說，在困難時期，軍隊支持毛澤東是一個自然的選擇，但對政局的發展又具有決定性。

毛澤東實際上非常重視軍隊問題，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歷史。在1957年反右運動後，毛澤東立刻在軍隊開展一個反對軍事教條主義的鬥爭，就因為軍隊中有一批有文化、軍校畢業的幹部，以劉伯承(1892-1986)為首，主張軍隊要正規化，在毛澤東看來這就是教條主義。在毛澤東打擊劉伯承這些人時，所利用的是彭德懷，因為彭德懷是農民革命家，自己承認沒有文化、對於軍隊的正規化不感興趣。⁹²

但在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又把彭德懷給打了下去，目的就是要將軍隊的權力緊緊握在自己手裡。在這一次黨內的爭論中，毛澤東依然十分重視軍隊的反應。他在一份關於軍隊對鄧子恢的主張的反應報告上這樣寫道：「看來，單幹論在我們的軍事幹部中還有一點市場，但是不占多數，占絕對多數的同志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⁹³得到軍隊的支持，這是毛澤東的「底氣」所在。

這裡就必須提到林彪的作用。林彪繼任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他在七千

七千人大會始末》，頁273。

90 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274。

91 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246。

92 參看蕭克：〈建國後軍內第一次大批判〉，文收蕭克、李銳、龔育之：《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頁179-191。

93 毛澤東：〈對鄧子恢關於當前農業生產和人民公社問題報告的反映的批語〉(1962年8月2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159。

人大會上作了一個出人意外的發言。前面說到七千人大會是出氣會，唯獨林彪的發言是鼓氣，他強調「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依靠和相信黨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反之，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事情就要出毛病」，並且表示：「廬山會議以後，軍委一致的精神就是要以毛主席思想為指導方針，處處按毛主席的意圖、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來辦事，向毛主席請示，向毛主席報告，以毛主席的思想來統一我們的思想」。⁹⁴

這些話自然是毛澤東此刻最想聽、也最需要的，因此立即作出批示：「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並且要求迅速向全黨傳達。⁹⁵這些年學術界在研究這段歷史時，大都譴責林彪投機，但是最近出版的《吳法憲回憶錄》透露，當時是中央的將領、元帥提出要求林彪這樣說的，「包括軍委的一些領導，也來慫恿林彪出來講話」、「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林彪講話以後，「軍隊的幹部都很高興，紛紛贊揚林彪的講話講得好」。⁹⁶這就說明林彪的發言並非只是他個人的意思，而代表了軍隊的態度，這大概是更符合實際的，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八屆十中全會後，毛澤東得出一個結論：還是軍隊最可靠。這並非偶然，而且分量很重，是它決定了後來毛澤東啟用林彪等人發動文化大革命，可見軍隊的態度始終決定中國的命運。

「五七體制」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強調階級鬥爭，而且毛澤東提出要「設

94 林彪：〈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修改稿〉（1962年1月29日），見毛澤東：〈對林彪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1962年3月20日）註釋（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64、65。

95 毛澤東：〈對林彪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1962年3月20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62。

96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頁546、550。

置對立面、製造階級鬥爭」。剛才說過，包產到戶所造成黨內的意見分歧，本來並不具有階級鬥爭的性質，這只是兩種對於農民問題的不同回應方式。但是，毛澤東此時已經發展到極端的對立鬥爭二分法的思維模式，一切差別都變成對抗性的矛盾、都被看成是階級鬥爭的問題，都被當作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嚴重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後來，毛澤東更把它視為修正主義的表現。於是，就有了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的號召⁹⁷——有意思的是，也就在1962年8月，毛澤東曾主持制定一個〈中央關於正確對待單幹問題的規定〉的文件，明確規定：「對於黨內的思想問題，必須採取民主討論分清是非的方法，以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的目的」，毛澤東在修改時，還特意加上一句：「必需容許少數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有充分發展（表）意見和保留意見的權利」。⁹⁸可見，毛澤東面對黨內在單幹問題上的分歧時，內心也有矛盾，他不是沒有考慮過用民主討論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但1962年黨內鬥爭的情勢、體制，以及毛澤東的觀念、思維、個性，都決定了他最後採取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方式。

毛澤東為什麼要把形勢看得如此嚴重？其實他是自有其邏輯的。我們必須把研究的視野放開，看看1962年中國的國際環境。

1962年是個多事之秋。年初在廣州和香港之間發生大規模的偷渡^v，這是由大饑荒所引起的，卻震撼了全世界。因為在此之前，中國發生的事情，包括大饑餓的消息，都對外是封鎖的，世界都不知道；在39,000人偷渡出去之後，中國的內幕就公諸於世了。⁹⁹這就鼓舞了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陸的蔣介

97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轉引自達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251。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紅旗》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紀念《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十周年〉引用毛澤東的話時，加上了「天天講」，從此，就變成了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了。《紅旗》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紀念《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十周年〉(1967年6月2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紅旗》(1967年第10期)，頁34。

98 毛澤東：〈對中央關於正確對待單幹問題的規定草稿的修改〉(1962年8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125。

99 楊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廣東群眾偷渡問題研究〉，全國黨史系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五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動：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

石，他認為這是個反攻大陸的絕好時機。毛澤東也有所警惕，他在這一年的5月份對解放軍參謀總長說：「要準備蔣介石集團四十萬人秋後登陸」，¹⁰⁰並且在6月用《人民日報》社論的方式，提醒「全國軍民要提高警惕準備粉碎蔣匪幫軍事冒險」。¹⁰¹果然在10月1日到12月6日，蔣介石先後派了九股武裝力量從高雄出發，到東南沿海地區騷擾，提出要建立「游擊走廊」，但是人少規模也不大，遠低於毛澤東的估計，卻製造了緊張局勢。

緊接著10月20號，印度從中印邊界向中國發動大規模的進攻^{vi}。在這之前，蘇聯與印度簽署協議向印度提供米格戰鬥機，在中印邊界的戰鬥中，印度就利用了蘇聯米格戰鬥機，因此中共認定中印戰爭的背後有蘇聯支持。也是在1962年4月，新疆有六萬多人集體逃亡到蘇聯^{vii}，在中共看來，這也是蘇聯所策劃的。到12月12日，赫魯曉夫在公開演說裡，暗示中國教條主義者是最危險的；年底歐洲五國共產黨開黨代表大會，又一致通過決議譴責中國。¹⁰²

於是，中國所面對的，是一個十分複雜、緊張的國際環境：東南方有蔣介石反攻大陸，背後有美國；西南邊境是印度的進攻，背後有蘇聯；北方有蘇聯的威脅；歐洲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數都在譴責中國。中國於是感到了四面受圍的威脅，稱為「三尼一鐵反華公司」，即美國的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 1917-1963, 美國)，印度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 印度)，蘇聯的尼基塔·赫魯曉夫，還有一個鐵托。

毛澤東由此產生了強烈的被包圍感：在國外，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聯合起來反對他所領導的中國；在國內，不僅知識分子和農民心懷不滿，而且黨內各級幹部，從基層、中層直到高層，都有人在挑戰他的權威。

(1962-1965))，頁1。

100 毛澤東和總參謀長羅瑞卿的談話(1962年5月29日、31日)。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334。

101 社論之題名就是〈全國軍民要提高警惕準備粉碎蔣匪幫軍事冒險〉，並於1962年6月24日發表於《人民日報》，見毛澤東：〈對新華社關於蔣軍準備竄犯我沿海地區電訊稿的修改與批語〉(1962年6月11日、12日、1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102，註釋(1)。

102 參看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1-3、332-342。

四面被圍的危機感，引發了毛澤東「衝出重圍」的衝動。而且按照毛澤東的傳統鬥爭思路、中國共產黨黨內鬥爭的習慣性思維，外力的威脅越大，就越要在國內，特別是在黨內尋找「代理人」，把外鬥轉化為內鬥。因此，毛澤東決定五面作戰，不僅要對國際帝國主義(美國)、修正主義(蘇聯)、反動派(印度)作戰，還要對國內、黨內反對派作戰，而且把重點放在後者——我們今天來看，毛澤東的被包圍感，一方面有一定根據，但一方面也被他的想像極度誇大了：他總是要不斷犯下誇大「敵情」的錯誤，他「日日、月月、年年」講階級鬥爭，變成草木皆兵了。

但也因此激發了毛澤東的昂揚鬥志，在某種程度上說，這種緊張局面正是他所期待的、是他「設置對立面」、「不斷革命」所需要的。1962年5月，他在布置解放軍參謀長要準備蔣介石登陸後，又說了一句話：「有點敵人搗亂比較好」。他還引用孟子的話，大談「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他是相信「多難興邦」的；¹⁰³到1964年，在和外國共產黨領導談到國內防修問題時說：「我前幾年不那麼高興，{……}，一鬥就高興了」。¹⁰⁴正是在1962年底與1963年初，毛澤東詩興大發，接連寫了兩首詩：「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高天滾滾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氣吹。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¹⁰⁵這首〈冬雲〉，是1962年12月26日他69歲生日所寫；還有一首〈滿江紅〉：「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¹⁰⁶這表明，至少在1963

103 1962年5月30日和羅瑞卿的談話。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268。

104 毛澤東和紐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的講話(1964年2月9日)，原對話：「1964年2月9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再次會見威爾科克斯，談國際反修和國內防修問題。毛澤東說：『中國社會是一分為二的，誰也不能說中國是不能分的。』威爾科克斯問：『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在取得了政權以後，還需要有反對派？』毛說：『不是需要，而是事實上必然出現各種反動派。』威說：『我現在的確越來越年輕。』表示了對毛澤東的論斷的讚賞。毛接著說：『我也是這樣。現在很高興。前幾年不那麼高興，這有一個過程，一鬥就高興了。』」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314。

105 毛澤東：〈《冬雲》詩一首和給林克的信〉(1962年12月2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227。

106 毛澤東：〈書贈周恩來《滿江紅》詞一首〉(1963年1月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

年年初，他的方針已定，要發動國際、國內的全面階級鬥爭，甚至已經迫不及待要「掃除一切害人蟲」了——只要一搞階級鬥爭，毛澤東就感到得心應手；用我們前面引用過、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的說法，他對經濟問題知之不多，只有在不斷發動階級鬥爭中才獲得用武之地，並獲得他所渴望的絕對領導權力。

因此有研究者認為，毛澤東從1958年主動衝到第一線指揮經濟大躍進遭到失敗，到1962年轉過來大抓階級鬥爭，還是他當年「打游擊」的戰法：「在經濟陣地上被打趴下了，便匍匐潛行到政治陣地上再爬起來衝殺回去；你打你的優勢，我打我的優勢；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此處玩不轉，另處放把火」。¹⁰⁷這也不失為一種觀察，但這同時的確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信號：毛澤東在1958年大搞經濟浪漫主義、經濟烏托邦主義失敗以後，現在要重振旗鼓，把希望寄托於政治浪漫主義、政治烏托邦主義；實際上，這意味著毛澤東建國目標和重心的變化。1958年發動大躍進，主要是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民族主義目標，毛澤東一直沒有放棄這個目標，因此，他不僅在1958年大談「技術革命」，而且在1963年還提出「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¹⁰⁸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澤東也還在強調「抓革命，促生產」，¹⁰⁹到了文革後期也依然不忘提醒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¹¹⁰因此，若簡單地以為毛澤東只搞階級鬥爭而不關心國家建設，也是一種遮蔽。但是，從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又確實把重心放到如何保證革命勝利以後建立起來的國家政權和執政黨繼續保持革命性，即防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變質、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樣一個關乎社會主義信念的目標上，對毛澤東而言，這或許是更為根本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孕育其中了。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始終對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充滿信

冊，頁243。

107 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頁113。

108 毛澤東：〈轉發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1963年5月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293。

109 毛澤東：〈對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的批語〉（1966年10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頁141。

110 毛澤東：〈把國民經濟搞上去〉（1974年11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頁410。

心；1958年他甚至估計趕英超美只需2、3年的時間，但在1962年談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時，他的估計就變成了「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了，¹¹¹而且這個時間估計越來越長，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澤東就估計一次文化大革命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因此要「過七八年又來一次」。¹¹²看來，毛澤東是把他的黨和國家「永遠革命化」目標，看作是一個永久的過程，並不指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其實現——應該說，毛澤東的「富國強兵」和「永遠革命化」兩大目標，都具有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而「永遠革命化」更是一個烏托邦想像。但是，他要用專政的手段來實現這兩大目標，就出了問題。

還需要指出另一點，1962年毛澤東下定決心、要通過不斷發動階級鬥爭來防止黨和國家變質時，他同時也是清醒的：他知道，雖然下了決心，卻還存在很多制約因素，其中主要是中國經濟還沒有全面恢復，他還需要等待時機。這就是毛澤東——既豪情萬丈地渴望鬥爭，又善於審時度勢、絕不輕舉妄動。¹¹³劉少奇、周恩來他們也看到了這一點，一方面，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跟著毛澤東走，痛批包產到戶，另一方面，又同時在向毛澤東提出建議：階級鬥爭要搞，但不要影響生產。毛澤東也就勢同意繼續進行調整、恢復經濟。於是，在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他在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的同時，還提到一個「起碼的常識」：「我們絕不可以因為階級鬥爭妨礙我們的工

111 毛澤東：〈對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稿的批語和修改〉（1962年9月2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196。

112 原文：「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頁71。

113 關於毛澤東的矛盾的多側面，研究者有這樣的概括：「革命家毛澤東既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又扮演著多種的角色，他的心理和處世所表現出來的矛盾，也遠遠超過常人：他既無情又狂熱，既瘋狂又冷靜，既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又是浪漫的夢想家，既敵視傳統又很封建，既不信上帝又搞造神運動，既有巨大的開創力又有可怕的毀滅性，既靠人民起家最終又背棄了人民，觀念激進生活保守，有時斯文有時粗暴，自己搞得『無法無天』卻不能容忍同志違逆他所信奉的教條，自己堅信意志力、主觀能动性，卻又死抱歷史唯物主義不放」。見韋政通：《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頁69-70。

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階級鬥爭跟它平行」。¹¹⁴於是，中國又獲得了三年(1963-1965年)經濟調整和發展的時間，毛澤東所鍾情的階級鬥爭，則暫時處於演習階段。人們往往矚目於毛澤東不斷主動出擊，卻忽略了毛澤東還有耐心等待、籌劃的一面。在中國革命中，毛澤東就是依靠這種長期耐心、等待與籌劃的功夫，戰勝一切對手、逐漸取得最高領導權力；而在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以後，毛澤東也絕不輕易出擊，特別是在有大動作之前，都有一個為期不短的籌謀過程。現在，從1962年至1966年，就是毛澤東待機而發的4年，甚至直到1965年，毛澤東還對來訪的法國人說：「我會單獨和群眾在一起。等待」。¹¹⁵

但僅僅兩三年之後，毛澤東就等到了中國的經濟恢復與發展。1964年，中國經濟總產量已經達到1957年的水平；儘管糧食因為大饑荒年代降落得太厲害，但到了1965年也回升到僅次於1957年(大躍進前糧食產量最高的年份)的水平；¹¹⁶工業恢復得遠比農業迅速，1963-1965年間，輕重工業產值每年分別增長27%和17%，¹¹⁷1963年後期，周恩來就自豪地宣布中國已基本做到石油的自足自給，¹¹⁸而到1965年，鋼、電力、水泥、重型卡車這些主要產品的產量均為1957年的兩倍多；在國民總收入上，1965年比1957年高出29%，也比處於低谷的1962年高出51%。¹¹⁹《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作者作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中國國民收入的下降和恢復速度都超過了美國30年代大蕭條期間國民收入的波動幅度。在1929年至蕭條最嚴重的1933年這一時期，美國人均國民收入下降了32%，而中國在1959至1962年間卻下降了35%」，但「由於美國經濟結構的問題積重難返」，雖然三年後經濟也開始回升，但直到

114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4日)，轉引自約翰·布萊恩·斯塔爾(John Bryan Starr)著，曹志為、王晴波譯：《毛澤東的政治哲學》(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91。

115 安東尼·馬爾羅：《回憶錄》，紐約1968年版。轉引自迪克·威爾遜(Dick Wilson)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譯組編譯：《歷史巨人——毛澤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429。

116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428。

117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429。

118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430。

119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432。

1940年(也即十年之後)才重新達到危機爆發前的水平；而中國「由於困難主要因政策錯誤造成」，政策一調整，僅二、三年就恢復了¹²⁰——這大概就是集權體制的特點：一旦決策錯誤，就造成極大災難；但只要糾正、調整，恢復得也快。

問題是，毛澤東又錯誤地總結從大躍進到大饑荒的歷史教訓。早在1962年秋天之後，毛澤東就依靠1957年後所建立、強化的體制，把尚未完全走出饑餓困境的中國逐步推上階級鬥爭的戰車，一如他在1958年把全黨、全國推上大躍進的戰車；而這台戰車一旦啟動，就誰也阻擋不住。1964、1965年經濟恢復以後，毛澤東就開始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進行新一輪的主動出擊，而這次的錯誤決策，又把剛剛復原的中國帶入了新的災難。

編註

- i 八屆十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1962年9月24-27日於北京召開。會議提出了「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的路線。
- ii 中共十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於北京召開。會中趙紫陽報告〈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出在此階段中，黨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 iii 西樓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1962年2月21日-23日於北京中南海西樓召開。由劉少奇主持，會中陳雲報告〈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
- iv 《劉志丹》：李建彤(1919-2005)著，工人出版社出版。小說記述1920年代革命家劉志丹早期在於陝甘寧等處建立革命根據地、與國民黨作戰並戰死的過程。1962年於《光明日報》等處連載。1962年被定為反黨小說，是為「劉志丹案」，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的先徵。
- v 港逃：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間，大陸居民非法越境進入香港的偷渡行為。1962年因糧食短缺，發生大規模的偷渡，媒體稱作「五月大逃亡」。
- vi 1962中印邊界衝突：印度尼赫魯政府的邊境擴張政策，於1962年4月起頻繁而大規模地攔截、突襲中國巡邏隊，更在7月入侵新疆加勒萬河谷，中國於10月出兵。
- vii 新疆六萬多人集體逃亡：史稱「伊犁事件」，1962年4月首先發生伊犁市內的人民動亂、圍攻中共伊犁區行政機構，之後於4月22日、23日、24日夜大量居民衝關、越境逃往蘇聯，共逃亡6萬7千餘人。

120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432。

第九講

通向文革之路(下)

1962-1965

| 2009年11月10日 |

我們繼續講「通向文革之路」。上次講「風起於青萍之末」，這次的題目是「一從大地起風雷」。

一、一從大地起風雷

這還是「風雷乍起」，不是高潮，但已經相當可觀了。毛澤東是搞階級鬥爭的好手，每次出手，都有新的發展。六十年代中期的階級鬥爭，不同於五十年代反右鬥爭，有兩個新的特點：一是搞「全面的階級鬥爭」，即國際、國內兩條戰線同時作戰；另一是「反對修正主義」，不僅反國外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同時反「中國修正主義」。

毛澤東在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開幕式上，一開頭就把話點明：「在我們中國，也有跟中國的修正主義的矛盾。我們過去叫右傾機會主義，現在恐怕改一個名字為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¹「中國的修正主義」，這是一個新概念，非常值得注意。在1957年毛澤東修改〈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曾加了一段話：「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²那時候所談的修正主義主要還是指稱一股思潮，但到了1962年再講「中國修正主義」時，所指的就是一種政治力量，是毛澤東要

1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卷)，頁1252。

2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92。

打擊的主要對手，用毛澤東的習慣思維來說，就是「繼續革命」的主要對象了。

毛澤東進一步分析說：「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³這樣，他所要發動全面的階級鬥爭，就不止是同時開闢國內、國際兩個戰場，其最主要目標是指向黨內的「修正主義」。

因此，我們關於這一段歷史的敘述，也就圍繞國內與國際兩方面展開，而且要特別關注兩者間的內在聯繫。

(一)國內戰場：基層、中層和上層的階級鬥爭演習

1. 基層：從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四清運動，「挖資本主義的根子，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劉少奇作了「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報告。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劉少奇報告中的一段插話：「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義根子」。⁴這段話有兩個意思，一是指明在農村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發展為四清運動¹)，目的是要拔掉修正主義根子，解決社會基礎問題；而他所謂「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實際所指的是經濟困難時期農村基層幹部多吃多占、接受賄賂的問題，也即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腐敗問題。這兩個問題之中，所謂「拔掉修正主義的根子」是毛澤東的主觀判斷和意圖，而「農村黨組織的腐敗」卻是一個實際存在、必須解決的問題。

這就引起我們的討論興趣：當時中國農村存在的實際問題是什麼？基層

3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公報〉(1962年9月27日)，收《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53-654。據《毛澤東傳》說明：「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中，作了完整的表述。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十四講話的基礎上，加以整理，並經過他修改審定的」。見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卷)，頁1259。

4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1963年2月25日)。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動：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295。

黨組織的腐敗到底表現在哪裡，原因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封農民的「上書」裡所反映的中國農村實情：

合作化以前，共產黨打倒地主分田地，農民是非常感激黨的。合作化以後，一搞統購統銷，為了要糧食，幹部們的作風一天比一天惡劣，農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到了人民公社化以後，幹部對我們農民的態度惡劣到了極點。這幾年來我們這裡一些幹部口口聲聲代表黨的領導，對群眾實行的是比國民黨統治還厲害的統治。打罵、捆綁、餓飯、送勞教，是他們對群眾惡毒的手段。尤其是三元大隊總支書記蘇海清，人稱活閻王，經他打死的人命有無數。他對社員，那真是比國民黨土匪還要厲害得多。

今年三隊死了頭豬，是餓死的。這幾年，人都沒得吃，餓死一頭豬很常見，我們這裡不知餓死多少人呢！結果讓蘇書記撞見了，連打帶罵。非要女養豬員戴友姑為死豬當孝子，披麻戴孝，守墳哭地。天哪，自古至今，哪朝哪代，有這樣的事，有這樣的官？！⁵

從這封湖南農民的上書，大體可以看出農村的三個問題。其一，農民和共產黨幹部關係緊張，肇因始終是糧食問題——從統購統銷開始，實際上就是在糧食問題上對農民進行控制和剝奪，如我們一再分析，這是富國強兵的治國路線和邏輯所導致的。其二，「農村幹部腐敗」主要發生在人民公社化以後，在權力高度集中、幹部實際上全面控制農民之後，就肆無忌憚地多吃多占，腐敗也就不可避免。其三，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第一把手（如信中所說的那位「蘇書記」）掌握了絕對權力，就對農民實行比國民黨還厲害的法西斯專政。

以上三大問題，在六十年代的中國農村，是具有代表性的。它表明，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的腐敗，其根源就在「富國強兵的現代化路線」，以及1957年後建立的第一書記專政體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對農民的全面控制；這是一種體制性的腐敗、變質。

毛澤東和共產黨當然不會承認這一點，他們也絕不會從根本體制上來解決黨的腐敗，但他們又必須面對基層黨組織與農民間關係緊張的問題，因此

5 澧縣閘口公社社員：〈關於幹部問題上中共中央領導人書〉（1960年2月16日），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頁163、164-165。

就只能從解決基層幹部的經濟問題和作風問題來緩解矛盾。於是，運動就從「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轉為「四清」——即清帳務、清庫存、清工分、清財務。可以看出其目標是要清理幹部的經濟問題，儘管回避了制度性的根本問題，但「四清」涉及對於幹部侵害農民利益等問題的處理，因此還是符合農民的要求的。我們應該承認，毛澤東發動「四清運動」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毛澤東發動的運動大都（當然不是全部）是有群眾基礎的，但問題在於毛澤東如何引導運動的發展。

毛澤東迅速把四清運動暴露出來的農村問題，納入到他的階級鬥爭軌道上。他在一份材料上作了這樣的批示：

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危險的情景啊！⁶

這是一個相當關鍵的判斷，但卻會引發四個問題。

首先自然是「誇大敵情」，所謂「中國變修」ⁱⁱ問題，就是一個想像中的誇大。其二，依然把傳統階級鬥爭中的對象，所謂「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這些老「牛鬼蛇神」作為主要危險、主要鬥爭對象，但這是不符合實情的，因為經過歷次運動，農村裡這些被打倒的階級已被剝奪一切政治、經濟權力，並不再具有對抗政權的力量，所以「地、富、反、壞」也是一個被誇大的敵人，若把新體制造成的農村問題歸之於他們的破壞，顯然是轉移目標。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之後還有劉少奇），進一步提出所謂「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問題——毛澤東早在1960年信陽餓死100萬人的惡性事件發生後，就斷定「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並說明「民主革命尚未成

6 毛澤東：〈轉發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1963年5月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293。

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⁷劉少奇則說得更明確：信陽地主階級復辟了，要讓信陽人民來個第二次解放，而「地、富、反、壞」和國民黨殘餘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⁸這種說法，就把共產黨領導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所造成的饑荒致死和打人致死等問題，都算在所謂「國民黨殘餘」頭上。

這中間有一個頗為奇特的邏輯轉換。同學是否還記得，我之前講過，建國初期，大陸老百姓確實流行著一個觀點，認為所有的壞事都是國民黨搞的，腐敗根源在國民黨，共產黨則是絕對清白。那麼，現在卻發生共產黨幹部（例如湖南農民上書中提到的那位「蘇書記」）對農民實行比國民黨還要厲害的專政，這問題又如何解釋呢？於是，就有了這樣的邏輯：共產黨不可能對農民實行專政，做這種事情的一定是國民黨；因此，對農民實行法西斯專政的幹部，要麼本身就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要麼就是被國民黨殘渣餘孽或其社會基礎「地、富、反、壞」所腐蝕，這都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後果。怎麼證明這個邏輯呢？於是，就帶著這個先驗結論去找證據；找來找去，找到兩條：一條是那位信陽地委書記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而這是可能的，我以前講過，共產黨內許多知識分子黨員都是出身於地主或上層社會家庭。另一條是18個縣市先後任縣委書記的20人中，有8人的老婆是地主、反革命的女兒，這就是被國民黨殘餘「腐蝕」的證據⁹——這些「證據」在今天看來近乎荒唐，但在那個處處講階級分析、階級鬥爭的年代，卻是無法辯駁、無人敢提出質疑的。

問題更在於，從這種沒有什麼依據、全憑主觀臆造的前提出發，竟發展成為所謂「補民主革命的課」的新「奪權鬥爭」：被打擊的首先是農村基層幹

7 〈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4號），本文件中引述了毛澤東的指示。轉引自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篇），頁67。

8 喬培華：〈信陽事件〉，未刊稿。轉引自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篇），頁68。

9 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1910-2001）在河南省委常委會上的講話（1060年12月6日）。轉引自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篇），頁73。

部，在信陽地區1萬多名幹部被批鬥，集訓20萬人；¹⁰農村中凡在歷史上與國民黨有過關係的人，所謂「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也都再遭劫難。

毛澤東在「挖修正主義根子」的旗號下，重提要「補民主革命的課」，即是1960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殘酷鬥爭的重演，這次，毛澤東作出了更加嚴重的估計。1964年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我看，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¹¹——我們前面剛說到「誇大敵情」，在此發展到了極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重新「奪權」又再次被提出了。所謂「重新組織階級隊伍」，某種意義上，就是要在農村重新劃分階級，毛澤東在一個批語裡，甚至將「基層幹部」和「富裕中農、富農地主」一起視為「剝削階級」，而把「貧下中農」視為「被剝削階級」。¹²

這背後，隱含著我們要討論的第三、四個問題——其三，這種鬥爭，在實質上是要把體制所造成的大饑荒和對農民實行專政的問題，轉嫁到農村基層幹部身上——這些幹部當然有自己的問題，而有些(如那位「蘇書記」)還真是農村土霸王，加上他們處在第一線、處於和農民直接對抗的地位，因此很容易激起公憤，但是他們所執行的是上級(包括毛澤東)的政策和指令，他們不受制約的權力也是黨(包括毛澤東)給予的。現在，卻要這些基層幹部來承擔全部責任，而真正應該對農村問題負主要責任的黨上層和毛澤東本人，卻因此而「金蟬蛻殼」，還製造出「毛主席、黨中央英明，全是基層幹部把事情搞壞了」的假象。

其四，我們在前面討論中已經說過，農村基層幹部的腐敗，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但該如何解決？從毛澤東所發動的奪權鬥爭看，他顯然是要用群眾階級鬥爭的方式來解決黨的腐敗問題，這可能對黨幹部形成壓力、取得一時之效，但卻極容易、甚至必然會導致鬥爭擴大化與群眾專政，形成新的紅色恐怖，並出現大量新的冤案——「打擊一大片」，又在實際上保護了「一小撮」。

10 轉引自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篇)，頁69-71。

11 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345。

12 毛澤東：〈對陶鑄的信和蹲點報告的批語和批注〉(1964年12月10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頁259-260。

「四清運動」的實際效果就是如此：最後四清由「清帳目、清庫存、清工分、清財務」，變成「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結果是對農村社會進行全面清洗，既是對黨內的大清洗，同時又是對社會的大清洗，並為毛澤東下一步發動文化大革命，進行全國、全黨範圍的大清洗作了思想、輿論與組織上的準備和預演——這才是毛澤東的真正目的。

隨後，毛澤東又把這個農村階級鬥爭的模式運用到工廠、城市裡，並導出一系列更加極端的結論：「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還更多些」；¹³「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¹⁴

毛澤東已經斷定農村 1/3 的政權不在自己手裡，現在又估計 1/3、1/2 的城市工業已經資本主義化，這就真的是把中國的形勢看作是資產階級全面復辟了，這顯然並不符合實際國情，卻成為之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據。¹⁵

當然，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毛澤東所提出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概念。我們首先聯想起 1957 年青年學生提出的「特權階級」概念，官僚主義者階級顯然是特權階級概念的延續，和我們上一講提到的《星火》在 1960 年提出「新興官僚統治階層」概念，也是相似的。這就意味著毛澤東實際上接下了被他鎮壓的「右派」、「反革命」的觀念和口號，而且比他們更為激烈。這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思想文化現象：民間思想的先驅者，他們最早感應社會的矛盾，發出「中國可能或已經出現特權階級」的預警，卻因思想的超前而不被一般群眾接受，更被當局所鎮壓；但也正因為人們拒絕了他們的警示，之後的歷史發展

13 毛澤東：〈對謝富治在瀋陽冶煉廠蹲點的報告的批語〉（1964 年 12 月 5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頁 256。

14 毛澤東：〈對陳正人關於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注〉（1965 年 1 月 15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 冊，頁 265-266。

15 毛澤東在 1964 年 2 月，對來訪的金日成（1912-1994，北韓）說，在中國各種「搞地下工作」的壞人有 1,000 萬人，毛澤東還計算了一下，在 6 億 5,000 萬人口中，這種人就占了 1/65，就是 65 人中有 1 個。見曹英等：《特別別墅——紅牆以外的紅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頁 268-270。轉引自高華：〈從《七律·有所思》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運思〉，文收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頁 247。

中特權問題日益嚴重，特別是在經過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以後更是如此，以至毛澤東自己也不能不正視社會主義體制下新特權階級的形成，進而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這在共和國的歷史上是個規律性現象：打壓民間思想運動的鎮壓者，往往是其遺囑的執行者；毛澤東之於1957年的「右派」是如此、鄧小平之於八十年代初民間運動的關係又何嘗不是如此。

但是如果再作深入分析，又不難發現毛澤東與1957年「右派」學生的分歧。後者雖然沒有來得及對「特權階級」作進一步的學理分析，但他們的思路明確，即要從生產資料的占有、分配這些方面進行探討，堅守從經濟地位分析、討論階級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原理。毛澤東既然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他就應該繼續對其作經濟分析，但毛澤東卻沒有作出任何具體分析和討論，在「四清運動」中又提出另一個概念「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為替代，以後不再提及「官僚主義者階級」。事實上，這兩個概念具有不同的意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再是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在之後的文化革命中，這就更直白地變成一個「路線」問題，即「跟誰走」的問題——是要跟隨毛澤東，還是跟隨別人，如劉少奇或林彪？這裡也說一個小故事：有一天，以說話坦率著稱的陳毅(1901-1972)元帥當面問毛澤東：你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什麼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我陳毅算不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毛澤東回答說：「黨內的，當權的，又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就是黨內走資派。你陳毅同志是當權派，只要走社會主義，當權派還可以當下去」；¹⁶毛澤東沒說出來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跟著我走，就要被打倒——這裡，就不再以實際客觀標準定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而是以極大的主觀隨意性「說你是你就是，說你不是你就不是」，這個概念完全成為毛澤東進行黨內鬥爭的工具，而其實質也是如此。但是，毛澤東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兩個概念，還是啟發了文革中的民間思想者，並曾引發熱烈討論，產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

那麼，毛澤東在1965年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概念的意義究竟在哪裡？如一位研究者所說，即使在國際思想文化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毛澤東

16 轉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頁346。

也「不是第一個認識到社會主義革命會產生官僚統治的剝削階級的人。在毛之前有許多人已經看到了這一點。其中有韋伯、托洛斯基、米洛萬·吉拉斯(Milovan Djilas)等人。毛關於新官僚統治階級的觀點的獨到之處，不在於他對這一問題的分析——無論如何，他的理論還是不很成熟的——而在於這個觀點是由一個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提出的。這種事情過去不曾有過，將來也不太可能再出現。在官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中，毛的這種觀點不啻是異端邪說，在政治上十分危險，它動搖了馬克思主義極力論證的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¹⁷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後毛澤東時代，從鄧小平以降的所有中國領導人不管如何宣稱自己「高舉毛澤東旗幟」，卻都一致拒絕毛澤東這一革命性概念。而事實上，毛澤東本人也沒有將這一概念堅持到底，這也顯示了毛澤東的內在矛盾。

這裡我還想把討論深入一步：六十年代的中國到底有沒有形成「官僚主義者階級」？如果把它作為「利益集團」來理解，著眼於政治權力的壟斷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它是確實存在的；但如果從生產資料的占有和分配角度來認識，「官僚主義者階級」恐怕要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才逐漸形成——今天的中國確實存在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一般又稱之為「權貴資產階級」。這樣，六十年代毛澤東所提出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概念，一方面確實起了動員群眾的作用，但由於概念的不確定性，再加上毛澤東採取群眾運動的階級鬥爭方式，就很容易把幹部和群眾之間的一般性矛盾變成階級矛盾，並引發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這同樣也帶來了擴大矛盾、人為地將矛盾激化和政治化的問題，並造成幹部與群眾、群眾與群眾（群眾中也有不同的利益群體，他們與幹部的關係不同，很容易形成「保」與「革」兩派）之間的搏殺，造成新的災難，文化大革命時期就發生了許多慘劇。

2. 中層：思想文化教育領域的大批判運動

毛澤東在推動中國的反修正主義鬥爭時，有一個基本分析，即認定中國產生修正主義的原因，一是來自帝國主義和國外修正主義的壓力，另一是來自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而且，他把重點放在國內方面。所謂「國內資產階

17 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284。

級」，由於資本家在此時已經不構成實際威脅，因此毛澤東真正視為心腹之患的，還是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且，他的認識又有新的發展：如果說五十年代反右與反右之後，毛澤東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主要是指國民黨時代所培養的知識分子；那麼在六十年代中期，他在繼續打擊這些「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同時，又把黨內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在思想、文化、學術、教育領域處於領導或領軍地位的黨內知識分子，也列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範圍，而且認為他們具有更大危險性。因此，他把黨內外具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都稱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他所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起視作兩大打擊對象，也即是他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兩個革命對象。

作為一個預演，毛澤東六十年代中期在農村、工廠基層「挖修正主義根子」同時，又在思想、文化、學術、教育各領域發動了大批判運動。1963年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反對修正主義要包括意識形態方面，除了文學之外，還有藝術，比如歌舞、戲劇、電影等等，等等，都應該抓一下」。¹⁸

接著，毛澤東連續發表了一系列非常嚴厲的批判：「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檢查一下，認真改正，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1963年11月），¹⁹「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²⁰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談到「高薪階層」會成為「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的一部分」，毛澤東補充說：

18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3年9月27日)。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頁1226。

19 毛澤東對《戲劇報》、文化部的批評(1963年11月)。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226。

20 毛澤東：〈關於文藝工作的批語〉(1963年12月12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436-437。

「包括高薪文學家，高薪教授，高薪科學家」。²¹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在一個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的批示裡，就作出了更為嚴峻的判斷：「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ⁱⁱⁱ那樣的團體」。²²

1964年8月14日，毛澤東在中宣部〈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請示報告〉上批示：「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至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²³

1965年6月，毛澤東又向衛生部門提出警告：「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15%服務，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的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

21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講話後的插話(1964年6月11日)。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228、1229-1230。據說毛澤東還提出了「工人貴族」的概念，但這並不符合事實，有這樣的統計數字：上海全民所有制工廠，在1961-1965年，月工資在40-60元的，占職工總數的89.69%，月工資在71-80元的占0.48%，月工資在81-90元的占0.07%，最低的40元與最高的90元，僅1倍多。即使是高工薪，1957年少將月薪350元，1956年一級教授(全國僅56人)月薪345元，以後幾十年也並無變化，只是最低工資的9倍。高級幹部的工資情況也大體如此，地方中級幹部的工資和全民所有制企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的差距也在兩倍左右。據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所附：〈表八·上海全民所有制職工月平均工資〉、〈表九·1961-1966年上海職工按標準月工資分組〉，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頁592。又據黃新原：〈1956年的定級〉，載《人民政協報》(2004年10月28日)。轉引自高華：〈從《七律·有所思》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運思〉，收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頁248。

22 毛澤東：〈對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的批語〉(1964年6月27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頁91。

23 毛澤東：〈對公開放映並組織批判影片《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報告的批語〉(1964年8月1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頁135。

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²⁴

1964年11月26日，毛澤東在一次彙報會裡又下了這樣的判斷：「文化系統究竟有多少在我們手裡？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半？還是大都不在我們手裡？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們手裡」、「整個文化部都垮了」。²⁵

這個估計就比對底層情況的估計還來得嚴重，當時估計農村是1/3、工廠也是1/3，而在文化部門則是至少有1/2「不在我們手裡」：此刻，文化大革命的奪權鬥爭已經呼之欲出了。

這一次大批判涉及面非常廣，除了所謂「電影毒草」、「戲劇毒草」、「文學毒草」之外，還批判了一大批社會科學各領域中過去被稱為「馬克思主義權威」的黨內大知識分子，如哲學界的楊獻珍(1896-1992)、經濟學界的孫冶方(1908-1983)、歷史學界的翦伯贊(1898-1968)等等，他們的主要罪名都是在思想理論上和毛澤東對抗——楊獻珍對大躍進中的主觀唯心論，以及將矛盾、鬥爭推於極端的「一分為二論」提出質疑和批判，孫冶方強調價值規律作用和企業自主權、批判計劃經濟弊端等等，這些本來都表現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和懷疑精神，而且也都是學理的討論，現在卻變成「鼓吹修正主義」的政治問題，並使倡議者遭到殘酷的迫害。但是，這些人都堅持自己的觀點和信念、至死不變，由此可見顧準並不完全孤立，在中國體制內、在中國共產黨內，還是有一批有骨氣的知識分子。

毛澤東更關注教育問題。他在1964年2月13日有一個〈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當時稱為〈春節講話〉，可以說是震動了整個中國教育界，以後直接影響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我在這裡唸幾段關鍵性的話，看看諸位有什麼反應，這是很有意思的：

學制可以縮短。

學制縮短以後，中學畢業生只有十五六歲，不夠當兵年齡，也可以過軍隊生活。不僅男生，女生也可以辦紅色娘子軍，讓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去過半年到一年的軍隊生活。

24 毛澤東1965年6月26日關於衛生工作的談話。

25 毛澤東在聽取西南三線工作彙報時的插話(1964年11月28日)。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227。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

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穫，為什麼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麼是語法，什麼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麼多註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²⁶

怎麼樣，大家聽了這番話，都深有同感吧？這些話說明了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比如他強調學生學習的獨立自主性，強調自修自學，強調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反對死記硬背與繁瑣哲學，都具有合理性。問題是，後來毛澤東把它絕對化，完全否認教師與學校教育的作用，就產生了许多問題；文化大革命時期乾脆停止了學校教育，耽擱了整整幾代人。然而，毛澤東在1964年根據他的教育思想批判當時中國教育，確實是擊中要害，這個批判甚至可能一直延用到今天的大陸和台灣教育——同學們聽完之所以產生共鳴，原因就在此。所以完全可以想見，當時被課程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大學生、中學生，聽說可

26 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1964年2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頁22-23。

以不要考試、可以交頭接耳，頓時有一種解放之感；當時連我這樣的中學教師，也覺得原來那種以考試、分數壓人，與學生為敵的教育大有改革必要。毛澤東確實是一個大政治家，他對於群眾情緒的把握是相當準確的，對青少年的情緒也有深切了解，在後來的文革中他具有的煽動力、號召力，絕不是偶然。

問題在於，中國教育的問題的背後，依然是體制問題，特別是與我們前面反覆討論過的「五七體制」對人們(包括青少年)所加強的精神控制直接相關。但毛澤東卻按照他的階級鬥爭邏輯，把一切問題都歸之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進而得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結論，²⁷這就不是20%、30%、50%，而是100%地「不在我們(共產黨)手裡」，需要全面奪權了。這樣，就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所有教育工作者，從教育各級行政部門的領導到學校校長、老師，都成了殘酷打擊的對象。青年學生對教育制度的不滿，最終被引向了處在教學第一線的老師和校長；越是對學生要求嚴格的老師、校長，越容易成為學生反抗的對象。其實，老師和校長的「嚴格要求」本來就混雜了「合理、必要的」和「不合理、過分的」兩者，但年輕的學生很難加以區分，所以一經煽動，就很容易產生過激的行動，文革中許多迫害老師與校長的校園暴力就這麼產生了。

當毛澤東宣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時，²⁸實際上就把他的思想推向了極端。首先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外延的進一步擴大：其所包括的不僅是舊社會、國民黨時期培養的知識分子，也不僅是黨內的權威知識分子，甚至把建國後共產黨自己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五十、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也包括在內。這就幾乎是要「一網打盡」，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看作是革命對象——我自己就是在這個指導思想下被打成反革命。雖然我當時不過是20多歲的大學畢業生，也被稱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理由是我從北京大學畢業，意即越是名牌大學，學生就會越反動；在這邏輯下，不僅是「書讀得越多越蠢」，而且是「書讀得越多越反

27 毛澤東：〈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批語〉(1966年5月7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頁54。

28 毛澤東：〈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批語〉(1966年5月7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頁54。

動」了。

1966年4月，也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起始時期，毛澤東在一個批語裡對知識分子、大學教授、學生有這樣一個分析：「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除了幹反革命，搞資產階級復辟，培養修正主義分子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²⁹——這樣，毛澤東實際上就回到我們在第二講「反右運動前後」裡曾經提過、他在1926年所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裡的判斷：所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都是極端的「反革命派」與「半反革命派」。知識分子，特別是所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就注定要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對象。而毛澤東對書本知識、學問、科學研究的著意貶抑，對實踐(革命、做工、耕田、打仗)作用的無限誇大，就使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打上了「反知識、反文化」的反智主義烙印。

毛澤東由此而重申：「有同志說：『學問少的打倒學問多的，年紀小的打倒年紀大的』，這是古今一條規律」，³⁰這也就把他1958年提出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邏輯推到極端。後來，在教育和文化、學術部門發動文化大革命所要依靠的對象，變成了文化程度不高的勤雜人員、司機、校工，真正成了「學問少、文化低的」打倒「學問多、文化高的」、「年紀小的」打倒「年紀大的」、「小人物」打倒「大人物」、「普通工作人員」打倒「權威、精英」的「革命」，這些結果都絕非偶然。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被打倒的權威、精英本身並非沒有問題。大家還記得吧，我們在講沈從文的時候曾經說過，沈從文作為歷史博物館的講解員，他自己就遭受到博物館內學術權威的壓力，有些權威甚至有點像學霸了。也就是說，在學術界、思想文化界、教育界確實存在這種「權威」與「普通工作人員」、「知識分子」和「非知識分子」、「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矛盾。但藉用毛澤東「兩類矛盾」的說法，這都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現在，毛澤東宣布這些

29 毛澤東：〈對《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半讀》一文的批語〉(1966年4月1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頁35。

30 毛澤東：〈對《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半讀》一文的批語〉(1966年4月1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頁35。

知識分子、權威都是革命對象，就把正常的人民內部矛盾擴大成政治問題，並引向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成為毛澤東「掃蕩中層」戰略計劃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那些被毛澤東煽動起來「造反」的小人物、非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不過是毛澤東所啟動的戰車裡的一兵一卒，他們的不滿情緒都被毛澤東利用了。

在這個批語裡，毛澤東還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學校一律要搬到工廠和農村去，一律實行半工半讀」、「不去就解散這類學校，以免貽患無窮」³¹——這樣，在之後的文革中，所有學校一律停課、主張取消文科大學，都是順理成章的。

然而，毛澤東的真正關注點，還是在上層的鬥爭，也就是接班人危機。

3. 上層：接班人危機引發的鬥爭

我們從研究者在美國約翰遜總統圖書館(Lyndon Johnson Library&Museum)發現的一份「情報備忘錄」說起。

1964年3月19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向美國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一份機密報告〈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和繼承問題〉，作出了四點分析：其一，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所有人員都屬於第一代革命者，在政治局的18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是60到70歲，毛澤東這時已經70歲了；其二，毛澤東是中共黨內威信最高的，中共最高核心層領導基本穩定；其三，劉少奇是毛澤東所確定的繼承人；其四，在中共第二代中，也就在當時為40歲到50歲之間當中，目前還不能肯定由誰來接班。中央情報局認為，劉少奇和毛澤東是同一代人，且劉少奇有明顯缺陷，即「缺少色彩，沒有幽默感，無法和毛澤東一起分享那種『超凡權威』」，因此，即使劉少奇順利接了毛澤東的班，也只是同代相傳，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毛澤東的路線，因此並不重要。重點在於之後的第二代，而第一代到第二代之間需要有第三人作為銜接，也就是毛澤東、劉少奇之外的第三個人，這才是關鍵人物。這個人是誰？中央情報局分析，中國當時有三個人可能成為這關鍵第三人：周恩來、鄧小平和林彪。周恩來是溫和派，

31 毛澤東：〈對《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半讀》一文的批語〉(1966年4月1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頁35。

任何時候都不當第一把手，所以周的可能性不大；林彪可能性很高，但是林彪身體不好；最有可能就是鄧小平做第三人。因為，第一，鄧小平年輕。第二，他又無疑屬於中共第一代，在長期革命歷史中建立了個人威望。第三，他是當時中央書記處書記，掌握黨的實權。第四，在中蘇論戰中，他是「激進派」，其意識形態更接近毛澤東，因而是毛澤東和劉少奇所信任的人³²——以後的歷史發展已經證實，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分析相當準確，包括他們分析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關係、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關係，我認為也比今天許多研究者一廂情願地誇大毛、劉，毛、鄧矛盾，更符合實際。

說到毛澤東確認劉少奇是接班人，這裡也有一個故事。1961年英國著名的退休元帥蒙哥馬利參訪中國，事前英國研究中國的學者，後來寫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 1930-，英國)曾向他建議，應該向中國人提出關於毛澤東的接班人和接班人的接班人的問題。³³所以他到了中國之後，見到中國老百姓就曾二度提問：「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擁護誰，你最聽誰的指揮？」在他與毛澤東會見的時候提出關於「接班人」的問題，毛澤東就告訴他：「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³⁴實際上毛澤東在此時已經退居二線，由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經他這麼一說，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就成為大家關注的中心，直到今天也還是研究界眾說紛紜的話題。

我已經多次說過，我不贊成將毛、劉矛盾說成是兩條路線之間的矛盾，而且我認為，要到比較後期，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矛盾才真正激化。1962年七千人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對形勢的分析確有不同，但那時毛澤東基本上還是信任劉少奇的。比較有意思的衝突，可能發生在1962年7月，毛澤

32 參看李向前：〈誰是毛澤東的「繼承人」？——美國中央情報局六十年代的分析〉，文收《毛澤東剪影》，頁300。

33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頁640-641。轉引自錢理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14。

34 毛澤東同蒙哥馬利談話記錄(1961年9月23日)。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頁1173。參看熊向暉：〈毛澤東向蒙哥馬利談「繼承人」〉，《我的情報和外交生涯》(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9)，頁386-387。

東在游泳池上與劉少奇之間的那場爭論，仔細琢磨毛澤東的話「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可以看出，毛澤東在那時還是把劉少奇當作接班人看待，他是在怪劉少奇不頂住。因為如此，後來批判黨內修正主義時，劉少奇並沒有被當作靶子，主要的靶子是鄧子恢，批判他在農業上搞「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還有一位中共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他主張不要把國際關係弄得太緊張，對外援助也要量力而行，卻被概括為「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反動派和、對革命支持少」，即所謂「三和一少」而大加批判。³⁵ 由此可見，在反對國內外的修正主義時，毛澤東最初還是依靠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至少說，即使毛澤東對劉少奇有點不放心，但也還是處在觀察階段。

更重要的是，這時劉少奇還是努力緊跟毛澤東。如我前面所說，在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時候，劉少奇堅決支持毛澤東，而且「左」的程度絕不亞於毛澤東。六十年代毛澤東提出要重新開展全面的階級鬥爭、要反對修正主義，劉少奇態度非常鮮明，是堅決支持的；四清運動的時候，劉少奇甚至比毛澤東還要「左」。這就需要對1962年至1965年間劉少奇的思想、心理狀態和行動，作一點具體的考察和討論。

首先我們注意到，這一時期，毛澤東和劉少奇在黨內的威望開始發生微妙變化。這也是我們前面介紹過的：劉少奇主持工作，推行調整政策十分堅決，而且是大刀闊斧，效果非常好。他在周恩來、鄧小平和陳雲的支持下，迅速恢復了中國經濟的元氣，使中國從饑餓的困境中走了出來，於是劉少奇的威望急遽上升；雖然沒有任何人挑戰毛澤東的權威地位，但毛澤東的威信逐漸下降，已是一個趨勢。

這裡有一個材料：顧準在1960年初寫的日記裡，談到中國經濟一旦恢復，「毛先生就大功告成了」，³⁶「他該走了，大概也真地快走了」。³⁷ 顧準還對劉少奇所主持推行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給予很高的期待，認為這意味著要「回到1957年」，即將確立一個「和平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³⁸ 還

35 參看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261-266。

36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1月16日），《顧準日記》，頁244。

37 顧準：〈顧準日記〉（1960年2月28日），《顧準日記》，頁260。

38 顧準：〈1962-1964年在經濟所——歷史交代〉（1969年6月10日），《顧準自述》，頁296。

有這樣一份材料：一位名叫王佩英(1915-1970)的北京鐵路專業設計院的清潔工，是1951年入黨的黨員，她在七千人大會後，就認為毛澤東應該為大躍進的錯誤引咎辭職，讓幹得好的人(指劉少奇)上去，並揚言「毛主席應該退出歷史舞台，不然他以後沒有退路」；到1965年，她更提出要求退黨，理由是：共產黨已經「站在人民頭上壓迫人了」，「我再不退黨，我的罪就更大了」，而「領導共產黨變質的就是毛主席」；在文革中她更是旗幟鮮明地支持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最後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於1970年被公開處決³⁹——黨內高級幹部顧準和普通黨員王佩英不約而同地表現出「擁劉棄毛」傾向，在當時黨內可能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也多少傳達了某種信息，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六十年代中期，即使毛澤東的絕對威望並沒有根本動搖，但劉少奇的威望上升卻是事實。

重要的是，劉少奇本人在這情況下，也有一點想利用這個威望上升趨勢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大概是在四清運動中劉少奇表現得更「左」的內在原因。他不但和毛澤東一樣強調「基層單位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甚至提出「三分之一打不住」，⁴⁰而且還提出「反革命兩面政權」的概念，⁴¹認為很多基層政權「打著共產黨的旗號，辦國民黨的事」，⁴²結果，就導致全國各地在各級政權中找「小台灣」，最後便在省一級裡，找到了貴州。

當時我正在離貴州省會不遠的安順教書，因為我不是黨員，並不太知道黨內鬥爭的情況，但我還是不斷聽到各種社會傳言，先是聽說劉少奇派四清工作組前來宣布「貴州爛了」，接著就傳來消息說貴州的省府貴陽，就是一個「小台灣」。之後，事情越說越離奇，就像一個偵探故事：據說工作組一來，就有省公安廳(類似台灣的情治部門)的人密告，說貴陽市第一書記貪污黃金，市長是叛徒。這情報並未經查實，公安部門就去抄第一書記的家，據說

39 郭宇寬：《王佩英評傳》，自印本。

40 劉少奇和山東幹部的談話(1964年7月)，轉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頁132。

41 劉少奇對〈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的修改，見吳冷西：〈同田家英共事的日子〉，董邊等編：《毛澤東和他的祕書田家英》(增訂本)，頁149。

42 王光美：〈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轉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頁170。

在他家裡的字紙簍裡面查到一張報紙，上面寫有「中華民國萬歲」幾個字，於是就憑這一點，把貴陽市委書記定罪為「現行反革命」，並據此而宣布貴陽市委以至貴州省委，都「爛掉了」、是「小台灣」。然後，就是逐層撤幹部：時為貴陽市委宣傳部長，後來成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胡耀邦有力助手的朱厚澤（1931-2010），就在這次被整肅了，安順地委第一書記，也一聲令下就被撤職了，當時我對他印象滿好，他經常跟我們做報告，顯得很有水平——有研究者認為，在劉少奇指導下的貴州四清運動「有點像30年代蘇聯的『大肅反』期間偵破的那些層出不窮的『間諜破壞案』，都是由『契卡』人員率先『揭發』，然後由契卡部門介入，擴大偵探，再對主要領導幹部實行逮捕」，⁴³這可能是有留蘇背景的劉少奇的慣用方式，但他也學到毛澤東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這種專政機關與群眾相結合，大概是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的方式，其打擊面和危害性，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並無實質區別。我親眼目睹的貴州四清運動，就是一個例子，它告訴我們，在「通過搞大規模階級鬥爭，來鞏固黨的一黨專政」這個基本點上，包括劉少奇在內的整個黨的領導集體，和毛澤東是完全一致的，這是他們既定的治國方針。他們畢竟都是同代革命者；即使劉少奇掌握了最高權力，他搞起階級鬥爭時的堅定與無情，也絕不下於毛澤東。

如研究者所說，劉少奇「在治國方面，有非常務實和理性的一面」，但他「又有走偏鋒的特點」：「1962年下半年後，在毛一手營造的極左大氣候下，劉不願或無力抵擋，他快步跟上毛的步調，順風扯帆，到了1964年甚至比毛還要左。在『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大棒下，不僅許多無辜幹部受難，已在社會底層的前國民黨時代的留用人員也一再受到嚴厲打擊。一些被處理的幹部，特別是在城鎮工作的幹部，和大饑荒時期的違法亂紀並沒有關係，就是因為出身不好，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劉在1964年的這些舉措，很難說沒有他個人目的，許多情況都表明，劉想藉『四清』真正樹立起他『號令天下』的權威」。⁴⁴

這一時期，劉少奇已走向權力頂峰。他先是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1921-2006）去做四清的蹲點，創造出「桃園經驗」^{iv}，即按照劉少奇「兩面政權」估

43 參看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載香港《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

44 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載香港《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

計，避開當地幹部、祕密進行扎根串連，把群眾發動起來奪權——這倒是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做地下工作的劉少奇所習慣的鬥爭方式，現在劉少奇想要將之全面推廣到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他帶著夫人從北方走到南方，在14省市作巡迴報告，各地黨、政、軍幹部也都紛紛表示支持，大有一呼百應之勢。一貫謹慎的劉少奇，此時也不再顧及黨內鬥爭的忌諱，他回到北京，就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所有在京的高級幹部來聽他講話，包括政治局委員和元帥。據一位在場者回憶，劉少奇站在講台上走來走去，一邊走一邊講：「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現在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話說到這裡就戛然而止，前後不到一個小時。劉少奇大概沒有想到他這次講話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首先，這講話引起部分聽會者的不滿，當場就有人發牢騷說：「這是幹什麼？這不是來『聽訓』嗎？」還有的軍隊幹部在罵娘⁴⁵——當然這只是一個小插曲，但如果聯繫我們前面所說，在1962年軍隊幹部在對形勢看法問題上和劉少奇分歧，以及他們對毛澤東的支持，的確可以看出之後事變發展的某些端倪。劉少奇在軍隊的影響遠不及毛澤東，他始終不掌握軍權，這是他的致命之處。

最後，終於有了「兩個主席的攤牌」。衝突發生在1964年12月20日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堅持把四清的重點放在整頓「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就是要發動群眾來整我們這個黨」、「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⁴⁶他唸了杜甫的詩：「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⁴⁷實際上毛澤東已經下了決心，要集中力量打擊黨內各級官僚集團，甚至不惜將整個黨組織搞亂；而劉少奇正是擔心，在各單位抓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會根本動搖黨的組織和統治基礎。因此，劉少奇主張「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既要整頓黨內走資派，也要打擊舊階級敵人、新生資產階級，還要處理人民內部的經濟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這就是轉移目標，而且「樹敵太多，最後不利於人民」。他說：「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

45 李新：〈「四清」記·劉少奇講話〉，《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377-378。

46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卷），頁1369。

47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卷），頁1370。

搞出那麼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的，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⁴⁸毛澤東因此斷定劉少奇是形「左」實右：表面上打擊「一大片」，實質上是要保護「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因而認定劉少奇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總後台——在我看來，恐怕就是在這一場1964年底前後的公開論爭之後，毛澤東才下了最後決心，將劉少奇作為主要打擊目標，至此文化大革命也就呼之欲出了。後來毛澤東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他對劉少奇「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⁴⁹1970年他在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也說，他決心「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是在1965年1月發布「二十三條」的時候。⁵⁰所謂「二十三條」就是按照毛澤東意志所通過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其中明確規定，運動的目標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此時毛澤東心目中，劉少奇就是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在毛澤東眼裡，劉少奇正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這就涉及到毛澤東所面對的「國際戰場」，在他看來，這兩者是存在內在聯繫的。

(二)國際戰場：中美關係和中蘇大論戰

討論中蘇論戰之前，先要談談六十年代的中美關係，這是構成文化大革命的國際背景，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也是考察中蘇關係的重要背景。於是，我們注意到1964年毛澤東與《人民日報》記者談話間的一個重要判斷：「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惡的敵人」，當然也是中國的「主要鬥爭對象」。毛澤東還談到中美關係之間的兩大問題，一是「美帝國主義霸占著中國的台灣，把朝鮮南部和越南南部變作它的殖民地」，它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嚴重地威脅著中國；另一是「它還試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

48 參看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卷），頁1369。

49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頁144。

50 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頁173。

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瓦解社會主義陣營」⁵¹——這是我們考察文革前中美關係時，必須重視的兩個側面；淡化、忽視任何一面，都會形成遮蔽，並將問題簡單化。

首先，毛澤東所說美國對中國的戰爭威脅，確實存在。有關材料表明，六十年代執政的美國肯尼迪、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 1908-1973, 美國)兩屆政府都認定，在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中，中國是「最好戰」的，「從長期來看，中國是最主要的敵人」。⁵²1962、1963年美國兩屆政府都有過聯合蘇聯以及蔣介石，以遏制中國核實驗的計劃。從1964年開始，美國將越南戰爭迅速升級，當年8月，美國開始轟炸越南北部，並於1965年3月派遣3,500人海軍陸戰隊進駐越南港口，標示著越南戰爭由「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⁵³這就給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直接威脅，使中國有可能處於美國與蘇聯南北夾擊的地位。

面對國際威脅，毛澤東自然要認真對待。但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對此也有清醒的分析，比如對於美國「從長期來看」視中國為主要敵人，毛澤東就說：「帝國主義者是實用主義，『長期』，對他們來說不那麼重要，因為太久了」。⁵⁴因此，當時毛澤東及中國的決策層的實際估計是：「現在還沒有看到帝國主義要想打仗的象徵」，⁵⁵赫魯曉夫也是「欺軟怕硬的。我們硬一點，〔……〕他不見得會怎麼樣」。⁵⁶然而，即便這個冷靜分析是被歷史所證明的，卻沒有減低毛澤東的心理重負，何況真正讓毛澤東不放心的事，是中國發生

51 毛澤東：〈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巴拿馬人民的愛國正義鬥爭〉(1964年1月12日)，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頁510-511；關於「我們的主要鬥爭對象是美國」的論斷則見毛澤東：〈受壓迫的人民自己總是要起來的〉(1963年8月9日)，《毛澤東外交文選》，頁499。

52 陶文釗主編：《中美關係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395。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443。

53 參看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444-451、451-453。

54 毛澤東：〈赫魯曉夫的日子不好過〉(1964年1月17日)，《毛澤東外交文選》，頁513。

55 劉少奇在天津部隊座談會上的講話(1964年7月1日)，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594。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469。

56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下)，頁675-676。

美國所期待的「和平演變」。就如毛澤東在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所說的那樣，他擔心「內外一夾擊，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⁵⁷既是「南北夾擊」，又是「內外夾擊」，在虛虛實實之中，在客觀壓力和主觀意識形態想像裡，毛澤東產生了從未有過的危機感。

但這也同時激發了毛澤東對行動的渴望與衝動，而且他把主要焦點放在國內。於是，就有了國內經濟發展的戰略轉變——把原本被概括為「吃穿用」計劃，也即以改善民生為主體的建設方向，改變為發展國防工業和建設「三線」的戰爭準備計劃、⁵⁸繼續強化富國強兵的發展路線。⁵⁹到1966年3月文革前夕，毛澤東又明確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而這一切都是為了「準備打仗」——「備荒」是準備防止荒年對戰爭的影響，「為人民」也是「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⁶⁰其要應對的，是美、蘇兩大國可能侵犯中國，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徹底消除內部隱患。

作為一個國際戰略家，毛澤東在為中國尋找新的戰略空間，這就是毛澤東在六十年代一再作出的「中間地帶」分析。⁶¹他認為美、蘇兩大國之間的

57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151。

58 所謂「三線」，是把中國從沿海和沿邊到內陸分為三道防線。而所謂三線建設，一方面是把沿海一線易受攻擊的工廠遷移到內陸山西、河南和兩湖西部的二線地區以及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寧夏、青海和甘肅等七省的三線地區，同時在三線地區建立一個完整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並極力改善內陸交通。

59 參看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459-460、478-479。

60 毛澤東：〈備戰備荒為人民〉（196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405。

61 毛澤東的「中間地帶」理論，最早是在1946年8月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美國）的談話中提出的。他強調，美國首先要對付的不是蘇聯，而是在美蘇之間的「廣大的中間地帶」，因此，以中國革命為代表的中間地帶的革命，直接關係美蘇雙方的力量對比、甚至影響美蘇關係的未來走向。毛澤東那時提出「中間地帶」的概念，顯然是在美蘇對立的國際形勢下，確立中國革命的合理性與重要性，這和六十年代再提「中間地帶」以建立新的世界格局，具有不同的背景和意義。見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1946年8月），《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089-1090。參看楊松奎：《「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的中共成功之道》，頁

「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後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⁶²於是，就產生了和兩大中間地帶國家與人民建立廣泛「反美統一戰線」的戰略設想，⁶³而這個設想，已經醞釀了他在七十年代提出的劃分「三個世界」思想。儘管此時的毛澤東還是以美國為主要對手，但他認為，蘇聯採取向美國妥協的立場，已經成為建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的主要阻力，這是他和蘇聯展開論戰的重要原因；他同時認為，只有中國不變修，才能使中國成為世界反美鬥爭和革命的根據地和中心，這也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動因。⁶⁴

中蘇的公開論戰，是從1962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共同的敵人〉這篇社論開始。用1963年1月6日中共黨內通知的話來說，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條路線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不予糾纏」，而是要同他們作針鋒相對的鬥爭，絕不退讓。⁶⁵實際上，這就是要準備和以蘇聯為首的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大多數共產黨作戰了。要發動這樣一場論戰，雖然國內沒有人公開提出反對，但黨內外心存憂慮者還是不少：本來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已經非常緊張了，現在又開闢另一個戰場跟蘇聯對抗，如果因此導致蘇美合作、對付中國，中國就會非常被動，會危及國家安全。毛澤東當然知道兩面作戰是一著險棋，但他卻

516-517。

- 62 毛澤東：〈中間地帶有兩個〉（1963年9月，1964年1月、7月），《毛澤東外交文選》，頁508。
- 63 參看毛澤東：〈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非洲是鬥爭的前線〉、〈反對美國——吳庭艷政府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殺越南南方人民的聲明〉、〈中法之間有共同點〉、〈從歷史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我們希望阿拉伯國家團結起來〉等文，皆收錄於《毛澤東外交文選》。
- 64 據斯諾《漫長的革命》一書透露，毛澤東在1970年會見他時，曾說到他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劉少奇提出恢復中蘇同盟，以抗衡美國在越南的威脅。轉引自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350。
- 65 中共中央黨內通知（1963年1月6日）。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345-346。

偏向「虎山行」，他對蘇聯大使說：「第一，天不會塌下來；第二，山上草木照樣長；第三，女人照樣生孩子；第四，河裡的魚照樣游，不信，你到河邊去看看」，⁶⁶這話也是說給國內、黨內的懷疑者聽的。當然，這也基於他的一個判斷：鬥爭可以控制在意識形態範圍，不會引發全面的軍事對抗；但即使發生戰爭，毛澤東也不怕。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連續發表九篇評論文章，時稱「九評」，把中蘇論戰推向高潮。這裡唸一下「九評」的題目：〈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關於斯大林問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個路線〉、〈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分裂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從這些題目可以看出，論爭幾乎涉及到國際和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所有重大問題，是一次全面的論戰。

毛澤東在這場論戰中，是充滿自信的，他深信真理在自己這一邊，因此，他不僅發表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文章，而且把蘇聯方面批評中國的文章也登在報上，他不害怕中國人民接觸「反面教材」。他這樣做，也就在客觀上擴大了我們這一代的視野，讓我們知道全世界還有那麼多不同的聲音。但當時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絕大部分人，還是擁護毛澤東、站在中共這一邊，因此對「九評」的文章佩服得五體投地、如痴如迷。記得當時總是在前一天晚上通知隔天有重要文章發表，於是大家就在早上七點半守在收音機旁，或者在公共場合的大喇叭下，聽中央廣播電台播音員夏青(1927-2004)和齊越(1922-1993)(他們兩人的名字當時是家喻戶曉)，用他們特別有磁性的男中音朗讀評論文章；他們讀得聲情並茂，我們則完全被文章的邏輯力量和語言魅力所征服。聽「九評」文章，成了我們當時政治生活中的第一等大事，深刻地影響我們，成為這一代人的難忘記憶。

為了使同學們有一點具體感受，我現在就模仿當年廣播員的聲調，朗讀論戰文章的一些片段。這是七評〈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中的一段：

66 見毛澤東：〈赫魯曉夫日子不好過〉(1964年1月17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頁359。

我們還要問蘇共領導，你們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蘇聯政府聲明中曾經說，如果中國人繼續論戰，「那麼，他們應當非常清楚，他們在這條道路上將遭到蘇共和全體蘇聯人民的最堅決的回擊」。蘇共領導說這樣的大話，不是明目張膽的恫赫和威脅嗎？難道你們真的相信，只要你們命令一下，別人就會俯首貼耳，只要你們大喝一聲，別人就會渾身發抖嗎？老實說，從九月二十一日起，我們一直在等待著，很想領教一下，究竟是什麼樣的「最堅決的回擊」。

同志們，朋友們，你們錯了，完完全全的錯了。

公開論戰既已經開始，就得按規矩進行。如果你們認為，你們已經說得夠了，那末，你們應當也給對方足夠的答辯機會。如果你們認為，你們還有很多話要說，那就請吧，請說個夠吧。但是，同樣的，你們說夠了以後，仍然應當讓對方也說夠。一句話，應當機會均等嘛。你們不是也說兄弟黨是平等的嗎？為什麼你們要什麼時候攻擊兄弟黨，就發動公開論戰，你們要什麼時候停止論戰，就剝奪被攻擊的兄弟黨公開答辯的權利呢？⁶⁷

這裡還有跟義大利共產黨的論戰〈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和我們的分歧〉一文裡的一段文字：

一種很有趣味的現象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普遍地出現了。什麼現象呢？就是那些自稱手裡握有全部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的英雄好漢們，卻十分害怕他們所使勁地斥責的所謂「教條主義者」、「宗派主義者」、「分裂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為了答辯他們的攻擊所寫的文章。他們不敢在他們報紙、刊物上發表這些文章。他們膽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對我們答辯的文章，不敢讓自己國內的人民同它們見面，嚴密封鎖，水泄不通。甚至用強大的電台干擾，不使人民聽到我們的廣播。可愛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先生們，朋友們，同志們，你們既然肯定我們的文章是錯誤的，何不將這些錯誤文章通通發表出來，然後逐條給予批駁，以便在你們自己國內的人們中間能夠引起痛恨，痛恨那些

67 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4年2月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被你們稱之為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邪魔外道呢？你們為什麼不敢這樣做呢？為什麼要封鎖得鐵桶一般呢？你們怕鬼。一個「教條主義」亦即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巨大幽靈在全世界徘徊著，這個幽靈威脅著你們。你們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們，你們脫離群眾，所以你們害怕真理，害怕的情況達到那樣可笑的程度。先生們，朋友們，同志們，好樣的，站出來，在全國全世界人民面前公開辯論，雙方互登對方一切批評自己的文章。我們希望你們學習我們的榜樣，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敢於全部全文地登載你們的東西。在登載你們一切痛罵我們的「偉大」作品以後，然後逐條地或者扼要地駁斥你們，當作我們的回答。有時我們只登載你們的錯誤文章，我們一個字也不作回答，讓讀者們自己去思考。這難道還不算公平合理嗎？現代修正主義的老爺們，你們敢不敢這樣做呢？好樣的，就敢。心虧理怯，色厲內荏，表面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膽小如鼠，那你們就不敢。我們斷定你們是不敢的。是不是這樣的呢？請回答吧。⁶⁸

還有一段：

只許老爺開腔，不許小的吭聲，是不行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是不行的。從古以來也沒有這樣一條被公眾承認的不公平法律。何況，我們共產黨人之間的分歧，只能採取擺事實說道理的態度，而斷斷不能採取奴隸主對待奴隸的態度。⁶⁹

看來，今天大家聽起來，也覺得很興奮，那麼就可以想見我們當年聽了這樣的文章，心裡有什麼反應了。這是典型的毛澤東語言；而且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透露，這兩段文字就是毛澤東在審稿時親自動筆加上去的。⁷⁰記得我在第一回講課的〈導言〉中，就提到毛澤東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方式，而且影

68 毛澤東：〈對《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稿的批語和修改〉（1963年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250-251。

69 毛澤東：〈對《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稿的批語和修改〉（1963年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248-249。

70 毛澤東：〈對《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稿的批語和修改〉（1963年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247。經過毛澤東修改過的〈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載《紅旗》1963年第3、4期（1963年3月4日出版）。

響了大陸中國人的語言方式，形成了「毛文體」。在某種意義上，「九評」就是「毛文體」的一個樣本，我們正好藉此來了解、討論「毛文體」——這是毛澤東文化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我們剛才朗讀的直觀感覺，毛澤東的語言是一種有魅力、威攝力、征服力的語言。如果再作冷靜的分析，就可以發現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文章一開頭，就把自己放上馬克思主義的代表、真理的代表、人民的代表的位置，一下子就把對方可能有的優勢剝奪乾淨，拿到自己手裡。這就是中國傳統講的「取勢」，一旦占據「高勢」，也就不講道理，論敵就矮了三分、膽怯了三分，處於守勢了。

然後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用和高勢相適應的、鏗鏘有力的語言，用大量的排比、反問句，以取排山倒海之勢。本來對方已經站在低處，再用這樣氣勢磅礴的華麗語言，奔流直瀉下來，就將論敵淹沒在滔滔語言的海洋裡，毫無招架之力。

然後再加一點調侃，使對方處於很可笑的地步，最後再拿出點流氓腔：「好樣的，站出來！」這是中國傳統的激將法，但對手已經處於劣勢，被滔滔語言搞的暈頭轉向，怎麼敢站出來？但越不站出來，就越顯得無理與無力——這時候，實際論戰並沒有開始，對方已經輸了，至少在讀者、聽眾的心理上已經有了「高下之分」。

這就說到毛澤東語言對讀者、聽眾情感的煽動力和心理控制力。面對這種半是正義在身、半是威脅的語言攻勢，讀者、聽眾已經不大可能獨立思考，來不及作出誰對、誰不對的判斷，或者只能在作者劃定的範圍內來思考，最後，讀者就跟著文章的邏輯一路走下去，被文章的氣勢壓倒、征服了。這既是語言戰，更是心理戰，聽眾最後只能跟著走，幾乎沒有第二種選擇，而且聽者自己心裡還覺得很痛快、舒服。這是語言的魅力和魔力，其力量在於此，可怕也在於此。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這些文章裡仍然包含了若干合理因素，並非完全不講道理。比如大談「奴隸」、「州官放火，百姓點燈」，就抓住了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具有捍衛民族獨立的合理性。特別是像我這樣的年輕人，當時對於西方和東方世界對中國的封鎖，心裡憋著一股氣，當我讀到、聽到這種「奴隸要反抗奴隸主」的文字，是會產生揚眉吐氣之感。即使今天回過頭來看，這

些話也有局部的合理性。問題正在這裡：如果這些文章完全是胡說八道，自然不會對人有征服力；但它有某些合理的內核，再用極度誇張的語言加以強化，就具有某種震撼力和征服力了。

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作者在主觀上是真誠的。當時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都確信自己是「真理的代表」、「人民的代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代表」，所以才這樣理直氣壯，其實這是自欺欺人——這是具有某種真誠性，但實質上又是欺騙性的語言遊戲。

所以，「毛語言」、「毛文體」，都是非常複雜的語言現象、社會現象、心理現象，值得認真研究。作為歷史的當事人，回顧我們當年對毛文體樣本「九評」文字的迷戀，我感到最為驚駭的，是其語言對自己的情感煽動力和心理控制力，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種語言專政，只是我們完全不自覺。

在作了以上語言形式上的討論以後，我們還要具體討論「九評」裡所提出的思想，及其對國際和國內的影響。這裡不打算詳細介紹蘇共和中共論戰雙方的具體觀點，同學們自己去讀，如果你把雙方論戰文章放在一起讀，會更有意思。我只能概括地說三點。

中共方面，首先是堅持戰爭不可避免，堅持即使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要通過暴力革命來奪取政權，而議會鬥爭只能作為補充。這顯然脫離北美、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所以基本上被歐美各國共產黨所拒絕。但是它內含的造反精神、反抗精神，卻對西方國家的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有所影響，後來歐洲六八學生造反運動⁷¹顯然跟這次論戰有關。

中共論戰中的觀點，最有吸引力、影響力的，是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也即今天說的「第三世界」革命的支持及其一系列論述，例如強調武裝鬥

71 一位同情中國的法國記者卡羅爾(K.S. Karol)在中蘇論戰中訪問了中國，並寫有一本《毛澤東的中國——另一個共產主義國家》(*La Chine De Mao: L'autre Communisme*)，出版後在西方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書的結尾，他談到了對中蘇論戰中的中國立場的看法，他認為，「中共立場最大缺點在於無法向全世界講清楚毛澤東主義政策的主導路線是什麼，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於固執地從表面上維持斯大林的神話」，「中國的矛盾在於，一方面它自身就是對斯大林活生生的否定，而另一方面卻又拒不承認這一點，而且給人一種印象，似乎它希望工人運動回到昔日的『美好時光』中去」。見[法]卡羅爾著，劉立仁、賀季生譯：《毛澤東的中國》(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407。

爭，堅持農村包圍城市道路，以農村作為根據地等等。在其鼓動下，第三世界紛紛出現「毛派」，即國際上的毛澤東主義者，而在西方也有許多毛派。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思想正是通過中蘇論戰走向全世界。但事實上，各國的毛派最後都放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鬥爭的道路，這同樣說明毛澤東激進主義的革命道路也脫離了第三世界的實際狀況與世界發展潮流，並帶來了嚴重後果。這些是不能回避的。

這裡，特別需要特別提到論戰告一段落之後，1965年林彪的一篇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⁷²這其實是代表毛澤東，對整個國際形勢作了一個新的分析，提出從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⁷³這是後來毛澤東「第三世界」理論最早的一個說法，可以說是按照毛澤東戰略意圖，勾勒出一個「世界革命」的藍圖，即把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國內革命模式，推廣為一個「由亞非拉第三世界來包圍北美西歐國家」的國際革命模式，強調整個的世界革命事業，終究要以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作為轉移，從而把亞非拉國家反抗運動置於世界革命的中心位置，並且提出社會主義國家理所當然要把支持亞非拉人民革命鬥爭當作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當時，中國也確實用很大的力量支持第三世界武裝反抗。

文章的小結相當值得注意：「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理論，不但是中國革命的產物，而且帶有時代特徵」，⁷⁴這實際上是主張用毛澤東的人民革命戰爭理論指導世界革命。其背後顯然有兩個意圖，一是要和蘇聯爭奪對國際共產運動以及世界革命的領導權，特別是針對第三世界領導權；另一是要輸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經驗，把中國作為世界革命的根據地和中心，這可以說是中國傳統裡中華中心主義的革命版。這反映了之後我們還要討論的毛澤東「世界革命導師」情結。

72 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週年〉（1965年9月3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頁445-497。

73 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週年〉（1965年9月3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頁479。

74 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週年〉（1965年9月3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頁482。

其實，「九評」真正關注之處與它所產生的主要影響範圍還是在國內。它是要藉總結所謂蘇聯和南斯拉夫「變修」的經驗，來討論中國怎樣防止修正主義、為文化大革命作理論準備和輿論動員。特別是「九評」最後一篇〈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總結了毛澤東一系列關於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這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雛形。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兩點。首先是提出「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概念，並作了如下分析和判斷：所謂「資產階級特權階層」是「由黨政機關和企業、農莊的領導幹部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構成」，「蘇聯人民同他們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階級矛盾」，「這個特權階層，是目前蘇聯資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主要社會基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⁷⁵據說，在文章起草過程中，曾經反覆考慮過「特權階層」概念：「曾經想用『高薪階層』一詞，經過斟酌覺得不妥，高薪的標準是什麼，怎麼樣才算高薪，很難說清楚，巴黎公社的原則〔錢註：指低薪原則〕在十月革命初期曾實行過，但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就必然要拉開距離；再說講『高薪階層』又要涉及斯大林，不過斯大林對一部分人實行高薪制度，並未形成一個階層。還曾經想用『官僚資產階級』的提法，又考慮蘇聯當時仍保持著公有制，並未實行私有化，不能說已經形成一個『官僚資產階級』。因此決定用『特權階層』的提法，為表明其階級性，前邊再加上『資產階級』，叫做『資產階級特權階層』」⁷⁶——這裡所討論的，看起來都是蘇聯的問題，但任何人都會聯想到中國；後來在文革中，紅衛兵造反派就這樣提出問題：中國有沒有「九評」中所說的「特權階層」？如我們在前面所討論，毛澤東在1965年自己就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這裡所定義的特權階層的兩大構成——「領導幹部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事實上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兩大對象。

75 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1964年7月1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76 見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頁243。

其次，「九評」裡提出的「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問題，更是直接相關文革的發動。文章引人注目地提出這樣的論斷：「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順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⁷⁷ 這段話提出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的下一代，以至第二、第三、第四代，會不會出現修正主義？二是中國領導層會不會出現赫魯曉夫？兩個問題的中心，就是中國會不會發生「和平演變」，這正是毛澤東和他那一代革命家者的一塊心病。

問題的提出，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早在1957年美國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 美國)政府就提出「和平取勝戰略」，鼓吹要通過「和平演變」，以促進「蘇聯世界內部的變化」。1958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 美國)在公開談話裡，又宣稱「共產主義的統治正在產生一個在工業上和科學上現代化的強大的國家。如果自由世界對國際共產主義進行有效的抵抗，中蘇統治者多關心自己人民的福利，少關心為了擴張主義的目的而剝削人民的日子就會更快地到來。在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們的關係就會幸運地為一向存在於俄國和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之間的自然的誠摯而友好的精神所支配」。杜勒斯預言「隨著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必然發生『和平演變』」，顯然給毛澤東很大的刺激，他立即將杜勒斯的講話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印發，⁷⁸ 並在一次談話中特意指出：「杜勒斯比較有章程，是美國掌舵的。這個人是個想問題的人，要看他的講話，一個字一個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⁷⁹ 1959年毛澤東又專門讓人印了杜勒斯關於和平演變

77 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1964年7月14日)。

78 毛澤東：〈為印發杜勒斯演說重擬的標題、提要 and 批語〉(1958年11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頁606。杜勒斯演說內容見頁606-607註釋(1)。同時參看毛澤東〈為印發杜勒斯批評我國人民公社言論重擬的標題(提要) and 批語〉(1958年11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頁605。

79 毛澤東對各協作區主任的談話(1958年11月30日)。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

的三篇講話，並且說：「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⁸⁰在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當總參謀長談到杜勒斯認為歐洲共產黨「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時，毛澤東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⁸¹可以說，到1962年時，毛澤東就在考慮防止兒子和孫子這一代，也就是第二代和第三、四代出修正主義的問題。

同時，毛澤東也提出來要防止「赫魯曉夫那樣的陰謀家和野心家」、防止他們篡奪各級領導權。我以前說過，毛澤東老是被蔣介石、王明、高崗纏繞著，現在又多了兩個人，一個是美國人杜勒斯，一個是蘇聯人赫魯曉夫；他們把毛澤東弄得寢食難安。毛澤東認為，可能導致和平演變的兩大危險，與長遠來說的「第二、第三、四代(兒子和孫子)接班人」問題，以及眼前的「赫魯曉夫式的陰謀家篡奪領導權」問題相關，這也就成為毛澤東所要處理的兩大問題，更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因。

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發布了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講話，他提出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具體內容我就不講了，同學們可以去看已經收入《課用選文》的原文。⁸²我要強調的是，對毛澤東而言，成為接班人條件的核心，是要能夠「保證我們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即要永遠保持黨和國家的「革命性」，這樣才能要把毛澤東這一代所創立的「紅色江山」世世代代保持下去，用今天領導人的話來說，就是要「永遠保持黨的執政地位」——這才是毛澤東的深謀遠慮所在。

而且毛澤東的接班人教育與相關的長遠部署都是有效的。就在毛澤東提

件的回顧》(下卷)，頁1140。

80 逢先知：〈回顧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2。
參看林克：〈回憶毛澤東對杜勒斯和平演變言論的評論〉，載《黨的文獻》1990年6期。轉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頁27-28。

81 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5日)。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下卷)，頁1245-1246。

82 參看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頁85-88。

出接班人問題的五個月後，即1964年11月6日，一位清華大學學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作出了這樣的回應：「我深深感到我們青年一代肩上擔子的重大」、「我們絕不能把先輩們流血犧牲得來的革命果實從我們手中丟掉。我要更好地聽黨的話，努力學習，走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走革命化的道路，走勞動化的道路，絕不辜負革命先烈的期望」。⁸³應該說，他的回應具有代表性，後來這位青年胡錦濤，成了中共第四代領導人；雖然就個人而言是有種種偶然因素，但中共之後由一個抱持「絕不能把先輩們流血犧牲得來的革命果實從我們手中丟掉」的志向者接班，卻不能不說是毛澤東深謀遠慮、長遠部署的結果。今天，毛澤東的兒子輩、孫子輩執政了，他們的執政基本方針，就是40多年前毛澤東所定下的「保證黨和國家永不變色」也即「永遠保持黨的執政地位」的底線。把握這一點，是理解當今中國許多問題的關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實際上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今天的中國、今天中國的接班人。我們還沒有走出毛澤東時代。

我在這裡還要指出一點。當毛澤東「揮斥方遒」⁸⁴地指揮一切、「向全世界作戰」的時候，在他深謀遠慮地籌劃中國未來接班人的時候，他的內心其實是寂寞的。他完全明白，高聲擁護者多多，真正理解、支持者寥寥，正所謂「高處不勝寒」。1965年8月，毛澤東在接見法國國務部長馬爾羅(Andre Malraux, 1901-1976, 法國)時，就一再說到「我是孤立的」。⁸⁵毛澤東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在1965年採訪毛澤東之後，也留下了這樣的記憶：斯諾問他，「你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環境。很多人發生疑問，在比較安逸的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將做出些什麼來？」毛澤東回答說：「將來的事情要由將來的後代去決定，而且按照我們不能預見的條件去決定」。「毛的聲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了眼睛。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的處境變得越來越快

83 胡錦濤：〈生動的一課——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座談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人民日報》(1964年11月6日)，轉引自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頁494。

84 這裡是借用毛澤東早年詩詞〈沁園春·長沙〉裡的詩句。見毛澤東：〈沁園春·長沙〉(1925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頁6。

85 見安東尼·馬爾羅：《回憶錄》，轉引自迪克·威爾遜(Dick Wilson)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譯組編譯：《歷史巨人——毛澤東》，頁428-429。

了。他說，從現在起一千年以後，所有我們這些人，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在內，大概會顯得相當可笑吧」。⁸⁶此時的毛澤東正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再對「中國的環境」施加影響，但他同時想到的卻是人類和自己「這些人」，在永恆的宇宙、歷史時空中的有限、渺小和可笑。⁸⁷1966年她給女兒李納(1940-)題詞，特地寫了一句：「在命運的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⁸⁸——這裡所展現的，是那個雄心勃勃，準備和自己國內外、黨內外敵人發動總攻勢的毛澤東，其內心世界不易被察覺的一面。

於是，我注意到1961年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曾特地抄錄了魯迅的詩送給外國朋友：「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⁸⁹在我看來，這或許也是可以用來表達1964、1965年間，所謂「決戰前夕」，毛澤東的心情和心理狀態的某一側面——他渴望文化大革命的「驚雷」，卻感到身在高層的孤獨，而他對黨和其高層同事已經完全失去信任。他在「於無聲處聽驚雷」時，或許是在期待底層對他某種程度的響應，而他下一步要做的，正是如何把底層發動起來，再度引動驚天之雷。

同時，他又把希望寄託於軍隊的支持。毛澤東在1963年發出「學習解放軍」的號召、親自為部隊寫贊歌〈八連頌〉、宣揚被譽為「毛主席的好戰士」的雷鋒，都大有深意，⁹⁰他顯然認為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比之已經官僚化、日見腐敗、並被他的對手所控制的黨，更具有「拒腐蝕，永不沾」的道德純潔

86 轉引自陳晉：《毛澤東之魂》，頁108-109。

87 人們還注意到，在1964年，毛澤東多次談到：「世界在時間上、空間上都是無限的」(8月，接見北京科學討論會的各國代表團團長的談話)；距離「下一次冰河期的到來時間」，「人類還有一百年的時間好過」(5月，接見印尼外賓時的講話)；「動物發展至少經過一百萬年，才生出人的頭和手，將來還要發展。我就不相信只有人有兩隻手。馬，牛，羊就不進化了？我看還要變」(8月，和哲學家的談話)。轉引自陳晉：《毛澤東之魂》，頁86。

88 轉引自迪克·威爾遜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譯組編譯：《歷史巨人——毛澤東》，頁435。

89 毛澤東：〈同日中友協代表團等日本朋友的談話〉(1961年10月7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584-585。

90 毛澤東：〈關於工業部門學解放軍的信〉(1963年12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454-456；毛澤東：〈雜言詩·八連頌〉(1963年8月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332；毛澤東：〈為學習雷鋒題詞〉(1963年3月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頁259。

性，以及「不怕壓，不怕迫」、「不怕帝，不怕賊」的革命性，應該成為推行其路線的主要依靠對象。此時的解放軍也在林彪主持下，大力宣傳毛澤東個人和毛澤東思想，於1964年5月出版了之後在文革中風靡全國以至全世界的「紅小書」《毛主席語錄》，刻意製造新的個人崇拜；這種彼此呼應自是意味深長，都是在為下一階段的文革大風暴作準備。

這樣，我們對這段歷史的敘述，又要從高層轉向底層，重點是中國的校園的動向，因為下一次風暴的起源地就在那裡。

二、中國校園的地下新思潮

在講中國校園地下新思潮之前，我要和大家繼續討論林昭的思考。在第八講裡，我們談到了林昭和她的西北戰友在《星火》上發出的「要民主社會主義，不要國家社會主義」的歷史呼喚，但很快就遭到了殘酷的鎮壓。在戰友被捕以後，林昭仍孤身一人堅持思考，並繼續尋找戰友、探討「中國改革方案」。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他們的八項主張：第一，國家應實行地方自治聯邦制；第二，國家應實行總統負責制；第三，國家應實行軍隊國家化；第四，國家政治生活實行民主化；第五，國家實行耕者有其田制度（錢註：這實際上表達的是農民包產到戶的要求，而「耕者有其田」正是當年孫中山的主張，這都顯示了孫中山對大陸民間思想者的影響——前面提到的農民思想家楊偉名「節制資本」的主張也來自孫中山）；第六，國家應該允許私人開業，個體經營工商業；第七，國家應當對負有民憤者實行懲制（錢註：這是對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政治運動所造成的無數冤案的一個反應）；第八，應當爭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國家的援助（錢註：「一切友好國家」，大概是包括美國在內的，這裡實際上就已提出了要向美國和西方世界開放大門的要求）⁹¹——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民間憂國憂民之士，在中國最困難的時期，對「中國向何處去」問題（這個問題以後會不斷地提出）進行的思考與回答，實際上是為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國未來發展，提供了另一條道路、另一種可能性。然而他們所提出的

91 引自黃政：〈林昭第二次被捕前後的一段往事〉，文收許覺民編：《走近林昭》（香港：明報出版社，2006），頁122。

新治國路線和目標，卻挑戰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治國路線」，遭到了無情的鎮壓。但他們所提出的主張，卻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或者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得到實現（例如開放中國大門、實行耕者有其田、允許私人開業等），或者依然是人們的奮鬥目標（如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等），有的則成了人們思考中國國家建制問題的一個思想資源（如主張實行地方自治聯邦制），只是時間已過了40餘年。

作為一個先驅者，林昭的思慮是更為深遠的。她在獄外、獄中都寫下了大量文字，但至今還封存在有關部門的檔案裡，我們得到最為完整的文本，除了一些詩篇外，主要是1965年她的〈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集中了她在這一段時期大致的思考。主要有兩個方面。

首先，她對現行體制提出批判。她提出了「極權社會」的概念，並且具體分析了其特徵。其一，這是一個「極權統治的警察國家」：「首先以秘密特務系統監視、控制，從而統治全黨。然後進一步『以黨治國』，而將這個特務化的黨來監視、控制，從而統治全國」。⁹²其二，極權體制是「以血和仇恨來維持統治權力的」。其三，這是一個建立在「個人迷信、偶像崇拜」基礎上的「極權寡頭」的統治，一方面完全「不尊重客觀存在」、「以主觀期望代替客觀世界」的主觀意志決定論，一方面是「極端妄悖的唯我獨尊」、「『欲與天公試比高』的精神狀態」、「一貫地不尊重客觀，不把人當人」，因而也沒有「任何的人情與人性的存在」。其四，要維護這樣的極權體制，必然要實行「愚民政策」，培育「奴性」，實行精神欺騙與控制。這就是極權體制下，極為發達的另一套組織機構，即宣傳、輿論部門，其受重視的程度及重要性，是歷史空前的，中國的黨報就是「整套特務恐怖統治機構的組成部分」、「御用的情況中心」。其五，也是林昭最感痛心的，是極權體制對年青人的欺騙和利用，「用所謂『國家』、『社會』、『人民』等諸般崇高概念」，「迷惑」青年，「鼓舞」他們「慷慨無私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地將自己最珍貴的青春歲月擲出」。

林昭另一方面的思考，也許是更值得重視的：她提出了兩個關係國家和反抗運動發展方向的問題。

她首先問：「中國人的血歷來已經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面臨著二

92 林昭：〈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手抄複印本。以下引文皆出於本文。

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世界風雲局面，即使中國這麼一片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較為文明的形式去進行而不必定要訴諸流血呢？」——她這裡提出的問題是，在解決中國和世界問題時，能不能避免「以暴易暴」的歷史惡性循環？其現實所指，首先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思維：在毛澤東正準備以理想主義的名義，將中國引入新一輪血的殘殺的關鍵時刻，林昭的預警，其及時與無效，都令我們驚嘆與感慨。其二，這預警同時也指向當時和未來的反抗運動，直到今天，我們也依然為如何走出以暴易暴循環而感到困惑。如果我們再考慮到林昭是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以一己柔弱之軀進行反抗的情況下，提出反對「以暴易暴」的命題，我們能不為之感動而扼腕長嘆嗎？

林昭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反抗運動的反抗目的是什麼？也同樣關鍵而且發人深思：「身受暴政奴役切膚之痛再也不願作奴隸的我們，是不是還要無視如此悲慘的教訓，而把自己的鬥爭目的貶低到只是企望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呢？」——林昭在這裡質疑的，正是毛澤東的「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使被壓迫者成為新的壓迫者，對昔日壓迫者實行專政，使其成為被壓迫者的革命觀。這種革命觀，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他發動每一個政治運動背後的指導思想。以後我們還會討論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之一，就是要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而許多造反派掌權之後，都紛紛成為新的奴隸主，即「文革新貴」。因此，林昭在1965年文革前夕提出這一問題，同樣具有預警的意義。

最為可貴的是，林昭提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反抗目的。她的理論基礎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隔的整體自由觀」：「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不僅「被奴役者不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由此而確立的是一個全新的目標：反抗的目的不是為了做官、使自己取而代之、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而是為了「給一切人以自由」，不僅使被奴役者從不自由狀態下解放出來，而且也使奴役者從另一種形態的不自由狀態下解放出來，而自身在「不奴役他人」的狀態下，也就獲得了真正的自由——這就最終結束了一切人壓迫人、人奴役人的現象，正是林昭和一切真正的反抗者、革命者的理想。這樣的理想顯然具有某種烏托邦色彩，但林昭和她的戰友，也就最終走出了毛澤東自己都不能避免的「革命者成為新的壓迫

者，自己也成為另一種形態的不自由者」的歷史怪圈。在這個意義上，林昭與毛澤東的思想對抗中，林昭是最後的勝利者。毛澤東時代孕育、出現了林昭，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耐人尋味。

我們暫時和林昭告別，進入1957年至1966年這十年間的中國校園。

我們首先注意到，經過反右的清洗，校園裡一片沉寂。一位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寫了這樣一首詩：「教授用枯燥的語言／講授著枯燥的課程，每一種空洞的教條／要重複講十幾分鐘。〔……〕最有邏輯的頭腦／也會被折磨得發瘋！」⁹³這是很有代表性的：反右以後學校和社會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將年輕一代打造成黨和毛澤東馴服工具，剝奪學生一切精神獨立與自由，但同時又提倡、製造虛幻的精神狂熱，因此校園裡到處充斥著空洞的豪言壯語。

但同時也必然出現反叛者。首先出現的，是反叛的藝術青年：一批革命藝術家的後代，其中有的還只是中學生，他們半遊戲性地宣布成立「太陽縱隊」。他們通過不同途徑，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現代派詩歌與藝術的影響，認定詩人、畫家是「天生的革命者，天生的叛徒」。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反抗現實政治的意圖，反對官僚、要求自由，只是出於藝術家的天性；但他們又生活在「藝術即政治」的時代，於是，因為要求藝術自由，就成了國家專政部門關注、監視，以至追捕的對象。⁹⁴

大學的反叛者出自未來的哲學家。今天人們經常提到北大哲學系的「X社」，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核心人物郭世英(1942-1968)。他是郭沫若的兒子，但郭世英卻如此向別人介紹他的父親：「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⁹⁵他是深知其父的：但他也有自己的痛苦與問題：父親在五四時期，那麼自由地寫詩，為什麼我今天沒有這樣的表達自由？取名為「X社」，就是表示一種困惑：X是未知數，X又是十字架、十字路口。一是懷疑，對無數未知的、弄不清楚的問題的懷疑和探索；一是徬徨，站在十字路口，背著十字架，不知往何處去。這大概反映了六十年代校園裡，尚未失去思考欲望和能

93 周國平：《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頁81-82。

94 參看張朗朗：〈「太陽縱隊」傳說及其他〉，廖亦武：《沉淪的聖殿》（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頁30。

95 郭世英對牟敦白語，見牟敦白：〈X詩社與郭世英之死〉，廖亦武：《沉淪的聖殿》，頁22。

力的大學生的共同時代苦悶。⁹⁶後來他們被抓起來，罪名是三大條，一是「要求精神開放」，二是「要求自由」，三是「追求絕對真理」。⁹⁷「精神」、「自由」與「真理」都成了罪惡，這很能說明六十年代大學校園對年輕一代的思想控制。據說這件事引起高層震怒，毛澤東還有個批示：「幹部子弟鬧也得不太不像話了，要整頓」。大概是把郭世英視為高幹子弟中的反叛代表——這種來自內部，而且是兒子、孫子輩的反叛，自然會引起高度警惕。「X社」成了幹部子弟變質的典型，據說毛澤東提出革命接班人問題也與此有關。⁹⁸

讓黨的高層和毛澤東感到不安的，還有校園裡出現了「反動學生」。事情還是由中蘇論戰引起的。我在前面說過，對「九評」文章，絕大部分像我這樣的年輕人都是如痴如迷、衷心擁護的，但也還是有一些比較清醒的大學生，對中蘇論戰有不同的看法。郭世英就說：「說蘇聯那些幹部有自己的別墅，我們家就有啊，憑什麼說蘇聯是修正主義，而我們中國就不是修正主義呢？」有一位北京地質學院的應屆畢業生，就向中央廣播電台寫信提出不同意見，這就震動了中央。那時，北京的大學生畢業時，黨中央一些領導人會前來接見講話，1963年周恩來作演講時就說：有的學生反對我們黨的反修鬥爭，你有什麼理由可以站起來講嗎？那位學生（據說是個山東莽漢）還真的站了起來，但不等他開口，就被當場抓了起來。事情報告上去，毛澤東立即批示，認為這類學生是大學裡的極右分子、是階級鬥爭在學生中的表現，而且「所在多有，應該清理」。⁹⁹由此，在1963-1965年間，中共在全國高校，特別是在應屆畢業生當中，開展了一個清理「反動學生」的運動。被劃為反動學生的人都被送去勞動教養，其罪名主要有三：一是反對反修鬥爭，二是反對大躍進、人民公社，三是同情「右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¹⁰⁰其實，這些學生

96 參看牟敦白：〈X詩社與郭世英之死〉，廖亦武：《沉淪的聖殿》，頁28-29；亦可參看周國平：《歲月與性情》。

97 《幹部子弟蛻化變質九例》（1963年公安部文件）。參看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頁411。

98 宋永毅：〈訪X詩社張鶴慈〉，原載《民主中國》2003年7月號，見地方文革史交流網：<http://difangwenge.org/read.php?tid=6246>。

99 王學泰：〈鮮為人知的「反動學生」案〉，《多夢樓隨筆》（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參看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頁420。

100 王學泰：〈鮮為人知的「反動學生」案〉，《多夢樓隨筆》。參看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

就是1957年「右派」精神的繼承者，儘管他們遠沒有當年反抗的自覺、只是在主流意識形態框架內進行有限的獨立思考，但在我們說的「五七體制」的高壓下，保留這樣一點精神火種已經很不容易。六十年代中期的「反動學生」，正是「1957年右派」與「文革中民間思想者」之間的一個中間環節，其意義不可低估。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中蘇論戰中，大學校園裡開始出現一代新人，他們在當時也被視為「反動學生」，我稱之為「毛澤東主義者」。我曾作過一個個案研究，這是一位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應該是我的學弟，名叫陳一諮(1940-)，無論在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村落，還是八十年代中國改革中，他都是一個重要人物，在本書後面相關部分中都會提到他。這裡主要討論他在六十年代文革前的思想起步。

據陳一諮的自我介紹，1957年他還在讀中學，卻是反右運動的積極分子，因此很早就入了黨。他的思想發生變化，是1962、1963年中蘇論戰期間，也可以說是「九評」喚醒了他。他思考的起點，是「蘇聯變修的教訓」以及「中國會不會變成修正主義」，那麼，他在起點上就受到了毛澤東的影響，從一開始，他的思考就納入到了毛澤東的思想命題裡。他因此而完全認同於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保證，必須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階級鬥爭觀和「不斷革命論」，並由此決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發展方向：他立即由物理系轉入中文系，主動告別以建設祖國為使命的科學夢，而以推動不斷革命為己任，從此走上了政治家的不歸路。¹⁰¹

不同於其他毛澤東的口頭擁護派，陳一諮對毛澤東思想，以及如何學習毛澤東有自己的看法。他反對把毛澤東偶像化、神祕化，認為關鍵是要理解、學習毛澤東的立場，不僅要考慮毛主席說什麼、更要想他為什麼這麼說，不僅要知道他說得對、而且要追問為什麼對。也就是說，陳一諮把毛澤東看成一個革命家、政治家，極力地去理解毛澤東、掌握他的基本立場，而不是他的具體觀點；這樣，他自己就能夠站在毛澤東的基本立場上思考、處

年學」研究筆記》，頁420。

101 陳一諮：〈革命何罪？——給首都工人、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第一封信〉（1968年10月）、〈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和陸平黑幫作不調和的鬥爭〉（1966年8月），複寫手稿。

理問題，成為毛澤東那樣的革命家、政治家。陳一諮還明確地提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結束真理，要繼續發展。¹⁰² 這樣，他從一開始就是以自覺學習毛澤東思想、發展毛澤東思想為使命。這就使他和當時與之後的毛澤東盲目崇拜者區別開來——陳一諮真正地把毛澤東思想當作自己的信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把他和六十、七十年代出現的同類「新人」命名為「毛澤東主義者」。

陳一諮是按照他對革命家、政治家毛澤東的理解和想像，來作自我設計的。他提出要做這樣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第一，要思考「大問題」，思考整個中國和世界發展的「方向問題」；第二，要關注「理論問題」；第三，「不僅看今天，而且看明天，看上幾十年，以至幾百年」；第四，要「立志改革，立志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第五，要「懂得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並「始終生活在社會鬥爭和人民群眾之中」，「研究當代革命鬥爭問題」，做一個「有政治頭腦的實際家」。¹⁰³——應該說，陳一諮相當敏銳、準確地抓住了革命家、政治家毛澤東的正面特點，而且他的這些自我設計，也是從根本上接近毛澤東對年輕一代的期待，更依稀閃現著「青年毛澤東」的身影。

更為重要的是，陳一諮作為一個基層校園裡的大學生，卻自覺地努力用毛澤東的思維和眼光去觀察當時中國社會，思考中國和世界的問題，並得出了和同時期處在高層的毛澤東比較接近的一些結論。

結論主要有四。其一，重提「社會主義民主」問題，而重點又在「聽誰的話」的問題。陳一諮從對反右運動的反思開始；陳一諮並不否認反右運動，卻質疑「五七體制」所建立起來的基層黨組織的絕對權威：反右以後「似乎黨的基層領導誰也不能批評了，他們所作的任何一件事情，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是完全正確的。大多數群眾把『聽黨的話』也僅僅理解為完全聽基層黨組織的話，以至某個領導人的話」。這樣的質疑在仍然處於反右運動陰影下的六十年代中國，是一個相當大膽的聲音，也是一次思想解放，卻又是毛澤東所願意、甚至是希望聽到的。因為，此時的毛澤東正深感寂寞，為自己的意志因為各級黨組織（包括基層黨組織）的抵觸和隔絕、不能貫徹到社會底層而

102 陳一諮：〈給黨和政府工作提的一點意見〉（1965年2月），油印稿。

103 陳一諮：〈給黨和政府工作提的一點意見〉（1965年2月），油印稿。

憤怒。他看得很清楚，前述反右邏輯已經成為他所痛恨的黨官僚體制的護身符。而陳一諮在「反對無條件地聽從基層黨組織的話」的同時，所強調的是「先聽主席、中央的話，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話」，¹⁰⁴也就是要建立毛澤東及他所代表的黨中央的絕對權威，這正符合毛澤東的政治需要。

其二，重提毛澤東當年「放」的方針，用群眾民主來保證「江山永不變色」。陳一諮講了兩條理由：一是錯誤的東西不讓它放出來的話，以後「危害更大」。他解釋說，我們現在這一代領導人沒問題，因為他們是革命中成長起來的，第二代大概也不會有大問題，但到第三、四代就不保險了；「假使五十年或一百年後，我黨領導核心變了，或正在變，按今天的情況，群眾能不能將其反掉或提出批評意見呢？」——那些錯誤的東西，現在不讓它放出來，到那個時候才放就糟糕了，群眾也不會識別和抵制了，因此不如現在趁毛主席還活著的時候，讓錯誤的東西全部放出來，這樣還可以提高群眾的識別和抵制能力。陳一諮還認為，只有實現放的方針，才能真正鑒別、鍛煉、培養接班人，在盲目服從氣氛下選出的接班人是不可靠的，而且「只有廣大群眾真正當家作主，他們的歷史主動性和積極創造精神才能充分發揮出來，也才能在他們當中湧現出大批有才幹的領袖人物，即使當權者出現幾個修正主義者，他們也有能力反掉」¹⁰⁵——不難理解和想像，陳一諮的這些話，是文革前夕的毛澤東最願意聽到的，因為這正是毛澤東的憂慮所在，是他下一步要做的事情。他正是要發動群眾，用放的方針，即他後來說的「大民主」的方法，來解決所謂「中國變修」的問題。

其三，陳一諮強調「接班」問題，提出要警惕老幹部及其子女中產生「新生資產階級」。他作了這樣的分析：「在老一代的革命幹部中，大多數人是從舊階級中分化出來的革命的知識分子」，「舊階級的尾巴完全割掉是很不容易的」，「戰爭並不能肅清人們的資產階級思想，經過了鬥爭考驗的人不能保證沒有資產階級的尾巴」，「何況還有一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根本就沒有想到過，或是不願意想社會主義革命」。陳一諮還分析了革命幹部子弟，認為他們中「比較差的比好的多」，他們「主觀上思想改造不自覺，認為自己

104 陳一諮：〈給黨和政府工作提的一些意見〉（1965年2月），油印稿。

105 陳一諮：〈給黨和政府工作提的一些意見〉（1965年2月），油印稿。

是『自來紅』，「客觀上的特殊條件和特殊地位，更進一步促成了他們的特權思想」，「一些人逐漸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家庭培養出來的『新生資產階級』」¹⁰⁶——應該說，陳一諮的這些分析，都深得毛澤東之心，或者可說是與毛澤東不謀而合。

其四，陳一諮在大學教育和知識分子問題上，提出了一系列激進的主張。他尖銳地質問：「高等院校是集中培育接班人的地方，到底培養出誰的接班人？」他的結論是：像北大這樣的高等學校，基本上沒有貫徹黨的教育路線、方針和政策，「不能培養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優勢還在舊勢力一邊」。他認為最危險的是「黨內專家」，他們「和資產階級教授形成無形的『統一戰線』」、統治著學校。他據此而提出一系列激進的「根本改造」，如改革高考制度和畢業分配制度，「真正貫徹階級路線，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把大學文科改造成「黨校性質的抗大式的學校」等等¹⁰⁷——陳一諮的分析和主張，正是文革前夕校園裡激進主義思潮的代表，後來在文革中都成了主流觀念，並得到實施，因為它從根本上符合毛澤東的思想和意圖。

這裡所出現的正是底層和上層的互動。

陳一諮這種毛澤東主義者的出現，顯然是反右以後，毛澤東及其思想的權威性強化和灌輸的結果，特別是毛澤東在1962年後所推動的中蘇論戰，關於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培養革命接班人的教育，更是極大地促進了這一代人思想的革命化，使他們與日趨激進的毛澤東思想一拍即合。像陳一諮這種眼光高遠、喜歡思考大問題、有濃厚理論興趣、又極度敏感的年輕人，就有可能敏銳地抓住毛澤東思想的內核與精髓，與高居於上的毛澤東發生心靈的相遇。

對於因和黨內官僚體制發生衝突、深感寂寞的毛澤東，這種來自底層的心靈呼應，自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支持。特別是當他決心藉助群眾力量來解決黨內矛盾、發動文化大革命時，陳一諮這種青年學生中的毛澤東主義者，自然成了他的群眾基礎，他們的民間思考也為他提供了群眾性中的思想基

106 陳一諮：〈給黨和政府提的一點意見〉（1965年2月），油印稿。

107 參看陳一諮：〈給（高等教育部部長）楊秀峰的信〉（1964年寒假）、〈給校系工作提一點意見〉（1965年2月）、〈給胡耀邦的信〉（1963年寒假），油印稿。

礎。以後我們會討論到，在文革中形成了青年毛澤東派，並非偶然。

但在中國現實的政治生態環境下，陳一諮的個人命運卻始終不佳。在文革前，他因為反抗基層黨組織而被打成「反動學生」，遭到殘酷打擊。而他所期待並終於到來的文化大革命，卻又是一場新的造神運動，陳一諮對毛澤東的獨立態度，又使他這個真正的毛澤東主義者、真正的革命呼喚者，成了「反毛澤東」的「反革命」。¹⁰⁸無論對陳一諮這樣的青年毛澤東主義者，還是毛澤東本人而言，這都是一個歷史的嘲諷和悲劇。而陳一諮本人也通過文化大革命，最後走出了毛澤東，成為毛澤東的反叛者，這樣的精神歷程，自然具有很大的典型性。

三、社會底層的狀況：文革前我個人的遭遇和預感

可能有同學會問，北京畢竟還是上層，那些遠離政治中心的邊遠地區，也就是中國的最底層，在文革前又是什麼狀況、狀態呢？那麼，我就講講文革前我個人的遭遇和經驗。我在《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一書中有詳盡的回憶，許多同學都看過了，我這裡只作一個介紹。

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在文革前夕，我和校長、支部書記發生過一系列衝突，開始原因是，我對我所在的教研室主任的評價問題，而和校長發生了爭論。校長是一個「老革命」，於是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話來壓我，我不服、又年輕氣盛，就從宿舍裡搬來馬列原著，據理力爭。當時我正在攻讀馬列主義，校長自然不是我的對手，我把他弄得很狼狽。我也因此犯了大忌，因為頂撞本單位領導，這是「五七體制」絕對不允許的。於是，校長宣布我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說錢理群是漏網的「右派」，並布置教研室的老師監視我。那位老師私下告訴我這件事，我當然很生氣，以後又和這位校長有很多衝突。這時候學校派來了新的黨支部書記，並很快和校長發生矛盾，新書記知道我反對校長，就找我談話，說黨支持你，我聽了當然非常高興，卻

108 參看陳一諮：〈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和陸平黑幫作不調和的鬥爭〉（1966年8月），複寫手稿。〈革命何罪？——給首都工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二封信〉（1966年10月），複寫手稿。

不料我之後又慢慢和黨支部書記發生衝突，這大概是我的反叛本性難移吧。最嚴重的一次衝突，是這位書記要培養一個積極分子入黨，卻又故作姿態地徵求群眾意見，恰好這位積極分子人緣很差，大家都覺得他很假，但都知道這是走過場，因此誰也不說話。我又犯了年輕氣盛的毛病，站起來反對，一些老師們、黨員也就勢表示支持我的意見，讓這位書記下不了台，從此含恨在心，準備整我。我當時已經從報紙上的大批判文章，預感到一個大風暴將要來臨，這大概和我大學主修新聞專業、政治上比較敏感有關。當時，四清的精神開始下達，說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我立刻意識到，受校長、書記壓制的自己，可能有一個說話、出氣的機會。也就是說，當時的我正在期待一場新的變動，當然我並不知道這樣一場變動會是文化大革命，更沒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會經受更大的磨難，但至少在當時，我是積極地準備迎接這場新革命的。那時候，我已經有毛澤東主義的傾向，但還不是毛澤東主義者，我用毛澤東思想去分析校長、書記的言行，就發現了很多的問題，並偷偷把它記下來，準備有一天要發言。

如果把我和校長、支部書記這些矛盾、爭論、衝突，放在文革前夕整個中國的大的政治形勢下去考察，就會發現它的意義——它所顯示的，是文革前基層社會的許多矛盾，其根源就是反右以後建立起來的「五七體制」，特別是所謂「第一書記專政」的「單位所有制」。

我們以前講過，單位所有制是一種新的等級制度，它既維護書記的絕對權力，又製造新的社會歧視，形成新的社會不平等，這就必然孕育和引發眾多的矛盾和衝突。而所謂「新的社會歧視和不平等」，主要來源於以政治表現和家庭出身所劃分的「左」、「中」、「右」，這必然形成政治歧視和家庭出身歧視。我和校長、書記衝突的背後，正是這樣的政治歧視和家庭出身歧視。我當時在學校裡，在書記、校長眼裡，是具備雙重身分、不可靠的人。第一個身分，就是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因此就要剝奪我的許多權利，比如當班主任的權利。¹⁰⁹這一點，同學們聽起來會覺得很奇怪，現在中學老師最不願意做的就是班主任，因為做班主任是很麻煩的事。但在當時，我提出申請要求當班主任，上面卻說我不夠資格，因為我不可靠，會和黨爭奪青年，這就是家

109 班主任，相當於台灣的班導師或級任老師。

庭出身歧視。這樣的出身歧視當時在中國非常普遍，特別是在基層。以後我們會講到，文革開始許多人起來造反，就從批判出身歧視入手，這絕不是偶然的。

我的第二個身分，是一個「政治表現不好」的人。事實上就是我相對而言具有一點獨立思考的習慣與能力，因此就不怎麼聽話，還時不時衝撞領導，前述和書記、校長的衝突就是一個突出表現。於是，這個體制就對我進行監視、限制等等懲罰，一有運動，我就必然成為首先打擊對象，這就是政治歧視。而我這樣的不聽話、喜歡搗亂的人，在每個基層單位都有，而且這些人一般來說能力都比較強，有的在群眾中還有相當影響。當然這些人還有一個致命弱點：骨子裡瞧不起單位領導。也就是說，這樣有獨立思想、不馴服的人，很容易和基層黨組織及領導發生各種衝突，「五七體制」中的第一書記專政，更是極大地強化了這樣的緊張關係，因此積怨甚深。當文革把批判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這些被當權派視為「政治表現不好」的人首先起來造反，就是當然的，因為他們反抗的，正是單位所有制的政治歧視。

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不僅單位的領導，而且單位裡領導所信任、依靠的「左派」，也認為這些人政治上不可靠。文革中他們起來造反，在這些單位領導的「左派」看來，自然是「別有用心」，於是也激起了要保衛領導權威的衝動。這就是文革中每一個單位都會形成「革」與「保」兩派鬥爭的內在原因。

「五七體制」的不平等關係，家庭出身歧視和政治歧視之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農民的身分歧視，這是由城鄉二元對立結構所造成的。如我們前面所分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毛澤東曾經採取了一些縮小城鄉、工農差別的措施，如大力發展農村工業、農村教育與農村衛生事業等，但到了大饑荒後、劉少奇主持的「整頓」時期，這些農村工廠、學校（包括幼兒園、托兒所）、醫療保健站都紛紛下馬，而把有限的經濟、教育、醫療資源集中於城市，這就反過來加大了城鄉、工農的差別。更重要的是，為了維護大饑荒年代的社會穩定，又加強了對農村戶口的控制，制定種種法規如《勞動教養法》、設立「盲流收容所」等，嚴禁農民進城；這都極大地強化了城鄉對立和對農民的歧視，也進而影響到農民的子女。當時我所在的衛生學校，就有一個特殊的班級，叫「社來社去班」。這個班級裡，所有學生都從人民公社招來，是清一色的農民子弟，而且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子女，但卻規定這些

人畢業之後必須要回到人民公社去。這樣，在同一所學校裡，就有兩種分配制度：城裡的學生，畢業之後分派工作、享受「國家幹部」待遇；農村來的學生卻要全部回到農村去，依然當社員，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出生在農村。這就是農民身分歧視。這樣，文革時這些農民子弟首先起來造反是很自然的，加上他們家庭出身好，又很自然地成為造反派的領導和骨幹。我也因為支持他們受了很多罪，不過這都是後話了。

順便再說一點，大饑荒後的「整頓」，在工廠裡也強化了廠長和技術人員的權威，加強了對工人的管理，這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管理、技術人員和工人之間的差別與矛盾，再加上實行兩種用工制度，造成了合同工(契約工)、臨時工與工廠管理者，以至正式工人之間的矛盾：這都孕育了文革中工人的造反。

以上所說，儘管限於我個人的遭遇以及我所在的貴州一所普通中等專業學校內的情況，但也有一定代表性。其所反映的文革前中國社會基層的情況，我想概括為兩點：第一，在「五七體制」下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從反右、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大饑荒以後的大抓階級鬥爭，到思想、文化、教育的大批判，再到四清，已經積累了太多的社會矛盾，群眾中鬱積著一股怨憤情緒。毛澤東敏銳地把握到群眾對「五七體制」的不滿情緒，並利用群眾和黨的各級領導，特別是基層黨組織領導之間的矛盾，發動了把矛頭指向當權派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大革命確實是有群眾基礎的——在把握和利用群眾情緒這一點上，毛澤東比他的政治對手劉少奇們，顯然要高明得多。

但我們還必須說另一點，否則也會遮蔽問題。文革前夕的社會積怨雖然已經相當深了，但並沒有達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比如說我跟書記和校長之間再有矛盾，我還是把他們看作「老革命」，絕沒想到要把他們打倒、對他們進行專政。書記、校長儘管對我極不信任，但他們也並不否認我的業務能力和教學水平，對我還是採取「有限制的使用」政策，如果不搞運動，也不會隨便將我打成反革命。也就是說，文革最後演變成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完全是毛澤東有意引導的結果：一是將社會矛盾高度激化、政治化，一是將群眾的怨憤情緒引向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引向「無法無天」的群眾專政，以至「全面內戰」——這正是我們討論過，「五七體制」中「設置對立面，製造階級鬥爭」

的毛式戰略與策略的全面運用。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刻意製造出來的。

不管怎樣，歷史走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已經不可避免，只看毛澤東如何點火了。

編註

- i 四清運動：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焦點在於推行社會主義教育以解決幹部腐敗問題。會後在全國範圍展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包括在城市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與在農村展開的「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務」的「小四清」運動，直到1965年毛澤東頒發〈二十三條〉，規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應簡稱「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 ii 中國變修：「修」指修正主義。在毛澤東看來，列寧、斯大林主義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不同於列寧、斯大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其他派別，如社會民主主義，即為「修正主義」。在中國國內，毛澤東自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一切不同於己的思想都是「修正主義」。他提出要防止「中國變修」，就是要防止中國走上背離毛澤東自己意志的道路。
- iii 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匈牙利的學術社群。其前身為解放前地下共產黨控制的慈善性資助工農子弟求學的團體，後轉為知識分子討論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問題的論壇，並被當局定為「反黨、反人民民主專政」的團體，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俱樂部扮演重要角色。
- iv 桃園經驗：指王光美在1963年11月-1964年4月間帶領工作隊，在河北省撫寧縣盧王公社桃園大隊蹲點開展四清運動後，所總結出來的經驗。其要點是出於「三分之一的政權已經不在我們手裡」的估計，在需要奪權的地區，避開農村基層黨組織，由上級派駐的工作組在農民中秘密串聯，直接發動群眾起來反對基層幹部。
- v 二十三條：1965年1月14日中央工作會議定稿通過，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該文件將四清運動的重點定為清理「黨內走資派」，並糾正之前四清運動的人海戰術、鬥爭面過寬等問題。
- vi 歐洲六八學生造反運動：1968年3月法國大學生掀起改革教育與社會文化的學潮運動，重點為改變封建式的教育制度（如：改善高中會考的缺失，大學生人數超多問題）及「性改革」（抗議大學內男生禁止進入女校、要求女生髮禁、服裝等解放）。5月2日法國南德合大學開始停課，是為五月學運，學生在巴黎大學及拉丁區示威抗議，並與警察展開衝突，此抗爭蔓延至歐洲。

台灣社會研究論壇

- 01 《戰爭沒有發生？2003年美英出兵伊拉克評論與紀實》| 馮建三編 | 2003年9月出版
- 02 《反思台灣論：台日批判圈的內部對話》| 陳光興、李朝津編 | 2005年6月出版
- 03 《四海困窮：戰雲下的證詞》| 趙剛著 | 2005年4月出版
- 04 《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 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 | 2005年6月出版
- 05 《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 賀照田著 | 2006年1月出版
- 06 《批判連帶：2005亞洲華人文化論壇》| 陳光興編 | 2005年12月出版
- 07 《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 鄭鴻生著 | 2006年9月出版
- 08 《當前知識狀況：2007亞洲華人文化論壇》| 陳光興、蘇淑冠編 | 2007年12月出版
- 09 《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 錢理群著 | 2008年8月出版
- 10 《實質民主：人民性的覺知與踐行之對話》| 丘延亮著 | 2008年8月出版
- 11 《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 白永瑞著 | 2009年9月出版
- 12 《魯迅入門讀本》(上、下)| 錢理群編 | 2009年9月出版
- 13 《全球化下的亞洲跨國企業勞工：抗爭的圖像》| 張大業編 | 2010年7月出版
- 14 《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方法》| 陳光興、孫歌、劉雅芳編 | 2010年7月出版
- 15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 白永瑞、陳光興編 | 2010年11月出版
- 16 《韓少功隨筆集》| 韓少功著 | 2011年8月出版
- 17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上、下)| 陳光興、蘇淑芬編 | 2011年9月出版
- 18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 錢理群著 | 2012年1月出版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發行人：周渝

社長：徐進鈺

總編輯：王增勇

執行編輯：蔡志杰

助理編輯：廖瑞華

編輯委員：丸川哲史、王瑾、王增勇、白永瑞、汪暉、邢幼田、柯思仁、孫歌、
許寶強、夏曉鵬、夏鑄九、馮建三、趙剛、瞿宛文、Chris Berry、
Gail Hershatler

顧問：丁乃非、于治中、王振寰、丘延亮、江士林、朱偉誠、呂正惠、
何春蕤、李尚仁、李朝津、李榮武、林津如、陳光興、陳忠信、
陳信行、陳溢茂、許達然、賀照田、黃麗玲、廖元豪、甯應斌、
錢永祥、鄭村棋、鄭鴻生、魏 玠

榮譽顧問：王杏慶、成露茜、李永熾、吳乃德、吳聰敏、林俊義、高承恕、
徐正光、梁其姿、蔡建仁、張復、傅大為、鄭欽仁

國際顧問：溝口雄三、蔡明發、濱下武志、Perry Anderson、Arif Dirlik

網址：<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taishe/>

電郵：taishe.editor@gmail.com

聯絡電話：02-22360556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 6395 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 2634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 (1949-2009)

——另一種歷史書寫 (上) / 錢理群著·初版·

臺北市·聯經·2012年1月(民101年)·432面·

17×23公分(聯經學術)

ISBN 978-957-08-3924-1 (上冊:平裝)

1.中國史 2.現代史

628.7

100023425

聯經學術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 (1949-2009)

——另一種歷史書寫 (上)

2012年1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2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錢理群
策劃 交通大學亞太
/文化研究室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12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暨門市電話 (04) 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第 0100559-3 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沙淑芬
執行編輯 阮芸妍
胡清雅
校對 王中奇
封面設計 黃瑪琍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聯經忠孝門市更換。 ISBN 978-957-08-3924-1 (平裝)

聯經網址: 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 linking@udngroup.com